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總第109期

1991 · 6



SHEN ZHEN JING JI TE QU

WEI XING XIN CHENG——XIN AN ZHEN

新安鎮（原名西鄉）是1982年國務院正式批准恢復深圳市寶安縣建制時設立的新縣城，是縣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全縣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經過新安人民的奮斗，今日的新安鎮已成為深圳經濟特區的衛星新城，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廣闊的前景。

鎮委書記：呂小平 鎮長：曾漢良

深圳經濟特區衛星新城——新安鎮



良好的投資環境

新安鎮黨政領導班子成員在研究開發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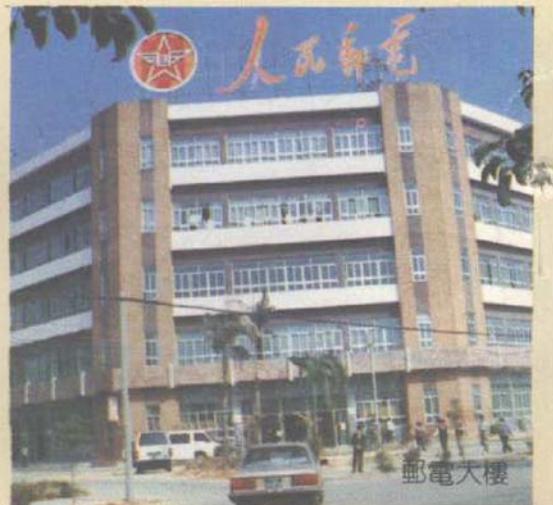


西鄉碼頭一角

新安鎮水源充足，境內有庫容量達8000萬立方米的鐵崗水庫。目前，深圳西部水源四級引水工程即將竣工，以適應農業發展和人民生活需要。

電力，鎮內新建成11萬和22萬伏安的兩個變電站並投入使用；目前又立項興建一個15萬伏安變電站和計劃興建一個22萬伏安變電站。

新安鎮是祖國內地從西面進入深圳經濟特區的重要門戶。寬敞的廣深公路、西鄉碼頭，竣工在即的廣深珠高速公路、大王洲碼頭及已通航的深圳機場，構成海陸空四通



二十二萬伏變電站一角



龍珠路遠眺

庆祝广东人民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部分学术著作介绍

哲学·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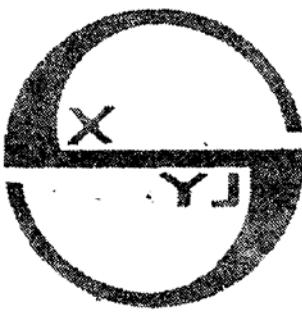
便桥集	杜国庠	1960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广东省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集	本书编选小组编	1983年
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述	刘嵘	1983年
工具论(亚里士多德逻辑论文集)		
〔希腊〕亚里士多德著 李匡武译	1984年	
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	章沛	1984年
哲学原理集辩	黎克明等	1984年
毛泽东思想与新中国 ——广东省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论文集 本书选编组编	1985年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	本书编选小组编	1985年
辩证逻辑理论问题	章沛	1985年
问题中的哲学	黄楠森主编	1985年
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	丁宝兰主编	1985年
现代西方哲学论集	罗克汀	1986年
孙中山哲学研究	张江明主编	1986年
新时期的社会矛盾	梁渭雄等	1987年
辩证法发展概述	江家齐	1987年
列宁《哲学笔记》若干问题研究	刘歌德等	1988年
科学预见概论	江家齐	1988年
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		
杨越 钟阳胜 范英		1988年
中国经济特区法概论	常征主编	1988年
人民警察职业道德概论		
杨凡 李子昭 陈启宇主编		1988年

过渡社会主义论	王稼 廖曙辉	1988年
杜国庠学术思想研究	本书编辑组编	1989年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简论	梁木主编	1989年
人口问题概论	刘渠	1989年
社会主义社会质量互变研究	张江明主编	1989年
台湾司法制度和法律		
罗立煌 郝丽雅 徐建主编		1989年
人类历史的新航道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张幼峰 刘嵘主编		1990年
人民群众的护身符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黄家驹 侯经体主编		1990年
历史与人民的选择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梁木主编		1990年
人类历史新纪元的航灯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张江明 梁渭雄主编		1990年
社会主义辩证法新探	张江明主编	1990年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若干问题研究		
张江明 陈国志主编		1990年
探索与研究 ——广东省党建理论研讨会论文汇编		
郑国雄 黄浩主编		1990年
社会主义若干问题探析	侯经体	1991年
新的足迹——广州青年工作研究文集		
余世喜 王志雄主编		1991年
中国共产党建设七十年		
方锐 刘福祥主编		1991年

党员教育概论	刘应山主编	1991年	广东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研究		
社会主义社会更新、完善、发展的辩证法			广东农村发展中心编	1991年	
领导工作与社会协调	张江明 梁渭雄主编	1991年	粤港经济合作新阶段	丁励松主编	1991年
论新时期共产党员的素质	钟阳胜	1991年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建教研室主编		1991年	[美]傅高义著 凌可丰 丁安华译		1991年
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			广东产业结构研究	肖如川主编	1991年
胡提春 曾庆榴主编		1991年	广东投资探索 广东投资协会、省建设银行投资研究所编		1991年
经济			香港经济与政策	吴天青	1991年
论社会主义经济	蒋学模	1980年	历史·地理		
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卓炯	1981年	世界简史	中大历史系本书编写组	1974年
广东经济调查	广东经济学会编	1981年	五四运动论文集	彭明	1979年
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	周叔莲	1983年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集	彭明	1982年
中国式经济体制研究	王琢	1983年	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	胡华等	1982年
汕头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简编	肖超然等	1982年
杜松年 吴勤生主编		1984年	黎族简史	本书编写组	1982年
利改税问题研究	陈永忠等	1985年	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	沈光耀	1985年	(1927—1937)	赵启民主编	1983年
政治经济学新探	卓炯	1985年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蒋励主编	1985年	历史概述	向青	1983年
香港经济考察	中大经济系编	1985年	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	杨启樵	1983年
大系统论			太平天国史论文集		
——预测决策管理方法	萧南槐	1986年	两广太平天国史学会合编		1983年
广东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崖州志	郭沫若点校	1983年
	广东经济学会编	1986年	求是集(第二集)	陈乐素	1984年
广州城市发展分析	林初升	1986年	近代史思辨录	陈旭麓	1984年
我国当前经济效益问题	赵元浩	1986年	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		
中国积累和消费问题研究	汪海波	1986年	梁启超	本社编	1985年
宏观经济调节论	王琢	1987年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		
香港金融概论	李若生	1987年	广东历史学会编		1985年
广东改革开放研究	本书编选组编	1988年	中国革命史丛论	丁守和	1985年
新的探索			东江纵队史	本书编写组	1985年
——广东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的理论			阮啸仙研究	刘林松主编	1985年
与对策	黄浩主编	1988年	洪秀全思想研究论文集		
中国对外开放与沿海发展战略			广东省太平天国研究会编		1985年
	陈肇斌	1989年	冯云山评传	邢凤麟 邢凤梧	1985年
信息市场与价格概论	金建	1989年	孙中山论	张磊	1986年
商业改革探索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	蔡尚思	1986年
——广东商业改革十年论文选编			西南军阀史研究论丛		
	广东商学会编	1990年	广东民族研究论丛(1—4辑)	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等编	1986年
第三产业经济学	李江帆	1990年	孙中山研究(第一辑)		
当代中国商品经济理论流派	本社编	1990年	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编		1986年
广东价格改革十年探索	何杰	1990年			
论商品农业	冯平	1991年			

求是集(第一集)	陈乐素	1986年	论广东150年	梁荣主编	1990年
史论存稿	张其光	1986年	广东货币三百年	吴志辉 肖茂盛	1990年
琼崖纵队史	琼崖武装斗争史办公室	1986年	广州满族简史	汪宗猷	1990年
丘逢甲研究	吴宏聪 张磊主编	1986年	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		
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	关履权	1987年		黄慰慈、许肖生	1991年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			广东工农武装起义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会编		1987年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1991年
简明广东史	蒋祖缘 方志钦主编	1987年	辛亥革命与孙中山		
广州起义研究				广东省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编	1991年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会等编		1987年	洪秀全思想研究	陈华新主编	1991年
广东抗战史研究			珠江三角洲	徐俊鸣	1973年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学会编		1987年	五岭	曾昭璇等	1977年
泰国史	中大东南亚史研究所	1987年	中国的地形	曾昭璇	1979年
丁日昌评传	邓亦兵	1988年	岭表录异	鲁迅校勘	1983年
广东革命根据地选论	黄振位主编	1988年	南海诸岛	曾昭璇主编	1986年
广东农民运动	杨绍练 余炎光	1988年	中国的热带	余显芳等	1987年
两广纵队史	本书编写领导小组	1988年	广东省地理	刘琦等	1988年
粤赣湘边纵队史			广州历史地理	曾昭璇	1991年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办公室		1988年			
丁日昌研究	张磊主编	1988年			
宋元文史研究	陈乐素主编	1988年			
广东籍华侨名人传	温广益主编	1988年			
孙中山研究(第二辑)					
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编		1989年			
胡汉民评传	周聿峨 陈红民	1989年	古音概说	李新魁	1979年
廖仲恺研究	张磊等编	1989年	郭沫若书简(致容庚)	曾宪通编注	1981年
唐绍仪研究论文集	暨大历史系编	1989年	汉语文言语法	李新魁	1983年
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魏宏运	1989年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		
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曾庆榴	1989年		詹伯慧 张日昇主编	1987年
百团大战始末	王政柱	1989年	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		
南粤割据	余炎光 陈福霖主编	1989年		詹伯慧 张日昇主编	1988年
红军第二第四师史	刘林松 江铁军	1989年	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	蔡尚思	1990年		詹伯慧 张日昇主编	1990年
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	梁方仲	1990年	语言文字论集	李新魁主编	1991年
太平天国诸王传			中国文学批评简史	黄海章	1962年
陈宝辉 尹福庭 庄建平		1990年	宋词散论	詹安泰	1980年
两汉经学史	章权才	1990年	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	叶嘉莹	1981年
中国古代史方法论略	关履权	1990年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叶嘉莹	1982年
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			诗词曲论文集	罗忼烈	1983年
丘进		1990年	纳兰性德和他的词	黄天骥	1983年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常绍温主编	1990年	杜诗论稿	李汝伦	1983年
史志文稿	饶展雄	1990年	西厢记艺术谈	吴国钦	1983年
论东江纵队	本书编辑组	1990年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1辑)		
珠江纵队史	本书编写组	1990年		中大中文系等编	1983年
			姜白石词校注 夏承焘校 吴无闻注		1983年
			古典文学论集	詹安泰	1984年
			詹安泰词学论稿		
				詹安泰著 汤擎民整理	1984年
			饮水词 夏承焘主编 冯统编校		1984年

梅村词	夏承焘主编	李少雍编校	1985年	明清传奇概说	朱承朴等	1988年
求索小集		王季思	1986年	韩愈研究论文集		
陶渊明论略		李文初	1986年	韩愈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		1988年
衍波词	夏承焘主编	李少雍编校	1986年	史记人物画廊	黄 绳	1988年
意境·风格·流派		王昌猷	1986年	历代爱国词选		
谈词随录		廖辅叔	1986年	唐圭璋选编 王一鹗注释		1989年
文学入门		饶芃子 谭志图	1986年	分春馆词话	朱庸斋	1989年
论苏轼岭南诗及其他				周邦彦研究	钱鸿英	1990年
	苏轼研究学会编		1986年	鲁迅思想发展新探	刘焜炀	1990年
明末广东诗人抗清评传		黄海章	1987年	诗词鉴赏概论	陈新璋	1991年
红楼梦新探		曾扬华	1987年	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	杨荣春	1995年
诗词赏会		周汝昌	1987年	演讲学	谢盛圻	1986年
红楼梦人物新析		吴 颖	1987年	大学生心理学	戴清海	1987年
曝书亭词 夏承焘主编	吴肅森编校		1987年	徐特立读书眉批选	北京理工大学编	1989年
庄子浅论		曹础基	1987年	徐特立教育学	吉多智等	1990年
孔尚任与桃花扇		洪柏昭	1988年	大学生成才修养学	肖伟昌主编	1990年



学术研究

主编：梁钊
副主编：张硕城
刘斯翰
范汉英

主办单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者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电话：345916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399信箱

代号：46—64 国内定价：每册1.5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44—1070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732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粤工商广字01044号

本刊每逢双月25日出版

· 经 济 学 ·

- 国有化和集体化互转的途径与方法 严闻广 (6)
论我国现阶段劳动就业的特征和对策 李斌 张明 (11)
沿海地区经济运行机制外向转换的若干构想 洪耀宗 李剑锋 (16)
广东经济开放的探索与启示 沈贵进 (21)
高技术经济理论述评 阚机龙 (25)

· 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太平天国革命140周年 ·

- 辛亥革命应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孔凡岭 (30)
试析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产的原因 余子明 (35)
容闳与孙中山 陈申如 (41)
论太平天国革命与中国近代化 车安世 (43)

· 哲学·精神文明学 ·

- 论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发展的学说 刘志光 (49)
论文化本质 李权时 (54)
精神文明学本体层次及其主要特征 范英 (61)
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陈冲 (68)
关于辩证逻辑发展的思考 黄媛 关老健 (70)
陈白沙的自得心学 王伟民 (75)
访苏格兰哲学见闻 张华夏 (78)

· 历 史 学 ·

- 晚清社会的游民问题 王跃生 (82)
秦三十六郡考 严宾 (87)

· 文 学 ·

- 中国的感生神话 蒙 梓 (90)
陆一帆《关于文艺本质问题的思考提纲》讨论(续)
..... 刘伟林 陈培湛 王才勇 (98)
“竹林七贤”称名始于东晋谢安说 周凤章 (102)
陈白沙诗论探索 彭建康 (108)

· 教 育 学 ·

- 论教育市场及其效率 吴超林 张铁明 (112)

· 国情省情市(县)情研究 ·

依靠科技提高经济效益

- 肇庆市机械工业的调查 施芝华 谢名家 (118)
抓住历史机遇，振兴梅州纺织工业 陈 杰 (121)

·企 业 研 究 ·

- 谈梅县涤纶厂的人才策略 张梓林 (123)
依靠科技，一举腾飞
——梅州面粉厂的经营之道 张 职 (125)

· 书 评 ·

峰回水迥的卓异跋涉

- 读《中国山水诗史》 魏中林 (128)

· 书 海 酌 酣 ·

《癸辛杂识》与《元史》之“叶李”小考 (刘家钰·97)

《学术研究》1991年1—6期总目录 (131)

ACADEMIC RESEARCH

No.6, 1991

CONTENTS

- The Interchange Ways between Nationalization and
Collectivization Yan Wenguang (6)
-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resent Employment
in China Li Bin and Zhang Ming (11)
- Some Conceptions concerning the Export-Oriented Shift of the
Economic Operating Mechanism in the Coastal Areas
..... Hong Yaozong and Li Jianfeng (16)
- The Approach to and the Enlightenment from Guangdo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Shen Guijin (21)
- A Comment on the Theory of Highly Technological Economy
..... Que Jilong (25)
-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Kong Fanling (30)
- The Causes Leading to the Failure of a Capitalist Republic
Programme Raised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Yu Ziming (35)
- Anecdotes of Mr.Rong Hong and Mr.Sun Yetsen Chen Shenu (41)
- On the Taiping Revolution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 Mou Anshi (43)
- On Marx's Theory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Freedom
..... Liu Zhiguang (49)
- The Essence of Culture Li Quanshi (54)
- The Noumenal Level of the Discipline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Fan Ying (61)
-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as a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Socialist
Dialectical Theory System Chen Chong (68)
- A Ponderation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Dialectical Logic

.....	Huang Yuan and Guan Laojian (70)
Chen Baisha's Theory of Mind in Learning by Self-satisfaction	
.....	Wang Weimin (75)
Philosophic Knowledges Learned during Visiting Scotland	
.....	Zhang Huaxia (78)
The Vagrant Problems in the Societ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	Wang Yaosheng (82)
A Verification of the 36 Prefectures of the Qin Dynasty	
.....	Yan Bin (87)
Chinese Inductive Mythes	Meng Zi (90)
Additional Arguments on Lu Yifan's "An Outline of the Essential Problems of Literature and Art for Further Consideration"	
.....	Liu Weilin, Chen Peizhan and Wang Caiyong (98)
About the Saying that "The Seven Worthy Persons of Bamboo Forest" Was Named First by Xie An in the East Jin Dynasty	
.....	Zhou Fengzhang (102)
An Approach into Chen Baisha's Theory of Poetry	
.....	Peng Jiankang (108)
On the Educational Market and Its Efficiency	
.....	Wu Chaolin and Zhang Tieming (112)
Making 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Increase Economic Benifit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ngineering industry of Zhaoqing City	
.....	Shi Zhihua and Xie MingJia (118)
Grasping a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Develop Meizhou Textile Industry	
.....	Chen Jie (121)
A Talk about the Strategy of the Qualified Personnel Management of Meixian County Polyester Fiber Factory	Zhang Zilin (123)
The Successful Rise with a Single Try Depend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management ways of Meizhou	
Flour Mill	Zhang Zhi (125)
A Significant Trudge through Hills and Waters—A comment on "A History of Chinese Mountains-and-Waters Poems"	
.....	Wei Zhonglin (128)
A General Catalogue of This Journal for 1991 (No.1—6)	(131)

国有化和集体化互转的途径与方法

严闻广

一

目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主要是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这两种形式具有共性，应该是辩证发展，即可以互相补充、互相转化、互相促进的。但是，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曾人为地、片面地强调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即向国有制“升级过渡”，而不允许“国有”向“集体”转化，似乎这已成为经典和公理。在“左”的思想模式中，前一种转化被称之为“历史的必然、历史的进步”，而后一种转变，则往往被斥为历史的倒退，甚至是资本主义复辟。这种所有制关系上的单向过渡和壁垒关系，使国有制为尊，集体所有制受到歧视。历史上形成的“重全民、轻集体”的思想，至今还在严重地束缚着人们。实际工作中全民与集体之间不能一视同仁和平等对待，显然不利于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种形式和谐地、高效率地并存和发展。

要使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得到平等、和谐和辩证的发展，首先要使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第一、国有制企业向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化的依据之一是企业寿命周期。国外学者分析认为，一般企业寿命周期为25年左右。我国一大批老牌子的国营企业诞生于50年代初，经过40年左右的发展和变化，其中有些，尤其是中小型国有企业在客观上进入衰老期。衰老的原因有：企业技术设备落后，产品单一，而且产品寿命周期处于淘汰、退化期；企业职工素质低等等。衰老企业的出路，在资本主义国家，要么被拍卖，要么被兼并，或破产关门；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私有化，也不能过多地采取破产关厂的办法，而应主要地通过转化为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办法来解决。由国有变为非国有的集体所有制经济，重组产权关系从而给企业注入新的生命活力。在12年改革中，不少国营小企业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经济，使处于破产边缘的企业获得了新生，这种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当然，企业寿命周期现象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也会发生，国家也可以出钱收买集体企业以实现国有化，这要视国家财力如何而定。

第二、两种公有制形式的转化应服从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通常，国家对战略性行业，如航天工业、通讯事业、国防工业，在资源紧缺社会中的能源工业等应实施国有化政策。而非战略性产业（行业），如消费品工业部门、第三产业一些部门、第一产业（农副业）部门，一般由集体所有制经营。其次，出于国家政治的需要，如在发生战争，需要保卫祖国这种特殊时期，国家也可以全面推行国有化政策，将集体企业乃至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再次，在和平时期，从经济效益上考察，在一些第三产业部门，在有些消费品生产行业，实行国有制往往得不偿失，而实行集体所有制往往会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如在半机械化、半手工业的小五金、制革、皮鞋、服装等行业的国有企业的经济就不同于类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效率高和效益好。当然，涉及到国家命脉的行业，如果完全推行集体所有制，那也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对国家也是不利的。只要有国家存在，就需要有国有资产，有了这笔资产，国家就能从容地进行宏观调控，就能卓有成效地进行社会实物量的平衡和调节，保证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

第三、两种公有制形式的转化应从社会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特点出发。我国社会的地理经济比较复杂，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地区已接近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工业经济发展水平，有的地区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水平。因而就工业发展来说，在加工工业地区主要是以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导；在资源开发地区，则主要是以国有制为主导。事实上是前者较富，而后者相对差些。改革12年来，沿海地区，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城镇集体经济和乡镇集体经济这两大块合流，已远远超过国有制经济所占的份额。据有关材料统计：早在1985年，浙江省集体工业产值就已占全省工业产值56.1%，江苏省集体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产值的51.4%。这些地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而我国以资源为主的山西、内蒙、贵州、云南等省则是以国有制经济为主导的地区。从宏观经济来看，我国的全国工业总产值仍然是以国有制经济为主导，这是客观的事实；但从中观经济即县市经济发展来看，集体经济（包括城镇和乡镇集体工业）在县市经济中已趋于、或已经占主导。由于近几年国家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国家投资县市的资金很少，地方财源主要地靠县市群众集资，兴办集体经济来解决，兴办集体企业已成为发展县市经济的重要支柱。上述情况表明，国有化或集体化都受地域经济发展的特点所制约，当然这也是今后进一步实现“集体所有制化”的一个特点。

第四、两种公有制形式的转化方式应主要地通过等价交换的买卖关系来实现。应当承认，建国伊始，人民共和国靠政权力量，通过没收方式，变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企业（公司）为国有资产（企业），这是必须的。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没收已不成为主要方式，因而，今后国有化或集体化的方式应主要靠赎买，靠股票出售，靠资产有偿转让等来实现。这是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一）国有化的途径和方法。

在实现国有化问题上，我们要力求避免用行政手段强行“升级过渡”的办法来推行。历史证明过去那种“升级过渡”办法是弊多利少。因为这种行政命令方式，事实上是平调和侵占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资产，是违背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的错误做法。因此，要遵循价值规律和劳动群众自愿自主原则来实施国有化政策。以笔者之见有以下途径和方法：

1. 赎买、收买的途径和方法。国家可以把外资企业赎买回来，也可以收买民间企业（包括集体企业）。这种方式在我国50年代已对民族资本家企业实行过，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当然，当时在具体操作上有的地方过急、过粗，这应另当别论，但总的做法是正确的。
2. 通过兼并、投资参股，使非国有企业逐渐实行国有化。如国家对中外合资企业投资参股，到一定年限收回国有。又如，国有企业兼并集体企业或私营企业。
3. 通过先租后买方法实行国有化。这种方法是国家派员承租外资企业，或到外国承租外资企业；如果以后对方愿意出售企业，那么国家则出钱购买。这是先租后买，即“借鸡下蛋、以蛋换鸡”的国有化方式。当然，这种方法也可在国内运用。
4. 通过法律程序和行政手段，采取没收或剥夺的方法实施国有化。国家对社会上的不法私营企业，可视其违法程度通过剥夺资产、没收企业的办法收归国家所有，这是强行国有化的办法。当然，这是特殊手段，其使用是严肃的，不能滥用。在发生战争这样的特殊时期，为赢得战争胜利，国家可以根据特殊需要，用征用或收归国有的办法对民间企业实行国有化。
5. 国有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国家垄断，国家有权规定某些行业和领域不得由民间企业来经营。因此，国家垄断性的投资建设，也是国有化的途径。

（二）集体化的途径和方法。

实行集体化要遵循经济规律特别是等价交换原则以及自愿自主原则，当然国家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要实行优惠的鼓励政策。在当前，要鼓励一些中小国有企业转变为集体所有制企业；要鼓励那些私营和个体经济转变为合作社形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其转变的途径和方法是：

1. 国家通过拍卖企业的方式，将一些中小型企业（不仅仅是经营不善的亏损企业）转变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2. 集体企业兼并经营不良的、亏损或微利的国有企业，有偿或无偿转国有资产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3. 集体企业承租国营企业，采取先承租和后购买的方法，实现国有资产转为集体资产。
4. 在国有制企业中实行“一厂两制”或实行“厂办集体企业”的办法，经过一定时期的质量互变规律的作用，变成集体所有制企业。当然原先部分国有资产可以实行作价偿还。

5. 社会上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可以通过合作制方式转变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6. 国家通过馈赠的方法，实现集体化。馈赠资产现象有两种：一种是国家把那些多年来为国家作出极大贡献（如交纳大量的税金）的小型国有企业的资产馈赠给该企业的全体职工，产权和经营权都归企业职工所有，即变国有企业为集体企业；另一种是国家把那些不法私营企业没收后，转赠给该企业的雇员，使该企业职工成为所有者，由全厂职工自主经营，成为名符其实的集体企业。

三

国有化与集体化，是国家调控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职能、一种手段，是一种稳定经济的重要措施。在60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国家主要靠关闭一些企业和遣散一些城市工人回农村的办法来调控经济，渡过困难时期。今天，我国农村农业劳力过剩，人满为患，社会经济的调整，如仍用60年代初的手段，显然是行不通的，而应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目前相当部分国有制经济效率、效益都较低，需要下大功夫认真改进这些国有企业。同时，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一定产业部门推行集体化应当成为治理我国当前经济问题的重要任务。

首先，当前困扰我们的，一是通货膨胀；二是企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经济效益不理想。据测，目前全国有6300家国有企业处于亏损局面，近10年来每年亏损额达70亿元至90亿元，使国家承受着巨大的财政补贴负担。而国有经济中又有上千亿价值的固定资产闲置，形成资产的严重浪费。此外，全国国有企业职工中约有2000万人处于在职失业，这种“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的局面造成职工行为的“贵族化”。如此下去，我国的经济是难以起飞的。走出经济困谷的出路，以笔者之见，除了调整好产业结构以外，更为重要的是要调整和优化社会所有制结构，尤其是公有制经济的内部结构，这是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

其次，调整好公有制内部结构，就要优化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比重关系。目前国有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64%，而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只占全国工业产值的32%。这种结构并不是一种优化结构。以笔者之见，应调整为30：60：10为宜，即国有制占30%；集体所有制占60%；个体、私营经济可占10%，这个调整并不是搞私有化，而是在公有制内部作比例关系的调整，在整个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仍占主体地位和发挥主导作用。经这样调整，宏观经济和企业经济效益将会大大提高。这样一种“少国有、多集体所有、少私有”的“橄榄型”的社会所有制结构，将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更适应商品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最后，为了优化公有制内部的所有制结构，国家应采取鼓励拍卖一批经营不善、长期微利和亏损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拍卖的主要方向是使其成为国家不承担风险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目前我国居民银行储蓄存款和手中所持的闲款高达7500多亿元，

（下转第40页）

(上接第58页)

中不断扩大自身的自由。另一方面，人的活动又始终不可能摆脱社会客体的制约。社会形态、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不仅仅只是人们自觉活动的结果，而且又是支配和决定每一代人发挥自身力量的先决条件。首先，它决定着人们发挥自身力量的起点和性质。每个时代的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先前已经存在的、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生产方式；人们每次都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其次，它决定着人们发挥自身力量的形式。人们怎么样来表现自身也逃不出既定生产方式的影响，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而非充分发展阶段，只能是“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暂时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②社会历史的主体和社会历史的客体不可分割，人类自由进程和历史必然性过程不可分割，只看到一个方面是片面的，应该是全面地分析和把握，才能真实地揭露历史运动的辩证本质。

①③④⑤⑨⑩⑪⑫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第497页、第109页、第485页、第105页、第108页、第103—104页、第108页、第110页

②⑧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25页、第35页、第77页

⑥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2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4页

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533册

⑯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页、第478页

⑰⑲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第443页、第507页

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大哲学所

责任编辑：冯生

论我国现阶段劳动就业的特征和对策

李斌 张明

90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劳动就业无疑将作为一个难点问题，日益突出地摆在我们社会面前，并对社会和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从分析就业形势入手，深入研究劳动就业中的新情况，探索深化就业体制改革的思路和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计划商品经济大格局下的就业形势

客观地分析就业形势，是运筹对策的基础。然而判断就业形势并不仅仅是静态地测算劳动力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或减少，它所依据的应当是9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给劳动就业提供的大背景、大格局。从这一点出发，社会就业面临着以下五大问题。

1. 特有的人口现象对就业的巨大压力。根据人口与经济相关变动的规律，当一个国家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的时期，亦即商品经济欠发达时期，人口对经济形成一个压力高峰。这种压力不仅表现为人口总量膨胀，而且表现为人口与就业之间的供需矛盾突出。19世纪欧美国家就曾因工业革命而激发过世界第二次人口浪潮，战后初期的日本也发生过类似的人口压力现象。近一、二十年，人口压力高峰几乎席卷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承受着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据测算，进入90年代，虽然劳动力资源自然增长率呈现下降态势，但10年内新成长劳动力仍高达1.36亿人，扣除各种非就业因素后的劳动力净增数量大体在8千万人，仍然是一支极庞大的新增劳动力大军。从吉林省情况看，“八五”期间城镇进入就业年龄人口110万人，其中需要安置就业的大约有80万人，加上“七五”末期结转的11万人，需就业的新增劳动力就近100万人。因而，我们对这一严峻就业形势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正视这种客观压力。

2. 商品经济共有规律对就业的刚性约束。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既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又要遵循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等等。把这些规律的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使经济运行达到高效率、高效益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对劳动就业必然形成一种效率优先前提下的硬约束状态。具体表现为，一是企业劳动力与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等物化劳动要素之间要实行优化组合，这个组合的经济界限就是劳动的边际产出要相当于劳动的成本（工资），如果企业增加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值还不足以弥补其支付的工资收入，就会人为地造成劳

动生产率下降，实质上意味着企业潜藏着剩余劳动力。据估计，我国企业中的这类富余人员约占职工总数的15—20%，在优化组合的约束下，这部分隐形失业问题必然显形化，成为今后就业工作的一大难题。二是商品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会推动资金有机构成的提高，引起机器设备等物质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如我国“八五”期间以至今后10年的主要投资大多是用于技术改造项目、资金密集型产业、高科技产业和具有较先进装备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走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路子，所以同样数量的投资，所能吸纳的劳动力就业数量就要减少，需求减少对就业形成了硬约束。三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素质的提高，打破了在原有经济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劳动力供求均衡，有些企业关、停、并、转，有些企业需要发展，但两者不可能完全同步，因此，结构性待业问题将成为经常性现象。

3. 劳动力大转移对就业的严峻挑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国人民坚定不移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走工业化的道路，就要使农业劳动力中的40%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总人数大约有3—4亿人。这个大转移牵涉的劳动力数目相当于80个广州市的人口。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这种转移变得愈来愈迫切。这是因为，其一，在农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出生的人口，90年代中后期将陆续进入劳动年龄，他们没能获得承包土地，由于现有耕地的调整余地较小，因而这部分新增劳动力与农业基本生产资料的分离或相对分离状态，客观上使得这些劳动力不得不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其二，在现在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条件下，仍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劳动时间不足，处于半年干活半年闲的半就业状态，农村人力资源大量闲置，长此以往，农业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其三，“离土不离乡”具有一定局限性。众所周知，资源配置必须以投入成本与产出的比较来决定。发展工商业客观上要求人口集中，这样才能在能源、交通、运输、通讯、财务、广告、信息交流等方面的成本因人口集中而降低，城市郊区的乡镇企业和城镇的乡镇企业发展快、效益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角度看，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集中于小城镇或形成新城市，以至有一部分迁移到大城市，加入城镇就业行列将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

4. 经济素质变化对就业的质量选择。改善经济素质，提高经济效益是90年代要解决的深层问题。劳动力是经济要素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定会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劳动力素质与经济发展的要求很不适应，据测算，今后10年内增加的劳动力中，大专文化水平以上的仅占3.5%，高中等（中专）文化水平的仅占14.5%，初中文化水平的占46%，仍有36%的劳动力处于初中以下文化水平，劳动力素质提高的任务十分艰巨，劳动力低质与经济高质之间矛盾将较为突出，形成新的就业压力。

5. 制度特征对就业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在就业问题上也不例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是公有制和共同富裕，而公有制经济关系表明劳动者是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有参与社会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应当保障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防止两极分

化，起码应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是社会主义就业的制度要求。因此，我们不能采取资本主义社会完全由市场自发配置劳动力的方式。

二、转换机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现实选择

要解决就业上的种种问题，靠产品经济条件下的传统就业模式是行不通的。深化就业体制改革，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就业机制，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

所谓就业机制，就是在社会经济运行的总过程中，劳动要素与生产资料要素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其内涵主要包括：（1）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之间配置的方式、比例及结构；（2）劳动力自身素质的变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3）一定的劳动力配置方式所产生的效率和效益；（4）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结构转换；（5）劳动力的自然淘汰和竞争淘汰。

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就业机制的客观必然性，首先是由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大环境决定的。就业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它作为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就业机制应当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适应。其次是由我国多元利益主体结构决定的。在我国现阶段，为适应生产力的现状和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同时需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适当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显然，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力吞吐主要不是由计划决定，而是由市场决定，因而单一的计划就业方式或单一的市场就业方式都已行不通。因此，只有实行计划就业和市场就业的内在结合，才能使就业机制和社会利益主体结构协同配套，实现劳动力配置的高效率。再次，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就业机制能够发挥计划和市场各自的长处，形成劳动力配置的整体功能优势。计划就业机制通过由国家制定和调控劳动力总量的供给规模，保证劳动力配置的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促进经济运行的有序性，但由于缺乏灵活性，往往由于计划失误和市场变化造成效率较低。市场就业机制通过企业和劳动力之间的自主双向选择，减少了劳动力配置环节和费用，具有灵活性、局部性和时效性。但是市场就业机制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这就决定了必须把计划就业机制和市场就业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计划与市场互为补充的整体就业机制。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就业机制的具体内容和作用范围，在实践中表现为有机融合、分层次倾斜的特点。其融合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市场配置为基础来实现就业计划，国家通过实施一系列配套的政策和措施，调节就业市场的一些经济变量，促使就业市场中的主体，即用工单位和劳动力个人的行为在就业活动中向就业计划的预定方向靠拢，体现计划意图。二是计划建构市场，反映供求，即国家以计划手段和经济手段，培育就业市场，建立就业服务体系，使市场就业机制在计划指导下发挥作用，但计划本身又是依据劳动就业的市场供求状况来制定的。这两方面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劳动力配置和流动。

以市场为基础，以市场机制来实现计划的目标，计划并不是以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形式来发挥作用。多层次倾斜是指在就业活动的不同层次上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起作用的倾斜重点不同。在宏观层次，二者的结合向计划机制倾斜，其作用内容和范围主要是：（1）国家把握劳动力就业的总规模，预测和调控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总格局，制定社会劳动力就业的中长期计划；（2）根据产业政策，对劳动力在各部门的分配进行计划导向，对某些重要部门、特殊行业、岗位和军人、大学生等人员的就业进行直接配置；（3）控制和掌握全社会失业率水平，使全社会失业人数保持在社会所能承受的适度比例上；（4）调控就业市场中的协议工资水平，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劳动者的经济权益；（5）建立和完善就业市场秩序，实行就业机会公平竞争，建立就业培训、职业介绍、就业保障等服务体系；（6）在就业市场上对恶性竞争、歧视妇女劳动力、使用童工、劳动条件恶劣、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等就业行为进行行政、经济和法律的约束。在微观层次上，则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1）企业和其它用工单位有权自主进行劳动力配置，根据本单位的需要在就业市场上选择适宜的劳动力和辞退不合格的劳动力；（2）企业有权自主制定企业内部的工资形式，劳动力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3）允许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自由选择就业单位或集资就业、自主就业，允许劳动者辞职；（4）劳动力能够在较大范围内进行流动，其流动的指导信号主要是就业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劳动条件等市场信号。从而逐步形成宏观计划指导，企业优化配置，个人自主竞争，市场调节供求，社会提供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就业模式。

三、从结构调整入手逐步建立新的就业机制

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型就业机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在当前多种矛盾交织，就业市场欠发育，社会就业保障体系未建立的情况下，就业机制改革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还要兼顾社会稳定等非经济因素，因而只能采取逐步过渡配套的对策。

逐步过渡配套的思路，核心是以调整就业结构为主线，扩大就业渠道，提高就业水平，逐步实现自主双向选择。具体途径是：第一，改革现有劳动工作日制度，变一周48小时工作日为40小时工作日。当今世界上实行48小时工作日的国家已为数不多，在我国目前劳动生产率水平下，缩短工作日的时机和条件已经具备。如果每个劳动力每周缩短8小时工作时间，相当于总劳动量减少16%，这16%的总劳动量可以基本上由现有企业中15%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来弥补，这样，就在没有增加成本的前提下，使每个劳动力满负荷劳动，提高了单位时间的活劳动效率，有利于改善低效劳动状态，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又不致将大量的企业冗员抛向社会。第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消费需求结构变化是产业结构调整之母。缩短工作日意味着闲暇时间增加，这本是收入增加的替代方式，并且会引起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的深刻变革，人们才有可能从吃、住、穿、用、家电等方面消费转向更广阔的第三产业服务领域。比如，我国人均流动率在600公里／年左右，而人均收入低于我国的印度的人均流动率已超过900公里／年，如果提高到印度的水平，就会刺激和带动旅游、交通、通讯、饮食、文化娱乐等服务业的发

展。第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和劳动力结构调整又能够进一步促进第一、二产业部门的发展，扩大新的生产领域，在提高效率前提下吸纳新的劳动力就业。以上三步从总体上看是一个联动过程，这个联动过程是在计划导向下由市场机制来完成的，它可以缓解劳动就业矛盾，稳步过渡到新的就业机制上去。

上述向新机制过渡的途径，还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才能取得较好效果。一是改革企业工资制度，打破企业的固定工资制，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形成工资由劳动力供求和企业效益共同决定的机制，企业可采取计件工资、计时工资等多种形式。二是培育就业市场，建立就业服务体系，根据企业的所有制不同采取不同形式。首先放开集体企业劳动用工制度，集体企业在照章纳税和行业管理情况下，实行自主自由配置。其次在全民企业下放用工和分配权力，新增劳动力全部进入市场选择；原有劳动力继续实行优化组合，通过培训和另行开辟新的就业岗位，妥善解决再就业问题。三是加快建立国家、集体、个人共同负担的就业保险制度，建立就业保障基金。基金可以有两类，一类可为优先就业保险基金，开办类似储蓄性的低息就业存款，完全由个人提供子女未来就业准备金，凡作为基金会成员，就业存款达到一定数额以上，社会就业服务部门优先安排这部分人员的就业。另一类是在业人员的就业保障基金，由现有就业人员、所就业企业和国家（指国营企业）共同承担，按比例提取，作为停业人员再就业或处于待业期间的生活补贴和退休津贴。并把这些基金有效地运转起来，取得增殖，从而解决劳动力难以流动的后顾之忧，减轻企业负担。四是开拓外向型的就业渠道，扩大劳务的国际合作和劳务出口，一方面吸引外资，建立外资企业，用外资来配置一部分劳动力；另一方面直接组织劳务输出，这是就业社会化、国际化趋势，我们应抓住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的机遇，使我国的丰富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五是强化劳动力素质培训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差，在国际国内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中就处于劣势，再优越的就业机会也会因素质不适应而丧失。因而必须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抓好就业前的培训和结构性就业调整中的再培训，这样既可以为经济发展储备技术力量，又可缓解就业与就业调整的压力。六是税收、信贷、工商等方面要采取必要的扶持政策，推动和支持集体经济的发展，扩大吸纳就业的能力，对城镇待业青年从事自谋职业的个体经营、合作经营、合资经营、开办私营企业提供服务和指导，并帮助他们选择经营方向，支持他们合法经营。总之，要在积极推进就业机制转换的同时，尽可能地稳定社会就业局势，为就业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长春市经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黄振荣

沿海地区经济运行机制 外向转换的若干构想

洪耀宗 李剑锋

一、新的选择：从“自由外向”向“组织外向”的必然过渡

建立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沿海地区外向型战略中的一个极具重要的环节。沿海地区外向型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建立在资源国际流动与优化配置基础上的运行机制，它主要表现为国际市场导向下的政策行为和企业行为，并采用国际通行的规范指导和约束经济行为，以保证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国际流动与配置顺利实现。按照这一要求，近年来，沿海地区初步建立了一个包括关税制度汇率及外汇管理制度、对外贸易办法、市场价格机制等内容的外向型经济运行机制“雏形”。但是，如何按照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地促进沿海地区经济运行机制的外向转轨，则还存在一系列不足。因此，对沿海地区来说，也同样存在一个如何按照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进行组织和干预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组织外向”的问题。

1. 在起步阶段，由于政策刺激与内在需求的双重作用，外向型经济在迅猛发展的势头中总难免伴有不加选择的自发性，表现出“自由外向”的特征。外向型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模式，它必受价值规律支配，遵循经济规律的本质要求而发展。同样，外向型经济中的各种经济行为，也都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规划、有一个总的安排，否则，一哄而上、各行其是，则会削弱整体的开放能力，也不利于外向型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从目前来看，沿海地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自由外向”的特征还相当突出。一是认识上存在片面性。就是还没有走出单纯“出口创汇”的认识误区，唯“外向”而上，唯“外向”而尊，凡是有外向的，则要求一律“绿灯”，缺乏对项目的严格审查、科学把关，缺乏经济观念、效益观念，求量不求质，求广不求深，创汇不能创益，甚至有些项目仓促上马，失误较多。二是发展上存在盲目性。在发展目标上，各开放区几乎都把出口创汇、改革试验、高技术产业作为目标，目标雷同带来了模式的趋同，于是乎，盲目攀比、互相竞争，使赋予开放区的优惠政策逐步淡化。同时，由于缺乏统一计划，使换汇成本较低的初级产品出口放任自流，而盈利较多的消费品则大量进口，抵消了创汇收益，也冲击了国内市场。三是引进中存在无序性。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缺乏统一规划，在外资来

源方面，单一资金引进较多，而对技术、人才等要素则引进较少；在引进外资的投向结构上，一度曾经集中于加工业，助长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在利用外资的地区分布上，沿海地区与内地反差极大，加剧了地区不平衡，强化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也同样助长了产业结构的畸形化。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外向型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给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增加了难度，因此，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之后，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就应该努力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以实现无序向有序、“自由外向”向“组织外向”的必然转化。

2.“组织外向”的思路，也就是按照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立足现有基础，有组织地调整、完善，以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的有序发展，并最大限度地发挥沿海地区对内地经济的推动力。主要是：

(1)按照沿海、内地一盘棋的发展战略，通盘制订以沿海为龙头、内地为补充的梯级外向战略，有计划地实现沿海产品与内地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使沿海经济有一个较为充实的后盾。(2)综合制订沿海地区的产业政策和外资引进计划，就是要把引进外资与产业政策结合起来，使引进外资为产业政策的实现服务，以增大引进外资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波及效应。同时，在引进外资的结构上，要逐步有计划地趋于合理；在引进资金的数量上，要综合考虑到期偿还能力。(3)按照实现国产化的根本目的，严格对引进项目的筛选。无论是引进组装项目还是零部件，都要努力注重培育这些产品的国产化自给能力，做到边引进，边组织试制生产，逐步替代进口。在引进项目的筛选上，既要考虑项目的前后配套，也要防止重复引进。此外，还应强化对外商投资额、投资方式、投资比例的管理。(4)切实加强对现有企业的宏观管理，既要防止铺张浪费，嫌国家之慨的不良现象，也要努力保证国家赋予的政策发挥出积极效应，特殊政策要真正做到特殊贡献。落实企业的自主权，发挥董事会的职能作用，以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5)有组织、有计划地培育资金、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市场。(6)努力保证政策、法律的明确性和一贯性，既要以法律的、经济的手段管理外向型经济，也要充分体现计划调节的优越性。

二、企业经营机制国际规范化的几个相关问题

企业经营机制的国际规范化，需要在企业产权关系、利益与风险、经营机制、收入分配机制、领导体制等方面逐步完善，以建立起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企业组织和企业经营机制，但同时，还必须解决有关的几个问题：

1. 现有企业如何从总量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化的问题。可以说，前一阶段的沿海外向型经济还基本上处于总量速度型的阶段，扩张项目、铺摊子、争规模刺激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这一特征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外向型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就要注重在大力引进项目、引进资金的同时，促使现有企业走上质量效益型的轨道，在原有的总量速度中注入质量效益的优势，在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中注入技术密集型的优势。实现这一目标，在目前要采取以下一系列措施：(1)对现有的创汇企业进

行细致分析，综合考察其吸引外资、创汇及增益的能力，对一些虚假的外资、合资企业，对“有名无实”的外方投资，对以小汽车等非生产性消费品为主的外方投资要认真进行清理。（2）对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合理规划，有步骤地督促其引进技术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生产发展能力。（3）引导现有原料、市场“两头在外”的企业，逐步发展成为资金、原料、市场“三头在外”的独立企业，积极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形成自身的优勢。（4）有条件的企业应逐步直接跻身国际经济舞台，在国外建立自己的“桥头堡”，并以此为窗口，直接参与国际竞争，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

2. 如何使政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目前，各开放区都实行了一系列的区域优惠政策，使沿海地区借助这些政策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政策优势的出发点还是在于激发经济优势，这就要求这一地区的企业尽快借助政策优惠的推动，壮大自身实力，增强自身发展能力，长出自己的“翅膀”，从而以较为优越的投资环境，以较为扎实的经济基础吸引外资，求得发展。变政策优势为经济优势，既需要国家适时调整优惠方式，逐步将区域优惠转化为产业优惠，以限制低档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同时更需要企业自觉从依赖政策的环境中走出来，以现有项目为基础，强化自身的经营管理，促使企业自身上档次、增效益，保证生产过程的高效运转，在管理思维上不断创新，在管理意识、管理方式、管理手段上自觉更新，以较强的综合实力参与国际竞争，抗御风险。

3. 如何促使企业自觉进行技术进步的问题。对外向型企业来说，自觉提高自身的“技术参数”，是适应世界经济技术密集型产业传递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保证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稳定提高的现实要求。国际竞争，说到底也就是技术水平的较量。这就要求外向型企业自觉坚持技术进步，在技术进步中求生存求发展，在不断扩大出口创汇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替代，实现企业技术由低级向高级的阶梯逐步跳跃，形成出口创汇——技术引进——消化创新——扩大出口——再引进创新的循环扩大机制。在这方面，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环节：（1）有计划地制订企业技术进步的规划，确定技术发展方向，制订相应的技术发展长远规划及分期步骤。（2）在引进外资的同时，要注重技术、人才、管理经验的同步引进，有一个技术进步的紧迫感与责任心。（3）引进技术必须同消化、吸收相结合，发挥技术引进的效能，逐步推动引进设备的国产化，并加以创新。（4）国内的信贷配套应努力在技术改造上花功夫着力，应适时发放技术改造贷款，支持企业技术进步与创新。

三、借助开放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支柱

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还是要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加速国民经济的步伐，以促进经济振兴、国家繁荣。因此，发展沿海的外向型经济，还必须努力为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培育增长点，使外向型经济成为推动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就是借助开放区的“辐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支柱。在这方面，目前沿海地区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领域作出尝试。

1. 积极组建城乡结合、沿海与内地相结合的外向型企业集团。就是要促使外向型企业在采取联合进攻的战略，集中力量，形成联合的整体优势，改变目前单个企业势单力薄的竞争劣势，以达到共同占领国际市场的目的。因此，沿海地区应逐步把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企业集团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应通过开放城市龙头企业与农村乡镇企业的联合、沿海企业与内地企业的联合，带动一批农村企业、内地企业一同参与国际竞争，在企业集团内部合理分工、各司其责，保持协调、稳定发展。

2. 借助分工“辐射”，扩大初级产品对国内经济的推动力。在外向型经济中，如果出口的大多是后向联系较少而前向联系较多的初级产品，那么，对国内经济的推动力就很小。因此，沿海地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必须充分发挥初级产品对国内经济的推动，通过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建立与内地分工协作的经营机制，理顺利益分配机制，使内地能够在沿海经济的“辐射”下，享受“连带性”利益，促进内地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因此，必须在发展步骤上，与内地通盘考虑以建立新型的、多样的分工和协作关系。

3. 注重发挥外向型经济在结构调整中的牵动力。从根本上说，外向型经济战略实质上也就是结构调整和优化战略，因此，必须不失时机地加速结构调整，促使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在调整中趋于优化。在调整中，沿海地区应领先一步进行产业结构外向转换，选择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模式，自觉实现由开放型向集约型、由单纯型向协调、效率、高级型、由总量速度型向结构效益型、由短缺型向取长补短型的转变，促使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率先高级化。其次则是依据沿海的产业现状，推动内地逐步形成相适应的、梯度的产业结构，以促进整体的产业结构合理化。

4. 注重引导农村乡镇企业在外向型经济中的作用力。乡镇企业要突破办几个外资、合资企业的局限，大胆地、全面地参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要立足于带动农村、充分发挥农副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创汇优势这一思路，促进乡镇企业自身的逐步提高和有序发展。(1)要积极建立“贸工农”的出口创汇基地，以农副产品为原料，形成一条龙深度加工的产品体系。(2)要自觉实现资源和市场的转换，从相对稳定的国内市场转入到风险极大的国际市场，建立既能创汇，又有效益的经营机制，在转变过程中逐步使经营意识、管理手段规范化。(3)乡镇企业要努力成为高效率的实体，参与国际竞争，形成规模效益，以大城市为依托，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过程中调整、充实、提高。

四、一个突破口：信贷行为的转换思路

作为重要的经济调节杠杆，信贷应成为沿海地区经济运行机制外向转换的一个推动力，要有一个领先参与的自觉性，而不应成为“滞后”调节的工具。否则，就不利于沿海外向型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作为突破口，这一地区的信贷行为应实现一系列转变。

1. 应由“被动跟进型”向“主动介入型”转变。以往，沿海地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普遍存在着忽视国内信贷介入的现象，项目论证与银行的信贷论证脱节，使一些外资项目的国内信贷配套没有列入信贷规模内，留下了信贷缺口，对有些项目，事后经银行论

证，明知不能投入也被迫投入，增加了国内信贷配套的风险性，也削弱了信贷对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调节功能，因此，在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过程中，信贷行为要首先实现由“被动跟进”到“主动介入”的转变。信贷要增强为外向型经济服务的自觉性，在思想上要从习惯于国内经济循环和发展服务的思路中解脱出来，大胆、主动地参与国际交往，经营国际筹资融资业务，造就良好的金融环境。要帮助引进资金，以保证对外引进的计划性，要改革现行政策和规章制度的束缚，以适应外向型经济的需要；要通过信贷杠杆的介入，促进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要通过信贷参与，有计划地培育外向型市场，组织外向型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要提供全方位、多功能的信贷服务，增强信贷的参与力；通过信贷的全方位介入，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外向型转换。

2. 应由“直接供给型”向“间接市场型”转变。直接供给并带有行政压力的信贷行为，滋生了外向型企业资金上的依赖性，使这些企业在国内资金方面先有了一种优越感，因而也就可能使这些企业在资金使用上兼有了更多的盲目性。这种供给方式，实质上也是传统信贷管理体制的承袭，并不利于外向型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这一地区的信贷供给方式，应逐步由“直接供给”向“间接市场”型转变，应较多地引入市场融资机制。这样，一方面可以极大地调动企业合理使用信贷资金的积极性，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助于促进企业强化经营管理和经营意识，促进管理的有序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努力降低这一地区信贷供给的风险性，推动资金市场的逐步形成，培育市场机制。实现这一转变的途径，在于启动证券市场、开展代发股票债券业务，推动企业直接参与融资，让企业的资金供求双方直接见面。通过市场融资机制的培育，来实现资金供给的市场化。

3. 应由“结构单一型”向“组织联合型”转变。随着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经济联合的日益增强，跨行业、跨部门的企业群体与企业集团将逐步增多，单一的、垂直的信贷体制将越来越不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因此，从目前金融体制的现状出发，就要有步骤、有选择地引导信贷部门走向联合，组成联合型的信贷实体，组织银团贷款；通过联合，承担大型联合型企业的信贷服务，在联合体内明确职责，发挥群体效应，以支持外向型企业的联合发展。

作者单位：江苏苏州市农业银行

责任编辑：谭湛明

广东经济开放的探索与启示

沈贵进

从1979—1990年历时12年的对外开放，广东经济发展基本上完成了从封闭循环到开放循环的转变，经济外向化程度大大提高：一是外资实际投入在全省社会总资金供给（由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外资投入资金三部分构成）中比重迅速提高，由1979年的1.2%上升到1989年的8.5%。这不仅反映广东经济发展中解决资金短缺制约出现了新渠道，而且更加深刻揭示了外资流入对国民经济成长的巨大支撑作用。从外资流入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这一指标变动（由5.8%上升到37.5%，增加31.7个百分点）来看，则外资流入对广东固定资产的积累和国民经济技术装备更新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二是技术引进和直接投资带进的市场、技术和管理等经营资源，成为广东国民经济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广东不仅通过技术引进对大批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加速了企业技术进步，使大批老企业焕发新姿；而且通过与外商合资合作，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了技术实力和竞争能力，拓展了国际市场，提高了广东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三是出口贸易对国民经济成长的牵引带动作用日益增强，出口依存度大为提高。1979—1989年广东出口年均增长20%，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2%，出口增长高于经济增长8个百分点，表现了明显的出口带动作用。出口为国民经济创造、提供了新的增长源泉，1979—1990年广东出口依存度（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8%上升到39%，上升26个百分点，出口依存度的提高意味着出口贸易的超前增长为经济增长开辟了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国内生产总值的越来越大的份额必须通过国际市场转换才能实现，从而社会再生产的循环由过去的封闭式内向循环转向依靠国际市场实现的开放式外向循环。

经济外向化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通过它我

们可以在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国民经济发展冲破地方的民族的疆界，在与国际经济的循环中缓和以至消除经济发展的资金与技术瓶颈，使象广东这样的落后地区较快地冲破经济增长的低水平均衡和贫穷——低经济增长——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使国民经济迅速步入起飞的阶段。另一方面，外向化又必须适度，过度的外向化易于导致过度的对外依赖，这又会妨碍经济增长，拉美国家工业化的事实在这一点上证明了这一点。

二

对外开放，既是广东经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又是70年代末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变动赋予广东的先行探索重任。转瞬间12年过去了，广东先行探索有哪些显著的效应呢？对此，目前仍是褒贬不一。我认为，广东经济开放的探索效应主要有三条：

一、对外开放具有强大的“引擎效应”，开放成为广东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有力杠杆。国民经济由封闭体系转向开放体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它不仅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制约，而且成了国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的“引擎”、新的动力源，极大地推进了经济体系的全面更新与再生。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外开放为广东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参照系。10多年来广东市场取向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长足的进展，这与广东先行开放、率先使经济发展的封闭体系转向开放体系是分不开的。广东采取的一系列下放对外经济活动经营权与管理权、给外商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制定的一系列方便进出和提高行政办事效率的措施等，都是参照了国际上通行做法所作的重大改革步骤。实践证明，改革必须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与特点，使改革措施有利于对外开放，这是一条重要的原则。二是对外开放促进了广东发展模式的转换。对外开放前，广东实行的基本上是以内部积累资源要素来获得发展

的模式，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的低水平积累状态下，经济发展缓慢，且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外开放为广东提供了要素资源积累的新源泉，通过对境外资金的利用、技术与设备的引进消化和先进管理方法与经验的移植借鉴，加快了经济发展的积累过程，改善了积累结构，有效地促进了由过去封闭积累发展经济的模式转变为开放积累发展经济的模式。三是对外开放为广东经济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在封闭状态下，广东经济发展空间限于同样封闭的国内市场。对外开放大大延伸拓展了广东经济的发展空间。通过对国际市场的不断开拓和参与，广东的对外经济联系已扩大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解决了广东1/3以上的投资来源，实现了广东1/3以上的社会总产值。对外开放在拓展发展空间的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发展机遇，其中尤其是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转移带来的机遇。广东在过去12年及时地把握了这个机遇，更新了轻纺服装等传统产业的技术，兴建了大批新兴产业，发展了旅游、化纤、电子、家电、音响等一批现代产业，加速了广东产业结构的更新调整和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壮大了广东的经济技术实力。

二、广东对外开放具有显著的“先行效应”，起到了全国改革开放“窗口”作用和辐射枢纽功能。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经济上增加对中央的财政贡献。对外开放搞活了广东的企业，尤其是作为特殊政策组成部分的财政包干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东各级政府生财聚财的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广东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全省预算内财政收入由1979年的34.28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29.35亿元，年均递增12.8%。与此同时，广东对中央的财政贡献也连年增加，由1979年的8.2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52.5亿元，累计上缴245.2亿元，年均递增18.4%，高于同期财政收入5.6个百分点。二是“窗口”效应。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在先行开放探索中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与做法，有力地促进了内地改革开放的进程。三是促进内地与国际市场相连接的枢纽功能。广东在对外开放中，既发展与内地的广泛经济技术联系，又向内地转移辐射开放的成果。12年来广东坚持不懈地为外商和内联企业改善投资环境，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内地到广东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优惠鼓励政策，兴办了大批内联企业，促进了内地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三、广东对外开放还具有特殊的示范效应，它向世界证明了中国通过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选择。广东对外开放探索的成效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已经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上。广东的先行开放探索在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使我们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轮廓具有了日益清晰的认识。

三

广东的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广东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正确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及时把握国际机遇，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初步走出了一条从实际出发发展开放经济的好路子，对全国各地发展外向型经济也具有一定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一、塑造开放综合优势，充分发挥优势，是发展开放经济的基本前提。

广东省毗邻港澳，对外经济交往方便，同时广东又是全国著名的侨乡。这种地缘人文优势早已存在，但在改革开放前并未对广东经济发展起到大的作用，优势只是潜在的，并未化作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优势。70年代末，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动，党中央果断地把全党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赋予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行探索的重任和相应的政策措施，使广东拥有较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具有了显著的政策优势，从而具有了把潜在优势化为现实优势的有利条件，形成了促进全省开放经济蓬勃发展的开放综合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一）在政策因素作用下，地缘因素的地位发生质变，由国际前沿变为开放前沿。尤其是在广东开放时香港已经历20多年高速增长并成为远东国际经济中心，更强化了这一地缘因素在广东开放中的突出地位；它不仅有利于广东充分利用其高效率的贸易办事机构、广泛的国际贸易渠道和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发展对外贸易；而且有利于广东充分利用其发达的银行制度、灵活多样的融资渠道和规范完备的金融管理条例，解决广东建设资金来源；还有利于利用其发达的运输和通讯系统，享有沟通和建立国际经济联系的便利，提供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合作的有利条件；更有利于广东借鉴其开放的体制，学习其成功的管理和经营经验，按国际惯例营造投

资环境和加速体制改革进程。（二）政策因素改变了人们对广东固有的人文因素的看法，作为著名侨乡和发展商品经济悠久历史的人文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在封闭状态下，“以阶级斗争为纲”迫使人们对广东华侨港澳同胞众多和发展商品经济历史传统等人文因素采取对立甚至敌对的情绪。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其他一系列政策的落实，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广东固有人文因素的评价，使人文优势由潜在变为现实，为广东经济开放提供了巨大宝藏：外有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同胞的呼应支持；他们不仅为广东开放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信息、牵线搭桥，而且对家乡踊跃捐资、投资，兴办各类事业；内有发展商品经济的肥田沃土，广大人民不仅用商品经济的眼光、观念来衡量支持改革开放政策，而且善于与外商合资合作，释放出发展生产力的创造性智慧与巨大干劲。（三）政策优势塑造了人才优势，不仅造就了人才，而且产生了人才聚集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广东人才劣势状况。开放政策的实行，在广东大地不仅造就了一批懂开放、善经营、会管理的干部队伍。对外开放政策还在广东产生了人才聚集效应，吸引了海内外大批具有现代商品经济意识与观念的经营管理人才、具有专业技术和一技之长的工程技术人才以及学有所长的科学的研究人才汇集广东，对广东经济的开放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开放实践中依靠政策优势来发挥固有优势，并塑造新的优势，形成对外开放的综合优势，这是广东发展开放经济的一条重要经验与启示。

二、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创造条件按国际惯例办事，是发展开放经济的客观基础。

投资环境的状况及其吸引力大小，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利用外资的成败。广东省在对外开放初期，碰到的一大难题就是投资环境不适应开放经济发展的要求，不仅在硬环境方面基础设施落后，而且软环境方面存在着经济体制封闭僵化和行政效率低下。实践使广东认识到，只有优惠政策而没有整体优化的投资环境是不行的。因此，在经济开放实践中，广东省十分注重投资环境建设，并随着开放经济不断发展而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始则注重开放区域（主要是特区、开发区）的“七通一平”的硬环境投资，继则注重全省交通运输、邮电通信、能源电力、旅游服务等基

础设施建设，近几年来则加快了地方铁路、高速公路、大型核电水电等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揭开了90年代广东开放发展的序幕。广东在开放实践中，不仅重视硬环境的改善，而且十分重视软环境的改善。既切实兑现已出台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种种优惠政策措施，又根据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的特点不断提高行政办事效率，同时加快市场取向性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不断深化两种体制接轨的探索，为外商企业按国际惯例经营管理创造体制条件。广东开放实践表明，投资环境始终是影响利用外资工作的重要问题。要办好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就要改善投资环境；要不断扩大利用外资，就要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只要对外开放不停顿，投资环境就必须不断改善。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既是贯穿开放经济运行全过程的规律性要求，也是广东实践提供的一条重要经验与启示。

三、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地选择经济开放方式，是发展开放经济的现实途径。

当代国际经济联系的日益深化，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经济开放方式。既有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制作等转移生产的方式，也有举办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这种对资金、技术和管理“一揽子”引进的方式，还有直接对外借款和租赁设备来适应企业的方式。所有这些利用外资方式，都各具用途，各有利弊。广东在开放中坚持从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根据自己所具有的条件，有的放矢地选择使用，收到了较好的实际效果。开放初期，广东根据建设缺资金、生产缺技术、出口缺市场、开放缺人才的实际情况，选择了投资少、风险小、带设备、带市场、上马快、见效快的举办“三来”企业方式，既提供了大量就业，安置了大量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又增加了外汇和财政收入，积累了技术，锻炼了人才，加速了资金积累，为后续开放多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举办“三资”企业这种既不承担债务又能一揽子引进外商资金、技术和管理的利用外资方式成为广东“六五”期间主要的利用外资方式。据统计，“六五”期间全省“三资”企业合同利用外资额占全部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达80%，对全省经济在“六五”期间的持续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广东经济实力的增强，“七五”期间则加大了对外直接借款和租赁设备兴办企业等利用外资方式的份量，更多地采用对外贷款还款、贷款还物、货物还物这类能

自主确定产业投向、自主选择进口设备技术、自主建设企业、自主控制出口流通环节的利用外资方式。在合同利用外资额中，举办“三贷”企业由“六五”期间平均每年几千万美元上升到“七五”期间每年平均9亿多美元，有力地改善了利用外资结构，加强了全省急需发展产业的成长。实践证明，有的放矢地灵活选择经济开放方式，既是在开放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和不断提高开放能力的客观过程，也是从省情实际和经济发展需要出发最大程度地发挥各种开放方式对实现开放目标促进作用的好经验。

四、面向两个市场，把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相结合，是发展开放经济的正确模式。

广东是毗邻港澳的沿海开放地区，具有实行出口替代发展战略的显著优势，但广东并没有单纯走出口替代的发展道路，而是根据本身处于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结合部以及国内市场供给短缺的特征，在开放中坚持“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国内市场为依托”的发展取向，把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结合起来，发展各自的优势与功能。10多年来广东出口替代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大力发展有竞争能力的轻纺产品出口以替代初级农矿产品的出口；进口替代的主要发展方向，是通过大量引进设备技术发展高档消费品的生产以替代国内消费市场相应产品的进口。在出口替代方面，广东通过大力发展轻纺工业制成品，逐步替代农矿初级产品出口，从根本上改变了出口商品结构，1978—1989年在出口总额中轻纺工业制成品比重由29.7%上升到53.2%，同期农副产品出口比重由38.7%下降到19.4%。在进口替代方面，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生产线和关键设备，发展了自己的进口替代产业，据不完全统计，自省政府1986年发布《关于以产顶进、替代进口的试行办法》以来，全省先后审批公布了替代进口企业157个、产品163个。进口替代产业中，发展最快的是家用电器工业，广东目前已成为全国主要家电工业基地之一，生产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音响设备、电风扇、空调器等高档消费品畅销全国市场，满足了国内市场需要，替代了同类产品的进口。出口替代与进口替代相结合，为广东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获得了对外对内的双重比较利益，有力地带动了经济高速增长。现在广东社会总产品中1/3依靠国际市场实现，2/3依靠国内市场实现。实践证明，

面向两个市场，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相结合，是发展开放经济的正确模式和成功之路。

五、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是发展开放经济的基本保证。

发展开放经济，要求具有与之相适应的开放式经济体制。开放经济的不断发展，必须以改革的不断深化、开放式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为条件。广东以改革促进开放的显著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改革了中央与广东的体制关系，为广东发展开放经济奠定了宏观体制基础。开放之初，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计划体制、财政体制、外汇体制、信贷体制和价格管理体制等方面确定了广东的政策权限，划定了中央与省的关系。这些重大的改革措施，是广东在对外开放中能够先行探索的先决条件，为广东充分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人文地缘优势，实行对外更加开放的政策奠定了宏观体制基础。（二）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初步提供了有利开放经济发展的体制保障。为了确保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和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广东进行了比全国步伐更快、幅度更大的市场取向化改革探索。一是抓住企业这个市场活动主体的改革，赋予其独立和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地位，扩大和落实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重塑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二是推进价格改革，通过放开搞活，不断加大市场调节比重，形成目前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二八开的格局，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三是注重市场发育，加快要素商品化和市场体系化的改革进程，为开放经济活动提供日益健全的市场环境；四是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逐步缩减直接管理的范围，把大量经济活动放给市场去调节引导，把政府的主要精力逐步转向塑造公平竞争、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三）加快对外经济活动领域的改革进程，直接为发展开放经济服务。广东在中央授权范围内，坚决而有步骤地改革了外经外贸体制，一是下放了对外经济活动的经营管理权。制定了不同地区的政策待遇，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发展开放经济格局，并充分调动各市县、企业发展开放经济的积极性；二是建立出口生产体系，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权、责、利的规范把贸、工、农、技各方自愿组合成产、供、销合一的有机整体，大大促进了外贸出口的发展；三是实行工（农、

（下转第29页）

高技术经济理论述评

阙机龙

当前，世界高技术的研究不断向纵深方向延伸，它不但研究电子、微电脑、智能机器人和生物技术等高技术产业，而且涉及高技术产业的布局，更重要的是它还研究高技术的未来。一场高技术“革命”正在席卷全球。了解这场“革命”的信息和主要的理论是必要的。本文着重评述如下五个方面的理论。

一、区位决定因素理论

产业总是布局在一定的区域里，然而不同的产业因为产品和生产功能的不同，对区位因素的要求不同；而不同的区位类型也因其区位因素的差异，适合于不同产业的布局。产业和区域两者互为要求。在实践中，我们必须对两者加以研究，选择出最能满足特定产业活动的区位类型和最适合某一区位类型的产业活动。

在高技术产业布局中，区位决定因素的选择因人而异。有人认为气候影响、生活质量、电力供应及州际间的高速公路是区位决定因素。里斯（Ress）和斯坦福（Stafford）代表美国技术评价办公室指出，与高技术产业显著相关的特征是：依赖专家、技术工人、科学家以及受过训练的劳动力；减低交通运输的相对成本；为国际和国内市场生产特定的产品；较少受原料产地和市场的限制。这些特征表明：专门的技术人才、高质量的生活环境、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所，是高技术产业布局的重要区位因素。

区位决定因素理论系统地研究不同产业活动所需的区位因素，研究结果简单明了，能很好地被政策制订人员、决策人员及公众所接受；通过对特定区位因素的抽象研究，我们能发现对于某一具体产业来说，区位决定因素中哪些是受政策影响的（如道路），有哪些是不受政策影响的（如气候）。

但是这种理论也有明显的缺点。

第一，对于具体的产业，需要具体的、与之相适应的区位决定因素的研究。这就意味着，有多少种高技术产业，就至少有多少种区位决定因素。实际上，不同的研究人员研究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布局就会选取不同的区位因素；即使是相同的产业、相同的布局，在选择区位决定因素上也会因人而异，因为研究人员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是不尽相同的。因此批评者认为，区位决定因素理论没有给我们提供有意义的理论规范。

第二，在定义上，区位决定因素理论中的“因素”好象是具有“决定性”的，然而问题在于，它没有解释为什么具有相同区位因素的区域都朝不同方向发展，或者为什么同样类型的产业能在不同的区域进行生产。与其说这些“因素”是决定性的，倒不如说这些“因素”只不过是“条件”更好，因为这些因素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机会。

第三，它忽视了个人因素，这是很不现实的。高技术产业的布局也许是决策人员考虑到整个地点的长处，或者是某一方面突出的优势而拍板的。但是要获得完全合理的决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决策者本身的素质、才能和胆识不可能十全十美，何况决策总是基于决策者个人对区域的主观看法，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并不都有很严密的逻辑。有时候，对于某一具体产业的事后研究而得出的区位决定因素与当初决策者拍板时的动机和想法相去甚远。

第四，这种理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它仅注意到影响高技术产业的外界因素及其变化而忽视了高技术本身。高技术产业可通过诸如对当地劳动力的培训给自己创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当产业出现集聚时，产业之间的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能使产业朝最大利润运转；这时

产业集聚内部的功能作用比外界因素要重要得多。

第五，从系统地理学观点来看，一些高技术产业并未受到区位因素的影响。譬如美国超电子计算机工业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西摩·克雷(Seymour Cray)这个杰出人物。他在威斯康辛州的齐伯瓦·福斯(Chippewa Falls)设有研究中心，而他的公司总部却设在附近的双胞胎城。从理论上讲，超级计算机作为一种产业，可以在任何地方创办并进行生产。

第六，虽然一些区位决定因素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的重要性却可能因这些因素地区分布差异性的缩小而衰退。在美国，水和电的供应无处不在，但在50年之前，它们还是主要的区位选择因素。现在随着计算机和光纤微波通讯系统的应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因此在不断成长的产业中，一些区位因素如距离、便捷性和交通等的重要性正在降低。

最后一点，有很多的区位因素似乎很重要，比如“生活质量”和“大学效果”，然而若想用数量加以表示的话，却很困难。

由于有上述的缺陷，很多学者不再把区位决定因素理论看作是“金科玉律”。然而，区位决定论方法仍不失为未来研究过程中确定因素的重要方法。

二、长波理论

长波理论最早由苏联经济学家康得拉季夫(Kondratiev)所创，因此又叫康氏周期或K一周期。它是康得拉季夫从一系列的价格和利率的统计中得出的。后来，孟奇(Mensch)和熊彼特(Schumpetr)在康氏基础上，建立了用以解释产业发展机制的框架。

康氏理论认为典型的长波周期可持续45—60年之久，这可以从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观察出。在每个周期内，可分为持续较长时间的扩张阶段和持续较短时间的收缩阶段。第一次康氏周期发生在1818—1842年，第二次发生在1843—1897年，第三次在康氏时代时还没完成，不过可分析出是在1898—1940年。霍尔(Hau)和露丝维尔(Ruthwell)预测第四次康氏周期将发生在1940—1995年。

德国经济学家孟奇曾调查了过去200多年里有关发明和革新的情况。他总结出两种革新，一

种是“基本性革新”，它能导致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另一种是“促进性革新”，它只是促进经济的成长。历史上，发明和革新层出不穷，但是“基本性革新”却犹如凤毛麟角般少得可怜，并且历时很短，如在1764、1823—1826、1886—1888、1935—1938这几个年份里。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些“基本性革新”年份预示了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份，在它们各自随后的11~17年就会出现康氏周期中的上升阶段。富有戏剧性的是，所有这些“基本性革新”都发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萧条阶段。孟奇预测下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份”将在1989年，因为西方社会将自1984年开始进入一个持续10年的最大程度的革新年代。

熊彼特在这基本的年代框架中洞察其内部的变化，他强调了创业者和技术革新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发育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产品标准化了，这时新企业的出现必然与旧企业竞争。新的竞争迫使生产者把产品价格降低到边际生产成本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商品的出售价格与投入资源的价值相等，整个社会可从有效的资源配置中获益。可是，这时候的生产者利润等于零。熊彼特认为在这关键时刻，革新成了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唯一重要的利润来源，要么降低生产成本，要么研制新产品，开辟新的市场。

康氏周期的收缩阶段是以衰退为主要特征的，这时利润下跌，市场趋于饱和，企业为占领市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这就为发明提供了契机。一些发明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的问世和应用为全新的产业发展揭开新的篇章，成为推进产业发展的基础。第一次康氏周期就是与蒸汽机的发明和铁的应用相关联的，第二次与铁路和钢的出现相关联，第三次与电子、汽车和化学相关联，第四次与电子、宇航空间技术有关，第五次也许与微机处理、生物技术和新能源有关。每一个革新都带来了康氏周期的扩张阶段。这时别的发明也可藉此机会转化为商品。扩张阶段的结束又是“战争”的开始，因此周期不断循环往复。

有意思的是，学术界本身对长波理论的注意和兴趣也具有康氏周期的特征。最早注意长波理论的学者可追溯到1913年的荷兰经济学家梵·哥尔登尔(Van Gelderen)。在20年代和30年代，人们对康氏理论的兴趣逐渐上升，在80年代达到高潮。其原因可归纳为，继一次世界大战和30、60年代空前绝后的经济繁荣之后，出现了大萧条

时代，经济迅速变化带来的震惊使得经济学家从依赖短期的以生产为基础的理论转变到关注灾难性的与结构变化相关的理论中来。

弗里曼(Freeman)和霍尔以及其它学者很推崇这理论，因为康氏理论的一般框架有助于了解高技术现象的基础，这就是：创新产品是揭开新的产业篇章中的“核心”产业的基础。康得拉季夫—熊彼特—孟奇的长波理论把现在的高技术现象置身于漫长的历史背景中去，并且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变化相联系起来，它提出了让个别创业者和创新产品去扮演现代高技术化身的角色，开辟了科学转向商业化之路。这些都是长波理论的优点，并且长波理论作为解释模式，确实是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因为它能吸引一大批信仰不同、信念不同的学者。

然而，长波理论却给人一种神秘感：冥冥的历史长河中，经济的发展好象有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和一成不变的动力。实际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却置身于个别杰出人物的控制之下，如华盛顿、拿破仑和希特勒。在他们的年代里，他们对经济发展具有循环往复的上升期和下降期的特点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主观地实现这种周期性了。再说，把相同的历史制度强加给不同的世纪，也忽视了不同年代间社会和政治的重大差异，而这些重大差异无疑会影响每一个新的周期所发生的准确时间和地点。例如在1825年和1989年就存在着许多方面明显的差异：科研团体、研究和开发制度的现代化、经济决策中的控制、人口的教育水平、财政机构的性质、政府的职能和作用、对解决战争等问题的态度以及国际调停机构的存在等等。这些情况的不同会导致两个时代科学水平和社会状况的不同，但这些都被长波理论所忽视了。长波理论还假设了在经济发展的上升期新技术能够迅速地与社会经济生活相结合，从而忽视了社会、政治以及文化不是很快就能互相协调的现实可能性，事实上，它们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协调起来。

因此，长波理论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构筑一般的年代框架来解释社会、经济。尽管对K—周期的解释多种多样，如弗里曼认为下降期资金集聚，而曼德尔和福雷斯特则认为相反，但长波理论仍不失为一个富有新意和魅力的“公式”，而且也是透视高技术的框架。

三、产品利润周期理论

产品利润周期是马库森(Markusen)等在研究高技术时发现的。与传统的周期相比，它适用范围更为广泛，时间系列也更长。他们认为重大技术革新的结果导致了所有产业的发展而不只是狭义上的产品演化。简单地说，就是任何产业——不只是高技术产业——都要经历四个连续发展阶段。

第一是“革新”阶段，生产活动表现为设计新产品和新产品的商业化。这个阶段的特征有：出现新企业，获得超高额利润，这些利润又迅速返回企业；生产是小批量的；产品需不断完善和修正；劳动力主要由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构成；布局的空间特点是在原有的生产中心周围地域集聚，以充分利用信息和服务。

第二是“市场渗透”阶段，这时产品设计已趋定型，可以进行大批量生产。劳动力中管理和销售人员变得更加重要。增长是以温和的速度进行的，利润已降到“常规”水平。当标准化的产品生产搬出原来的生产中心而布局在较便宜的区域边缘地带时，劳动力也随之分散，这时原来的生产中心因剩下少量产业工人而变得专业化。

第三是“市场饱和”阶段，企业各自为占领市场而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根据马库森等人的观点，这个阶段存在两种发展战略。一是竞争战略，企业用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率等措施来击败对手；二是少数企业控制市场的垄断战略。这两种战略所关注的不是在价格上的竞争，而是在市场管理、观察和研究对手、劳工团结、提高劳工在管理和行政事务方面的参与权、成立工会组织等方面的竞争。这个阶段以产出不高也不低，就业上升为其特征；生产的非中心化加速进行；伴随着明显的极化现象，从事市场管理、研究产品差异、研究竞争对手等的劳动人员将留在中心，而从事标准化产品生产的大部分劳动力将转移到中心外部地区。由于这些劳动力在不同的区域从事不同的生产，区域间的差异便因此而扩大。

第四是“合理化”阶段，来自国外的竞争以及新技术的出现，使产品价格下跌；利润也随之下跌。公司为了加强竞争能力，只好缩小生产规模，或把公司移居海外以降低生产成本，或使生产多样化。生产重又集中在少数区位上，就业水

平也有所下降。

在产品利润周期中，作为利润变化指标的就业增长率近似于一条随时间而变化的常态曲线。对1947—1981年间29个高技术产业的调查结果也表明这一点，马库森等把它们分成五组：有6家企业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革新阶段，有7家处于温和增长的市场渗透阶段，有6家处于成熟期的市场饱和阶段，8家处于合理化阶段，还有7家正处于过渡变化之中。

产品利润周期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传统的产品周期论观点；同时也融进马库森自己早期研究利润周期和少数企业对市场垄断等成果，以及参考了长波理论的不同观点。因此，它成功地把商业机构的组成、产品特征和市场缺陷结合起来，构筑了新的理论。它的主要优点在于：第一，它超越了众多产业的表面特征，因而对绝大多数产业来说，它具有广泛的应用性；第二，它与实际情况吻合得很好。富有意义的是，它不因为高技术那令人眩目的性质和影响而赋予它以特殊的地位，只是把它认为是任何产业演化中的某一过渡阶段而已。

产品利润周期理论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它的四个阶段上。可以说，这四个阶段及其特征都是在实践结果中加以归纳总结的，但是这种归纳和总结却忽视了一些问题。如四个阶段非得按这种顺序排列吗？有必要都出现四个阶段吗？还比如：对于一种具体的产业，每个阶段该持续多长时间？在第三阶段特征中，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和分散就是如此吗？甚至为什么同样的产业在同样的地理位置却有不同的演化？这些问题，产品利润周期理论都没有回答。斯科特(Scott)和斯特普(Storper)就曾经提出过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半导体工业能在圣大克拉雷(Santa Clara)迅速成长，而在同一地区如凤凰城(Phoenix)和达拉斯(Dallas)却不行？前者也只不过拥有极有限的几家企业。

四、生产组织理论

这是斯科特和斯特普批判了区位决定因素理论和产品周期理论后提出来的新理论。它是基于“劳动力的生产分工、生产活动内部之间的结构以及在地方发展模式中不同的经济集聚”基础上的理论。简单地说，生产组织理论认为市场的扩大给生产规模的发展提供了潜力，而生产的扩大

可通过市场调节（垂直分异系统）进行；市场可以把企业综合体的外部或者内部（垂直整合系统）联系起来，随着企业综合体的成长，必要的劳动力数量也随之增多，以支撑起集聚经济的发展。但集聚到一定规模后，非经济集聚出现了，企业综合体得寻求新的布局场所。这时技术的变化就非常重要了，因为技术变化可产生新的主导产业群。这些产业群可利用不同的原料、技术生产不同的产品，使空间经济发生急剧变化。斯科特和斯特普的主导产业群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基础。

斯科特和斯特普的理论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它也汲取别的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它们中的“主导产业群”相似于长波理论中的“核心工业”，只是另含“驱动力与技术经济活动及其产品的关系”的意思。他们的真正贡献在于强调了（1）内在的资本与劳动力关系，而不是社会范围之外的技术变化；（2）以企业为单位的生产组织是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生产组织理论从众多不同领域的企业组织理论、社会和政治理论中吸取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它能解释历史中的偶然性和特定的地理布局。它提出了地方政治和劳动力等问题。它通过强调密集的生产活动以及专业化和生产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灵活地解释了在不同的时空里众多的甚至是矛盾的空间现象——如集聚、转换和再集中。

然而，理论尽管完美，但一些实际问题仍未解决：第一，强调市场是约束系统并没有解释非市场因素对高技术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早期阶段。比如美国国防部就使高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摆脱了短期利润的诱惑，使高技术的发展与现有的军事基地空间系统结合起来；此外它还提供早期需要的高技术产品，因此非市场因素也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第二，它们强调众多的合适的地方劳动力是高技术布局的主要因子这一特征并不适合于某些高技术行业。比如生物技术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不多；超级计算机产业仅需要几个关键的专家，而不需要很多的专门劳动力。第三，新技术带来的新空间经济的发展宏图虽然在学术界很令人满意，但却不能为政府决策人员提供可直接利用的明确信息。

五、社会空间系统理论

与斯科特和斯特普的理论相比，卡斯特罗

(Castells)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种更为广泛而且主要是经济方面的理论。它主要研究“技术经济转化”和“社会一空间系统”。卡斯特罗认为目前的技术革新有两大特征：第一，技术发明的目标是“信息”；第二，关注过程而不是产品。因此新技术有三大影响。

第一，新的通讯技术带来的“空间流”打破了“地方封锁”，因此产生了“新的生产空间”。第二，办公自动化，“电子规划”和微波通讯等技术，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城市形态。不过他认为这种影响具有空间上和社会上的不连续性，因此仍存在一些闭塞的、与外界隔绝的社区。第三，新技术在美国70年代的结构危机之后重构了资本主义。卡斯特罗认为，新技术促使了劳动力在国际间和区域间的新分工，以便能迅速地转换生产和充分利用劳动力。新技术还可改变生产过程中的资金——劳动力之间的关系。

卡斯特罗预测，高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真正结果是排斥就业大于创造就业，这迫使许多人从事小规模的工资低廉的服务性行业或从事地下经济活动。当重要信息和资金流动的控制权落入几家大企业时，他们便会在“世界级城市”设立总部，以发展先进产业。这样，地方自治权将受到削弱，因而将不断加剧经济和社会二元性。在大都市地区内部，在区域间以及社会结构内部，都将出现极化现象。

这种社会空间系统方法应用大量社会学词汇，使人能够理解高技术对于社会、组织和职业上的含义。激进学派认为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它强调了分工，因为他们认为阶级是社会的基础，用阶级观点可用来分析高技术。技术发展及其可能产生的变化都被看作是整个系统的内在特征。

(上接第24页)

技)贸结合，赋予一批生产企业以外贸经营权，使其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四是创新对外经济活动组织体制，在各市县纷纷建立了各县功能的外资管理机构。总之，改革促进开放是一个广泛的作用空间，既有开放本身提出的改革要求，也有开

这种方法的缺点表现在它不是建立在符合实际过程和形态的科学分析基础上，倒是建立在对发展趋势的激进理解基础上。再者，把“信息”作为“技术发明之目标”只是所有高技术“含义”中的一个解释，而不是全部。最后，卡斯特罗所提的观点确实很一般，他并没有区分什么是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或者什么是不变的条件。这种理论花了很多篇幅研究动机、机会、阶级地位以及阴谋，尽管很有趣，却很难在实际中验证。尽管如此，这种理论再现了对二元性的理论兴趣，其时人们也开始对日益明显的社会空间二元性进行研究。这二元性中就牵涉到高技术。比如美国的“两岸经济”、英国的“南北差异”，这些现象确实需要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 C Thompson, "High-technology theories and public polic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1987 Volume 7, pages 121—152
2. Amin A., Goddard (Eds), Technological Chang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llen and Unwin, Hemel Hempstead, Herts)
3. 宋伟：《论高技术的本质与特征》，《学术界》1990.4. 第89—94页。
4. 阎机龙：《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布局》，《人文地理》1990.5(4). 第49—53页。

作者单位：上海教育学院地理系

责任编辑：郑英隆

放不断发展提出的深化改革任务。只有改革才能为开放的进行提供保证，也只有改革的不断深化才能促进开放的不断发展，没有改革的成功，对外开放最终也不可能成功。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责任编辑：谭湛明

辛亥革命应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孔凡岭

划分古代史和近代史的标准，一般有三种：一是按照社会形态的不同；二是看哪一个阶级成为时代的中心；三是以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史的开始。无论从哪种方法上讲，作为区分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标志，辛亥革命比鸦片战争更为适合。

从社会形态上讲。不错，1840年的鸦片战争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之后，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一方面促使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把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又控制中国，使其在政治上经济上从属于它们，把独立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国家。但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是逐渐完成的，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结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强化以及新的经济成分和新的阶级产生，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鸦片战争只是这种演变的刚刚开始而已。

就中国独立自主地位的丧失和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虽然取得了在中国的一些特权，但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主权国家，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虽有妥协，可仍处于对立状态，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是既矛盾又勾结，但矛盾仍是主要的。李鸿章当时就一再表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①把“借师助剿”当作“权宜之计”。奕訢等制订的基本国策就是“外敦信誉，而隐于羁縻”，“自图振兴”。^②所以，在光绪朝就发生了三次对外战争，直到义和团战争的失败，《辛丑条约》的订立，情况才发生根本的转变。一方面，义和团的英勇斗争，使帝国主义认识到“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而通过扶植清政府，从中取得“合法”权益，采取“以华治华”则为“上策”。所以，他们通过《辛丑条约》的签订，从政治、军事、经济上大大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也彻底投降了帝国主义，公然提出其对外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公开保证永远禁止中国官民成立任何反帝组织和坚决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这样，中外反动势力完全勾结在一起，中国半殖民地社会才正式形

成。近年有的同志也认为“义和团战争失败后《辛丑条约》的订立，是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确立的标志。”③

就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来说，在鸦片战争后最初的十年里进行得比较缓慢，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经济的侵略，才开始明显表现出来。在甲午前，就全国范围来看，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基本经济结构，还处于开始解体阶段，特别是长江、黄河上游地区和华北一些地区的自然经济，仍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是发生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之后，这时帝国主义开始了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经济侵略，从1895年至1913年，帝国主义在华建立厂矿130多家，到1914年，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总额达22.5亿美元，比甲午前增加十倍。故甲午后二三十年间，中国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无论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急剧进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④

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资产阶级在救亡旗帜下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政治运动也迅速高涨。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企图夺取政权的首次尝试，它虽然失败了，但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文化思想迅速传播开来，于是出现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民主革命运动，推翻了清朝统治创立了中华民国。然而，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民国成了一块招牌，形式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实际上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仍然保持着，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进入了半封建社会。因此，正如有的同志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社会的标志。”⑤

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段话也说明，中国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显然不是在鸦片战争时期，因为那时中国还根本没有出现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半封建社会了。

由上所述，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以《辛丑条约》的订立为标志，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以中华民国的创立为标志，这是分开而讲的。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完整的概念，它的正式形成的标志，当然以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比较合适。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形式上宣告了封建社会在中国的结束，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二

从阶级变化上划分，辛亥革命亦应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列宁告诉我们，划分历史的标准，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哪一个阶级成为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据此，所谓“近代史”，就是指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按照这种观点，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显然是欠妥的。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时中国根本还没有资产阶级，更谈不上成为时代的中心，只到鸦片战争20、30年之后的60、70年代，中国才出现洋务派官僚所办的机器工业。这批清王朝里的洋务派军阀官僚，被称为早期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招揽大买办势力，是通过倡办和把持官办、官督商办一类企业转化的。但到清朝覆灭时止，这个资产阶级集团还没有完成其转化过程，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它仍然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只是渐次显露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某些属性而已。

19世纪70年代和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同时兴起的商办企业，一般具有民族资本主义的性质，创办和占有这类企业的人们，逐渐地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在兴起阶段，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还没有自身独立的地位，那些从地主阶级改革派转化而来、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良主义思想家，自然就成了这一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游说献策，撰文著书，宣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地位的革新主张，掀起维新变法思潮。1895年的“公车上书”是70年代以来改良主义思潮的一次政治运动，这种借助举人老爷上书的形式来表达发展资本主义的趋向，显然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1899年的戊戌变法运动是“公车上书”的继续，它的软弱和运动规模的狭小，也是同资产阶级的处境相符合的。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内产生了显著影响，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是资产阶级对历史发展的一个巨大功绩，从而也进一步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地位亦有很大变化，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掌握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权，不少商界人士也都加参了各地军政机构，担任了要职。袁世凯窃权后，为笼络资产阶级，取得他们的支持，也吸收其中若干上层代表人物。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组织和领导的国民党登上政治舞台，“民国”取代帝制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尔后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但仍保留着“民主共和制度”的躯壳，即使是假共和，也要优于帝制。共和的形式反映了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起着颇大作用这一内容。专制独裁者在表面上也不得不尊重民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往往被邀参政议政，作为民主的点缀。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有限的范围内，发表或推行过某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起过或多或少的积极作用。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逐步赢得民心，得到发展。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已经代替了以地主阶级为中心的时代，资产阶级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从这个角度上讲，辛亥革命理应成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

三

从世界史的角度上，一般是以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史的开端。1640年的英国资产

阶级革命之所以成为世界近代史开始的标志，原因在于它在欧洲一个大国中推翻了封建政体，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推动了欧洲国家资产阶级运动的发展。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等也都各自成为本国历史断代的标志。

按照这种观点，辛亥革命更应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这是因为在此之前的斗争，包括像太平天国那样波澜壮阔的全国范围的农民战争、义和团那样风起云涌气势磅礴的反帝运动，尽管它们是正义的悲壮的，但却不能革故鼎新、改变封建社会形态、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能算是革命，最多只能说是民主革命的准备或序幕。只有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才明确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并用武装斗争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南京临时政府，算得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⑥

这场革命尽管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度建立了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此之后，凡是想穿龙袍当皇帝的人，无不成为短命小丑。与此同时，辛亥革命也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否定了几千年来君主专制政体，必然相应引起与这种封建专制制度相联系的阶级关系、政策法令以及传统习惯的若干变化，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被公认为天经地义，从而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据杨铭《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一书记载，1903—1908年全国注册的公司数127家，平均每年设公司21家；1913—1915年新注册公司124家，平均每年41家。可见辛亥革命后平均每年新注册公司数较前期增加近一倍。又据农商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历年设厂数，1910年为986家，1911年为787家，1912年为1504家，1913年为1878家，1914年为1123家。⑦这说明辛亥革命后我国曾出现一个设厂高潮，说明辛亥革命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

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犹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世界近代史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其他一些国家多以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断代的标志，那么，中国近代史为什么不应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作为开端呢？中国历史尽管有其自己的某些特殊性，但共性的方面也是不能忽视的。

四

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至少有以下意义：

首先，从经济学上看，以鸦片战争分界，把封建社会的下限定在1840年，这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鸦片战争之前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性则不易看得出来，衰败征象虽有，但尚欠明显，鸦片战争后才集中暴露出来，并一步步走向衰亡。把封建社会的下限定在辛亥革命，那么就不仅符合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仍是封建性质的客观历史，而且能进一步显示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漫长的特点，尤其是反映出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没落，更清

楚地展现出整个封建社会的全貌，揭示出其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次，从政权学上讲，鸦片战争作为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自然把清朝历史肢解为前后两段；而以辛亥革命为界，就能完整地保持清朝历史的整体性，呈现出整个清王朝由盛而衰直至灭亡的全过程，和“清史”的下限一致。

再次，从政体学上说，鸦片战争前后政权组织形式皆无变化，而辛亥革命则不同，它推翻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尔后虽有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出现，但只不过是一时的沉渣泛起而已，“民国”取代帝制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任何人是阻挡不了的。辛亥革命不愧为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政体的分水岭，以辛亥革命划限，和政体学在这一阶段的分期也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利于正确估价辛亥革命的地位和功绩。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过去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对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过份强调其失败的一面而忽视其成功的一面，辛亥革命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以辛亥革命断限，可更清楚地显示出其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突出其地位和作用，明确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认识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这对于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也许是有益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鸦片战争都不如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更有道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理应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近代史应包括从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38年的历史。

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四），《复徐寿蘅侍郎》。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71卷《请设总理衙门等事酌拟章程六条折》。

③《历史研究》1988年1期5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508页。

⑤《近代史研究》1988年1期310页。

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7页。

⑦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编《农商部统计报告》363页，中华书局1918年。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试析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产的原因

余子明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较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一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这个共和国只是昙花一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很快成为历史的陈迹。其原因是什么呢？本文就此作些探讨。

一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不断冲击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它走着一条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道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蓬勃兴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则缺乏这样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它就不能在中国内部自行产生出来，它只能由一些先进人物从西方寻找而来。在西方，大革命发生前，封建王朝的专制制度已分崩离析，并且在这个专制制度内部滋生着异己的力量，孕育着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萌芽。在中国，当民主革命发生前，封建专制制度完整无缺，专制主义的皇权日益集中。在西方，是民主共和制度在内部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是民主共和制度在外部取代了君主专制制度。在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土生土长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舶来品。

在中国最早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是邹容。他在《革命军》中十分精细地描绘了“完全无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这个蓝图虽然多少体现了中国的特色，但基本上是以美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为底本的，许多条文直接参照美国，“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之法律”，“凡关全体个人之事，悉准美国办理。”^①

设计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最详尽的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关于孙中山先生的共和国方案的来源，他本人有一段著名的说明：“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②然而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孙中山的所谓“因袭了吾国固有之思想”，目的无非是打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力求适应中国人民的心理习惯，从而减少民主革命的阻力，并不是要恢复这些思想。所谓“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那是货真价实、毫不含糊的。孙中山说他的三民主义就是美国总

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事实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基本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说：“我们的民族主义，可以说和他们的自由一样，因为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③关于民权主义，其“主权在民”的思想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一脉相承的，议会制、总统制、权力均衡制约都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直接引用。关于民生主义，其基本原则是直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乔治·亨利的“单一税说”。所谓“独见而创获”，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孙中山的“独见而创获”无非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社会学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要么“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要么“规仿欧洲之学说事迹”，仍然是学习西方政治，模仿西方政治。所以，总的看来，孙中山的共和国方案中，“规仿欧洲之学说事迹”占主要地位。

宋教仁的方案是，最初同意在中国实行总统制，后来又坚决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尤其是政党责任内阁制。但是，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都不是宋教仁的发明创造，而是仿照西方的国家制度而提出的。总统制从美国仿照而来，责任内阁制则是效法法国的结果。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通过比较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落后与西方社会的先进，通过鉴别看到了封建君主专制的腐朽与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优越，因此要引进西方的社会学说，仿效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们在学习西方时，不象先前洋务派羞羞搭搭，不象改良派那样半遮半掩，也不象后来的胡适、陈序经认为的“中国百事不如人”，主张实行“全盘西化”，而是主张结合中国社会情形来学习西方。但是，孙中山等人毕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具有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性和思想的局限性，因此，他们不可能真正辩证地、历史地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不可能将西方社会学说的普遍原理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同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既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又适合中国国情，既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又符合普通人民愿望的民主共和制度。他们要么是明明白白的偏激、片面，要么貌似公允，实则偏激，貌似全面，实则片面。其结果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评批的那样，“美国的联邦宪法，好象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④

我们这样分析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丝毫没有贬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方案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们充分肯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功绩以及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历史意义，只是想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只能匆忙、草率地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库中搬来现成的东西，而这种现成的未经改造的东西不可能在中国实现。

二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出来的，但它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中并不占首要地位，占首要地位的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首先，促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孙中山、章

太炎、陈天华等人最初从事政治活动，所持的均是改良主义，并在行动上作过不懈的努力，希望清政府进行内政改革，但是，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和清政府的卖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得孙中山等人彻底改变了改良主义的立场，走上用武装斗争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道路。可以这样说，革命党人要推翻清廷，首先是因为清廷的卖国行为，而不是它的专制统治，首先是因为民族危机的深重，而不是封建制度的腐朽。

正因为革命党人是由于民族危机的深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所以民族主义在他们的政治思想中占首要的和主导的地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位居第一，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中，有关民族主义的占了一半。所以，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中，民族革命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基础和前提，民族革命始终被当作辛亥革命的首要目标。兴中会是要“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华。”^⑤军政府宣言中更明确地宣称革命的目标就是“涤二百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⑥既然他们将消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作为革命的首要目标，那么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就退居次要地位了。孙中山为什么在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的义和团运动时期，试图策动李鸿章搞两广独立？亦即为什么在决定武力推翻清政府之后又去拥戴清朝的封疆大吏？过去学术界以为是因为孙中山革命思想不彻底，改良主义抬头，这种解释不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也不符合一个革命先行者的政治性格。真正的原因是，孙中山虽然在甲午战争以后，决心武装推翻清政府，但还没有形成真正完整的民主共和思想，那时他将推翻清朝统治作为自己政治斗争的最高宗旨，至于推翻清朝以后，究竟由谁来掌握政权，究竟在中国建立怎样的国家制度，他没有深思熟虑。当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北方、中国的南方督抚们策划“东南互保”时，孙中山便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孙中山如此，其他革命党人更是如此了。

当然，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革命党人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确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但是，这种理想、目标与他们的民族主义理想、目标相比起来，仍然是处在次要的地位。推翻满洲贵族统治、复兴中华民族始终是不可动摇的最高目标。

由于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处在次要的地位，许多重要的革命文献没有或较少谈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问题，这些文献极力宣传鼓吹的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等均是如此。即使在描绘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那部分篇幅中，有关民族革命和民族平等的也占相当部分，如“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权利”，“所有服从满洲人之义务，一律消灭”等等。^⑦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另一些宣传连民族革命也谈不上，基本上是单纯的排满兴汉。章太炎的论著充满着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复仇的思想，没有一点民主革命的时代气息，与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的反清反满言论没有什么两样。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反满的宣传有所变化。孙中山一再强调革命不是要尽灭满洲

民族，而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章太炎也说排满是要排其皇室，排其官吏，而不是排普遍的满洲劳动人民。但必须看到，这种转变已经为时太晚了。由于长期以来革命党人致力于单纯的反满鼓吹，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得不到很好的宣传，从辛亥革命的酝酿到爆发，直至失败，在中国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宣传民主共和观念的热潮。表面上，清末革命书刊汗牛充栋，革命派的宣传活动轰轰烈烈，革命党与保皇党辩论针锋相对，但绝大部分都是鼓吹救亡和反满的问题，扎实地宣传民主共和观念的文章寥若晨星。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⑧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致力于民族主义的宣传，放弃民主共和的宣传，是不以他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从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一直存在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斗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的独立，因而救亡图存就一直成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戊戌变法是要“保国保种”，义和团是要“还我江山还我权”，辛亥革命是要革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的命，是要革帝国主义的命。这样，革命党人必然要突出民族主义的宣传，放松民主共和的宣传。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主共和的观念不能普及社会，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缺少思想基础和舆论基础。缺少思想基础和舆论基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不能真正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不能巩固下去。

三

由于革命党人从西方引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没有经过精心的改造，所以它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缺少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不仅是今天的社会主义者的结论，也是当时某些资产阶级人物的认识。

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逐渐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弊病。章太炎在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之后，满腔热情地拥护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但当他于1906年再度旅居日本，实地观察了日本的社会状况，亲身体验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拥护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热情逐渐冷却了下来。他开始无情地揭露西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的各种弊病，认为它和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一样，也是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制度。

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在西方国家就有很多弊病，直接移植到中国以后，问题更多。它和中国的国情不符，在中国没有社会基础。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外争独立，内求解放，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在打倒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时候，不愿意也不应该遭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恰恰不能改造他们受剥削压迫的地位。孙中山等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平均地权，作为补救措施，其结果只能是一种幻想。从中国的人口、地理、历史文化等因素看，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也是不适合的。第一，中国人口太多，如果选出议员人数多，必然意见纷纭，“猿

屯麋聚，分曹辩论，瞽歎之声，已足以乱人语”，如果选出的议员人数少，如“六十万擇其一”，“则众所周知者愈在土豪”，而真正有才能品行的“贤良”又不为选民所了解，因而“终不能与土豪抗也”；^⑨第二，中国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人民文化水平低，如果以文化程度作为选举资格，则大多数人民就被剥夺了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计汉土识字者十人而三，则七人无选举之柄”；^⑩第三，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而代议制选举议员又以纳税多少作为标准，选出的议员则江南富庶的地方多，西北一带贫穷的地区少，“如是选权凑集于江、浙，而西北诸省或空国或无选权也。此何等政体耶？”^⑪

章太炎作为一个受传统教育较深的思想家，在中国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上最后滑入了封建主义泥坑，他否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对于封建主义政治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主张恢复封建制度，“要之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⑫这种封建主义专制制度优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思想在辛亥前后，在人们头脑中是很严重的。按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方案应该得到中国资产阶级的普遍赞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张应该得到中国资产阶级的积极响应。然而，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不发展，资产阶级的队伍不壮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成熟，所以对革命党人提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淡然置之。过去人们认为，资产阶级上层反对民主共和，主张君主立宪，资产阶级下层反对民主共和，拥护革命运动。实际上，在政治态度上，资产阶级下层与上层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革命党人与清朝统治者浴血奋战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们基本上都是作壁上观。当南京临时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时，他们不仅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纷纷收藏银币，故意造成经济恐慌。^⑬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也得不到普通人民的拥护。首先是因为这个方案并不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愿望，虽然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比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这种历史的进步并不意味着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善。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历史悠久，儒家的文化源远流长，普通人民的皇权主义十分严重，旧的风俗习惯、旧的心理意识根深蒂固，人民无权过问政治，也不关心政治。

辛亥革命时期，改良派在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民主共和等问题上与革命派论战。改良派反对革命、反对民主共和是反动的，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状况、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状况和觉悟程度的分析又有许多合理的因素。而当时革命党人却没有在普通人民中进行宣传教育，所以普通人民没有接受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和革命民主主义的观念，梁启超总结说：“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行议院政治之能力者也，……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⑭我们认为，这个结论基本上是符合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的。细心考察辛亥革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普通人民并不积极支持民主革命运动，并不坚决拥护民主共和国。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历次武装起义都是孤军奋战，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援，甚至在革命党人发动反清武装起义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⑮后来，普通人民对革命党人的活动有所同情，但这种同情是出于对清朝日益丧权辱国的痛恨，而不是出于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厌恶和对资产阶级民

主共和国的向往。在辛亥革命时期，普通人民不断举行抗捐、抗暴斗争和抢米风潮，客观上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但是举行这些斗争的人民并不是立志造反，并不是要推翻封建政府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因而也就谈不上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支持和配合。所以，革命党人虽然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一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人民未能接受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观念，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荡然无存，军阀政客纷争不息，士农工商一盘散沙，其根源就在这里。

①⑦《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下册，第684—685、684页。

②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1集，第615页。

③⑤⑩《孙中山选集》第626、14、77、199页。

④《论美国的民主》中译本，第18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⑨⑩⑪⑫《章太炎选集》第465—466、466、467、470页。

⑬《字林周报》1912年1月13日。

⑭《梁启超选集》第478页。

作者单位：西安政治学院

责任编辑：林有能

（上接第9页）

应付这笔巨大存款，光靠出售高价消费品和出售住宅是很不够的，出售一批国有资产（企业）则是良策。它的好处是：能使闲置的固定资产发挥效益；能使企业的在职失业现象有所缓解；能使国家节省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因冗员和企业亏损而支出的财政补贴，以减轻国家的负担；能使几千万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减轻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的压力；能使国家从拍卖国有资产中获得收入，从而较从容自如地进行再投资，开发新的建设项目，以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能使被拍卖掉的企业，经集体所有制经营而获得活力和生机；能使企业职工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造就一大批社会主义企业家；能使政府的工业管理部门得以转变职能，增强服务于企业的功能，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总之，国家将一批中小国有企业转化为集体所有制经济，这是对当前经济扭曲现象和经济膨胀现象的矫正和遏制，使公有制的潜在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①《春雨行——对全球经济发展战略的探讨》，童大林、刘吉著。

②《中国四十年经济建设与十年经济改革的艰辛历程》，《经济研究》1989年第9期刘国光文。

③《红旗杂志·内部文稿》1988年第9期严闻广文。

作者单位：《中国集体工业》杂志社

责任编辑：郑英隆

容闳与孙中山

陈申如

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留美立志推进“西学东渐”者；孙中山是继容闳之后留美而又立志实现“西制东移”者。这两位爱国者开始所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到最后却汇合到一条道路上来。

这两个伟人最初相遇是事有巧合的。1894年，容闳由于当时在中国搞改良而救国无门，懊丧地从上海去日本；而此时孙中山自日本来沪活动，因清廷大捕党人，无法在沪停留，只得原船折回日本。这就促成两人在患难途中巧遇，这对容闳和孙中山两人以后的事业均有极大的影响。^①此时，容闳已是饱经风霜66岁花甲之年，而孙中山是28岁血气方刚的青年，这一老一少一见如故，其原因除他们同籍广东省香山县外，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在探索拯救中国走向富强之真理。从此，他俩成了莫逆之交。

容闳与孙中山在日本船上共同畅谈了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他们先抵横滨，合住旅社，闭门密谈甚久，又共游东京，重返横滨后两人才分手。容闳乘船回长崎，孙中山则去广州，为实现改革中国之愿望，上书李鸿章。事虽不成，但从此走上革命之路。从以上史实，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青年的孙中山所以最初对清廷存在一丝的幻想，上书李鸿章走改良之路，是和孙中山同容闳这次同舟去日本是有密切关系的。如真这样，那么孙中山最初还是受到前辈容闳一定的思想影响的。^②

孙中山和清廷决裂后，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成立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公开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向清廷提出挑战。1905年，孙中山又联合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的光复会、刘静庵的日知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再次卷起革命狂潮。

而在同时，容闳还是孜孜不倦地走他通过清廷上层进行改良的道路。1895年他重返上海，向两江总督张之洞建议实施中国富强的“新政策”，可是未获接受。他不死心，又风尘仆仆地北上北京，与康有为、梁启超一起，在幕后帮助康、梁策画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他于1900年又参加唐才常在上海组织的自立军，并在自立军的“中国国会”中担任会长，拥护光绪，起兵勤王，陷入保皇党的泥潭。到1909年，他对自己所走的改良之道才有了深刻的认识，特别对康有为私自挪用华侨捐款深为不满，认为康有为“并非一

安全可靠信赖之维新人物”。相反，他对孙中山更为器重，认为“是一个很重实际人物，为广东之栋梁”，①而加以大力支援，走上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程。为了支援孙中山的革命，1909年，容闳在美国旧金山制定了一个庞大的《红龙计划》，就是向华侨筹款500万美元，10万支枪与一亿发子弹，以加速革命的进程。其时，孙中山旅居新加坡和容闳通信甚密。同年12月孙中山应容闳之约，曾到纽约一聚。1910年2月容闳致书孙中山正式提出《红龙计划》的具体步骤：（1）向银行借贷150万到200万元作活动基金；（2）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任用有能力之人，以管理占领之城市；（3）任用一个有能力之人以统率军队；（4）组训海军。⑤孙中山为此重访美国旧金山并转洛杉矶和当时支持中国革命的美国友人李荷玛和波司会谈多次。同时，容闳亦去信李荷玛和波司，明确表示他全力支持孙中山的立场，并督促李荷玛迅速筹款，以便《红龙计划》能早日实现。孙中山为了取得美国友人的信任，又从檀香山返回日本，与同盟会重要干部协商，取得17省代表签字拥护孙中山为革命领袖之文书后，即离日赴新加坡。其后，孙中山、容闳和李荷玛、波司间往返通信讨论借款之事，遗憾的是最终没有达成协议。可是从这庞大的《红龙计划》从起草到筹划中，可以看出容闳竭尽全力促成美国友人支援中国革命，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清廷土崩瓦解，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即致电在美之容闳，要他共建平等自由之中华。这时，容闳已届82岁高龄，不堪长途跋涉了。但是他终于在尝到了“西学已将渐中华”的甜蜜之后才离开人间。

①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卷一，《革命党关系》。

②《容闳致见民国肇建》“黄海巧遇，重大影响”。

③⑤同上，“红龙计划，协助革命”。

④同上，“唁镇退隐，尤闻情怀”。

作者单位：上海闸北业余大学

责任编辑：林有能

论太平天国革命与中国近代化

牟安世

在中国近代史上，太平天国革命同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和重要的。这是因为：第一它提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中国近代化纲领；第二它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化模式。就中国近代史之为中国近代化的过程而论，这是两个比较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就太平天国革命史本身来说，这也是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对它进行重新认识的主要依据。

一、一个比较全面的中国近代化纲领

洪仁玕于1859年在得到天王洪秀全批准后在南京刊行的《资政新篇》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关于中国近代化的纲领。

如所周知，林则徐、魏源等人在鸦片战争时期首先提出了关于中国近代化的两个著名问题：即“洞悉夷情”和“师夷长技”的问题。为了总结这两个问题，魏源于1843年编成了《海国图志》一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第一部著作。17年后出版的洪仁玕《资政新篇》一书则是继《海国图志》之后的第二部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的论著。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之际，这两部书同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讨论的也是同一个“洞悉夷情”和“师夷长技”的问题，但是，在“师夷长技”这个问题上，后者比前者有所突破，因而使《资政新篇》中提出的近代化纲领比较全面，大大地超过了前者。

到底《资政新篇》比《海国图志》在“师夷长技”这个问题上有哪些突破呢？第一在“长技”的理解和内容上，第二在“师”的方式方法和范围上。

《海国图志》对当时西方的“长技”的理解和内容都比较简单，一言以蔽之曰“船坚炮利”。书中明确指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①《资政新篇》则认为他们的“长技”是“技艺精巧，国法宏深”，^②包括了西方的技艺和国法两个方面。所谓“技艺”，指的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如火船、火车、钟镖、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均是。其中除火船、连环枪等属于“船坚炮利”的东西以外，还有火车、钟镖、千里镜等有关日用民生的事物，实际上包括了他当时所知道的科学技术。

至于“国法”，洪仁玕主要指的是西方的法治，即“所谓以法法之者，其事大关世道人

心，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宜立法以为准焉。”他进一步认为：“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经。”^③因此，他要求“立法善而施法广，积时久而持法严，代有贤智以相维持，民自固结而不可解，天下永垂而不朽矣。”

这样看来，在对西方“长技”的理解和内容上，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洪仁玕都超过了魏源；因此，在“师”的方式方法和范围上，他们之间也必然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由于魏源把西方“长技”局限在“船坚炮利”方面，所以他的学习方法就是在“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延聘英、美两国技师来粤“司造船械”和“司教行船演炮之法”，“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④而洪仁玕的办法是由中国人民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即允许西方“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而不是“选闽粤巧匠精兵”去学习铸造船炮和行船演炮，同时奖励发明创造，许民专利。他说：“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车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若彼愿公于世，亦稟准遵行，免生别弊。”在船舶方面，“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手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若愿公于世，亦稟明发行。”

洪仁玕除了主张学习西方“技艺”即科学技术外，还要学习许多他认为值得学习的东西，如建立银行，发行纸币，成立保险公司，实行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设立邮局并发行报纸等等他所认为属于“国法宏深”方面的新东西，都是陆续地引进到中国来，利用太平天国革命的机会，“乘此有为之时，奋为中地倡”。

以上所述，是洪仁玕《资政新篇》在“师夷长技”问题上大大地突破了魏源《海国图志》的地方。但是，在《资政新篇》中所提出的中国近代化纲领之所以比较全面，还不仅仅就是这一点，同时还在于其中提出了一个关于近代化的指导思想问题。这个指导思想就是洪仁玕所谓的“教”；他认为单有“立法”是不够的，还必须“教法兼行”，才能“不陷于僻而登于道”。洪仁玕认为，中国原有的儒、释、道三教是不能指导中国近代化的，“释尚虚无，尤为诞妄之甚；儒教贵执中，罔知人力之难”。而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所信奉的早期基督教，“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⑤的思想显然也是不能指导中国近代化的。因此，经洪秀全同意，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就采用了加尔文教的精神去代替早期基督教，尽管他没有公开声明采用加尔文教。

加尔文是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中与马丁·路德齐名的宗教改革家。恩格斯曾经指出：“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⑥“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⑦西方有些学者如德国的马克思·韦伯也认为加尔文教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化是起了巨大作用的。因此，洪仁玕采用加尔文教的精神来作为指导思想，这在当时是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的。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一书中，就“师夷长技”的问题之所以能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中国近代化的纲领，是由于他在“洞悉夷情”方面超过了林则徐和魏源。他曾参与太平天国早期革命密谋，因参加金田起义遇阻而去香港，同外国人有过长期的直接接触。1854年

冬，他在香港加入伦敦布道会，任宣教师，“其主教为理雅各，即著名之善译中国古文者”。⑧ 1858年6月，他离港北上，于1859年4月到达天京。他从1855年到1858年的4年期间，始终抱着一个使中国富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近代化社会的目的，“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凡涉时势二字，极深思索，故于古所无者兴之，恶者禁之，是者损益之”，结果写成了《资政新篇》一书，这是来之不易的。他之所以能提出用加尔文教去取代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所信奉的早期基督教，则是因为他所在的伦敦布道会正是属于加尔文教的公理宗一派，深知加尔文教在西方近代史上所起到的近代化的作用。总之，从洪仁玕抱定的一个要促使中国近代化的目标看来，他认为“凡一切制度考文，无不革故鼎新”，因为他“有自新之学，用以新民新世。”⑨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化模式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是在鸦片战争时期中提出来的，它们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洞悉夷情”和“师夷长技”的问题。这时的中国还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就失去了独立和自主，而一个没有独立自主的国家是不可能近代化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工业化是近代化的基础。“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⑩ 更不可能有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

我们这时来谈中国近代化，虽说它的主要问题没有变，仍然是“洞悉夷情”和“师夷长技”的问题；但是，单谈这两个问题就够了，还必须加上一个条件，那就是中国的独立自由和人民民主。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推翻清廷的腐败封建统治和抵抗外国侵略为目的，这就提供了中国近代化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有《资政新篇》关于中国近代化的比较全面的纲领的出现。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自鸦片战争失败和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中国的近代化便注定了要走上一条通过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和学习西方先进事物的不懈努力相结合的道路；太平天国革命正是在这条道路上首先谋求中国近代化的一次革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条道路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化模式，即怎样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进行近代化的模式。这样一个模式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要真正近代化必需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革命化与近代化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没有能力抵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封建政府是不可能在中国完全实现近代化的。日本和俄国的近代化经验表明，“抵抗西方殖民主义的能力”和“基本上依靠自己努力来对付近代世界的挑战”⑪ 乃是近代化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根本没有能力抵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近代化所需的大量资金，被侵略者通过走私鸦片掠夺而去。清政府连练兵筹饷都捉襟见肘，何以谈搞近代化。

太平天国革命则不然。革命政府对外执行开放政策，但不承认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

的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坚持严禁鸦片。他们曾经多次接待过来访的外国使节，并告诉英人“不再卖鸦片。”^⑫他们“对西方国家表示友好，并表示极愿建立最自由的贸易关系”；^⑬在1854年6月他们答复英舰“拉特勒号”舰长麦勒西的第一条答文中就指出：“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俟后方定，害人之物（鸦片——引者）为禁。”^⑭由此可见，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只就它反对不平等条约和严禁鸦片一点来看，就可以为中国开始搞资本主义生产、走近代化的道路，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方面创造一个必要的条件。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与鸦片泛滥于中国的结果，只能使中国逐步殖民化，而决不是近代化。

我们不应当把殖民化和近代化等同起来。有一种意见认为：“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殖民征服，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因此，如果鸦片战争来得早一点，“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面貌了”。^⑮这种意见是从某些表面现象而不是从本质上去看问题，它缺乏历史的根据。照这种意见看来，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应当是现代化进程上比起别的非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更先进的了。但事实上，印度只不过成了英国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材料的市场，“从而毁灭了印度本地的手工业者”，并使大批印度农民“卷进了替英国工厂生产黄麻和其他商品”的行列，“受到世界经济市场波动和危机的影响”，其“结果就是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停止”。

这样看来，太平天国革命虽说最后“被帝国主义绞杀”而未能成功，但它所起到的阻止中国殖民化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并且，由于洪仁玕《资政新篇》的提出，它还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化模式，这是非常可贵的。因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⑯所以中国近代化的先决条件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它和学习西方先进事物的不懈努力，即“洞悉舆情”和“师夷长技”相结合，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就在中国近代史上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化模式了。

三、中国近代化历史中之太平天国革命

就中国近代史之为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论，它在实际上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初期阶段；其后是洋务运动阶段；自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以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便进入了清末民初的变革阶段。这是中国近代化历史的基本进程，太平天国革命则处于它的初期阶段中的后期。根据我们上述它同中国近代化的关系的两个问题来看，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国近代化进程 中实处于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个重要地位可以从它的近代化纲领的三个特点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太平天国近代化纲领的特点之一是，它第一次提出了以科学技术即“技艺”为中心来促使中国近代化的观点；这就使它既同鸦片战争时期、也同洋务运动时期有所区别，因

为它们都是以“船坚炮利”为中心的。洪仁玕让西方“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的倡议，既不同于在他以前的魏源提出的学习西方“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的论点，也不同于在他之后的曾国藩所谓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方案。魏源与曾国藩都是以军事为中心的，虽然他们的目的根本不同。但是，不管怎样，搞近代化从军事入手，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成功的先例。“一个社会想把军队西方化而让其他方面保持原样，这是空想；这在彼得式的俄国，十九世纪的土耳其和美赫麦德·阿里的埃及都得到了证实。”^⑦在中国，洋务运动的破产也证实了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以“技艺”为中心的比较全面的纲领应该说在当时是唯一的能够促使中国近代化的纲领。

太平天国近代化纲领的特点之二是，它由政府提倡和鼓励新式工业，但由民间商人和能工巧匠去具体创办。它在兴车船、兴舟楫、兴采矿、兴邮政、兴银行、兴器皿技艺、兴市镇公司等各方面，都用政治权力去保护私人企业的经济权益和技术专利，用税收等办法加以调节，但政府不必自己去插手，籍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点对于近代化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影响着决策，影响着决定什么政策并做出何种选择的协调和控制。它不仅意味着权力的行使，也意味着意志的动员。”^⑧这也是使它同鸦片战争时期和洋务运动时期有所区别的一点。魏源《海国图志》是他个人刊行的，不仅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反而面临指摘，说“洞悉夷情”是“多事”，“师夷长技”为“糜费”。洪仁玕《资政新篇》则是太平天国革命政府刊行的，除个别条款因战争情况缓行外，大部分都经洪秀全批定为“是”，表示他有实行的愿望和决心。太平天国统治苏、浙的三四年中，奖励私人发展工商业，取得了战时革命统治地区的经济繁荣。苏州“百货云屯，流民两集，盛于未乱时倍蓰。”^⑨这种景象的出现，我们不能说同洪仁玕《资政新篇》中提出的纲领毫无关系。因此，那种认为“《资政新篇》所提的建议都没有得到实施，一篇大文成为一片空谈”^⑩的看法是未必符合历史事实的。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搞官办军事工业，搞官督商办一切企业，到处限制和阻止中国商人利用机器，开办企业，实行经济垄断。李鸿章在1882年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拥有十年专利，在这期间只许华商附股，不准另行设局。张之洞在1894年创办的湖北纺纱局本为官商合办，结果却被全部收归官办。此外，他们还明令禁止纺纱机器入口，对商办企业的产品征收重税，种种限制都是阻止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洋务运动中这套作法显然是同《资政新篇》中所提倡的东西背道而驰的。

太平天国近代化纲领的特点之三是，它采用了加尔文教的精神去取代了革命初期所信奉的早期基督教。这一点使它同洋务运动时期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策方针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在封建主义思想指导下搞近代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只能搞官办和官督商办，它不可能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再说，中学的核心是儒学。据近人研究中的一种看法认为，直到现在，儒学虽经新儒学家的重建以适应近代化社会；但是，事实表明，它至今还是难以“回应现代化的挑战，实现价值的现代转换。在此过程中，儒学却一直开掘不出现代的民主、科学精神，因而

也就难以应对变迁了的外部世界。”^②“洋务运动”的结果说明了以封建主义的“中学为体”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从太平天国近代化纲领的上述三个特点来看，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太平天国革命实处于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如果革命成功，如果《资政新篇》的纲领能够得到贯彻执行；那么，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发展，就很可能不必等到清末民初的变革阶段中去了，也不必像在变革阶段中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那样去挣扎着求得发展了。我们知道，在世界史上，俄国的近代化开始于1861年之“解放农奴”，日本的近代化开始于1868年之“明治维新”，而《资政新篇》近代化纲领的提出则在1859年，比俄日两国都要早几年；如果革命成功，中国的近代化至少是可以同日本和俄国的近代化同步发展，并驾齐驱，而不致成为近代化的“落伍者”了。

①④《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

②洪仁玕：《资政新篇》，见《太平天国》Ⅱ第528页。以下凡引该书文字，一律不再注明出处。

③金毓黻、田余庆编：《太平天国史料》第147页。

⑤《太平天国》Ⅱ第322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1页、第4卷第252页。

⑧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6页。

⑨《太平天国》Ⅱ第587、589页。

⑩⑪《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页、第2卷第679页，1991年版。

⑫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近代化》1975年英文版，第18页。

⑬《太平天国》Ⅱ第907页。

⑭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第109页。

⑮转引自龚书铎：《鸦片战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化》，见《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增刊。

⑯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第275页。

⑰罗兹曼等：《中国的现代化》第12、327页。

⑱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上当事书》。

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第69页。

⑳许纪霖：《终极关怀与现代化》，见《读书》1991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责任编辑：林有能

论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发展的学说

刘志光

马克思从人类实践活动出发，以人类实践能力的发展为基本尺度，把人类自由划分为三个宏观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①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这样一种观点：社会形态的进化和发展既是人的能力、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又是人的能力、人的自由发展的结果；人的能力、人的自由发展的程度决定着社会形态发展的高低，社会形态发展的高低又决定着人的能力、人的自由发展的快慢。

一、原始自由阶段

劳动创造了人，“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②人的生产劳动集中表现在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之中。工具的出现，意味着自然的力量可以为人的目的服务，客体的力量变成主体的力量。凭借工具，人开始了同自然界的对抗，调整和控制自然界的变化和发展，以确证自己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并获得自由。总之，第一把最粗糙的石器工具，第一次对工具的使用，第一句原始的语言，都意味着人类能力对动物本能力量的超越。它虽然是微弱的闪光，却是未来光芒的象征，是自由的萌芽，标志着宇宙进化史中新质的凝成。

在这一阶段上，人的能力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在未开发的原始状态下，人以自身直接的生存需要作为生产的尺度，满足衣、食、住、行的最基本生存活动是原始人类唯一的活动，并没有后来出现的精神活动因素和物质活动因素的区别。生产劳动作为人类简单地运用自己体力和最基本意识力的浑然统一体，被全体社会成员平均承担着。人与外部世界的物质交换、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换在最抽象、最简单的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实现。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和劳动的物质前提天然统一，人们在生产中

结成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狭隘的纯粹人身依赖关系，使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最初，社会交往活动只局限于血缘联系之中，“人表现为种属群、部落体、群居动物”，^③“个人”是不存在的，个体的差异也是没有意义的，一概融化在原始的自然的集体之中。和这种最初的关系相适应，社会采取原始共产主义形式。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并无强制性，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逐渐出现了政治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关系。社会开始分解为阶级和集团，并在对立中发展。这种政治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奴隶制、封建制是一致的。马克思把整个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称为“人的限制”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和服从关系。由于这一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劳动与劳动资料的原始统一，使每一个体都和其它个体一样具有维持生命的多方面技能，这种表现上的全面性是原始自由阶段的特征。“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④毫无疑问，整个人类能力是不高的、片面的、抽象的。“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⑤

工具和语言是人类自由的积淀手段。原始人类只是在满足直接生存需要的尺度上进行再生产，然而，原始工具的意义却远不在于仅仅获得直接的消费资料。它“是比外在的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⑥起初，使用工具是为了获得生活资料的中介。后来，不通过中介就无从获得生活资料。于是，工具本身成了目的物，不断地凝结起以往一切经验和知识，使人类世世代代能力的发展由流动的形式转变为物质存在形式。工具，首先是生产力水平的客观标志，石器、铜器、铁器、机器以至电子计算机，“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⑦其次，它又是主体能力的客观标志，是创造性的象征。以自然的力量征服自然，完善自身，这是人类“理性的技巧”。语言贯穿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始终，它保证了人类理性思维的可能。由于“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⑧使人的思维意识过程具有外在现实的形式，使每个人的能动性成果转化为社会的财富，汇入人类能力发展的长河。

总之，工具和语言是使人类个体能力的有限性与类能力的无限性有机统一的保证，是人类自由进程的有力杠杆。人类的本质力量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得以历史地展开，突破原始自由的局限，在新的历史阶段上发展和完善。

二、自由分裂阶段

剩余产品的出现，分工和交换的扩大，是第二个历史阶段的萌芽。人类生产劳动中物质活动因素和精神活动因素的分离是自由分裂的关键。分工和交换在第一阶段就开始存在，但那时“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第二阶段的标准形式和最后完成。

物质活动因素和精神活动因素的分离导致了人类自由本质的扭曲和裂变，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使人们有可能走出物质生产领域从事指挥、管理社会和其它精神产品的创造活动，使精神活动的因素逐渐脱离了浑然统一状态的生产劳动，并凌驾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上。从此，劳动作为维持人类生存的手段与目的分离了，作为满足需要的条件与享受绝缘了，作为被迫进行的机械性体力释放与主体创造性生命本质无关了。劳动者不再是主体，而是受他人统治和支配的工具。在劳动中，人们背对社会，面朝自然，没有支配社会关系的自主权，很难谈得上满足自身的需要和实现自身的价值。甚至，劳动使人否定自己，损伤身体，摧残精神。然而，远离劳动的精神生产活动却吸收了人类能力发展的一切优秀品格，使人感到自由和幸福，感到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自由本质的这种分裂必然导致历史主体的分裂。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精神生产活动，垄断了社会的发展成果，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另一部分人终身束缚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时间，却象征着社会落后和愚昧的一面。个体和类失去了和谐与统一，统一的社会主体分裂为对抗的阶级、集团和个人。社会成为“虚幻的集体”，只是供对立的人们相互冲突和抗争的场所。“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⑩个人和社会互为偶然。个体的发展必然损害社会和他人，社会和类的生存以牺牲个体的发展为代价。人与人在直接现实性上的依附关系不存在了。“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每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⑪至此，我们可以归纳出自由分裂的两种含义：首先，人们征服和支配自然界的能力不断提高，手段不断精确和有效，但丝毫不能驾驭自身的社会关系。对自然的改造和对社会的改造分裂了。其次，人们有目的地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自主程度不断提高，但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返其效益回自身，促使主体内部世界的完善。人和物的关系被颠倒了，物统治人，以摧残人性、追逐利润为根本。

但是，这种分裂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我们从道德上谴责它不合人性，并不是为了引出否定历史的虚无主义结论。这种分裂本身是自由在原始胚胎中的自我伸展和突破。分裂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普遍联系，每个人就好象这架普遍联系的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它虽然失去了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但片面的能力是精湛的，组成了全社会范围的全面能力体系，促成了类能力的提高。资本的伟大历史作用就在这里，它以牺牲了个体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以，自由的分裂是原始自由的自我否定形式，是自由发展的必经阶段。马克思认为：“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⑫因为，“物的限制”是“人的限制”在发达形式上的表现，它使人“享有更大的自由”。^⑬

自由时间是自由分裂阶段的一种积极产物。它主要指人类在满足生存之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用于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把握世界和娱乐的时间。它标志着人类对外在必需的一种摆脱，和对自身动物性生存的超越，因而是对人类自由的进一步确证。自由时间量的扩大意味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剩余时间的增加，为越来越多的人走出物质

生产领域的局限性获得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在此意义上，人类能力的发展依赖于自由时间的增加和有效应用。在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上，自由时间的积累将实现“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对立的扬弃”。^⑩也就是说，自由时间不会永远同劳动的时间处于抽象的对立之中，它将促进占有它的主人变成另一主体，加入直接生产过程。于是，劳动时间本身也就取得了自由的性质。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也就进入新的自由发展阶段了。

三、自由个性阶段

从原始的自由到自由的分裂状态，社会历史进程在总体上仍然表现为一个自发的过程，历史必然性在盲目的社会生活中起作用。“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⑪“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⑫从微观社会来看，每个活动着的人都是自觉的，都有自己的目的和意图。然而，在宏观社会，不能控制的自发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要强得多。个体和局部的自觉性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自发性。但是，如果把以往历史进程中的这种自发性看成全部历史的本质，看成历史必然性的唯一真实的表现形式，那就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解或歪曲。历史必然性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人的活动既有自发的性质，也有自觉的性质。过去的全部历史表明，“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⑬人类社会正是这样一个从无序趋向有序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向往的“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做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⑭使“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⑮

自由个性阶段是人类自由发展的第三阶段。真正的自由个性必须是真正自由劳动的同时实现，需要具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前提条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曾出现了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生产因素的分离。作为这一分离的必然产物，科学技术活动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强劲力量。它不断强化人类征服自然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造成越来越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体系和财富体系。更主要的是科学技术代表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未来，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把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重新融为一体，在新的历史水平上重现人类实践活动的全面性和圆满性，成为消除自由分裂的有力杠杆。

劳动的科学技术化不断地促进人类实践活动的全面性和圆满性，但这个过程同时要依靠劳动的社会化才能最终实现。社会占有了劳动资料，资本对劳动的统治逐渐消失，过度劳动者和有闲者之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之间的对立也随之消失。每个人都是劳动主体，共同占有劳动产品。劳动作为第一需要在社会的每个人身上普遍实现。整个社会运动的盲目状态被代之以由自觉制定的科学的战略目标指引下的发展过程。劳动形式

和劳动的社会条件的改变，使劳动获得了自由的性质。真正自由的劳动是完整的普遍的劳动，是具有自主性的劳动。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产活动一致起来。这时的劳动，已不再适宜于从前狭义的理解，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各种形式本质上都是完善自由个性的劳动。这是人的自由本质的全面的、普遍的、创造性的证实，它使人的全部生命活动成为完整的自主活动。

“自由个性”是人类的个体和类之间新的和谐统一的结果。“个体”这个概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我们越是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是到了自由分裂阶段，才出现人的独立性。

马克思主义并不笼统地反对个人自由。相反，它认为共产主义正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②的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它与资产阶级个人自由口号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以个体与类的和谐统一、以完整的人类生命活动的实现为逻辑前提。理想的个体必须是一种自身圆满的整体，具备类的一切本质特征。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个人”。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为“自由个性”的实现创造条件的现实运动，“自由个性”理论所追求的不仅是类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是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不仅把人的能力发展的状态看作人类自由和社会历史进程统一的基础，而且把人的能力发展的状态看作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所谓自由，首先是指主体的一种能力。一说到不同时期人的自由，总是以其支配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能力为转移的；人类越自由，就越有能力成为整个世界的主人。同样，我们之所以承认社会历史进程是上升的、进步的，也是因为每一次社会形态的转换都是一次人类能力的发展和提高，都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进一步支配和占有。把人类能力状态作为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首先是客观的，它代表着人对世界的现实占有；其次是彻底的，它是对人的一切活动的历史的终极的说明；最后还是辩证的，它是运动发展的，在每一历史时期都有自己辩证的规定。把人类能力状态作为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将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使人类能力获得更广泛更全面的发展是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据所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高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火炬，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它作为一个“真正的集体”的象征，在社会制度方面保障和激励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全面发展。正是从这一尺度出发，我们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它能够为人类能力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的前景。

从以上三阶段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人类自由与社会历史进程的统一，说明了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一方面，人的活动具有自觉的意识，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在一定的条件下人可以将自身的需要和目的对象化、物化，不断改造现有的社会客体，塑造新的社会客体，完善自身，创造自身的新生活，并在这个过程

(下转第10页)

论文化本质

李权时

文化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社会实践的能力和产物，是人类活动的方式。

文化：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文化本质是文化现象、文化形态的共性的高度抽象，而文化与人、人类、人类社会密不可分。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从文化现象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来考察，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显现。

所谓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即“自由自觉的活动”，使自然界深深打上人的烙印，变成人的作品，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表现，使主体客体化。文化就是一个由人类赋予文化意义的客观世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一涵义包括这样的一些内容：第一，文化来源于人和人类，是人和人类的本质力量的反映、体现和标志，文化与人、人类社会共存亡。第二，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作为认识和实践的主体与客观世界作为认识和实践的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的有机统一，离开了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对象化就“化”不起来，因而也没有文化。第三，这里讲的对象化，其“对象”包括自然对象、社会对象和精神对象，一切打上人的活动烙印的对象，都包括在其中，一切“第二性的存在”都是文化。

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同纯粹的自然存在物有根本的不同。没有打上人的烙印的纯粹自然界是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它同人、人类没有任何关系，因而对人来说它是不现实的。纯粹的自然物是人类创造文化的天然材料，但它本身不是文化。只有经过人类加工制作，成为人类的意识化、对象化、物化的自然界，即成为人的“第二性的存在”，才能进入人类的文化世界。文化是人的类活动的一种印记和结果。

然而，并不是所有物质活动的印记和结果都称得上文化。动物的活动也是一种物质的活动，动物的活动也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的特定形式，打上自己的印记，也有结果。但是，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不把自己作为客观世界的对象

物。动物永远超不出自然界。它的活动只能是一种适应性的活动，而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动物界，不存在意识化、对象化、物化、主体客体化的问题。尽管动物活动也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但这种印记不具有文化的意义，而是本能的结果。

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人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变成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它是人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标志，是人类的对象性的存在。因此，人类活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实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对象服从于人类的目的，打上人的烙印。文化作为人的对象性的存在，就其本质来说，它的自身，是人的存在和表现的一种形式。因此，文化与人类的关系是一种相互规定和制约的关系，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来源于人的本质，受人的本质力量的规定和制约，人的本质力量发展到什么程度，文化就发展到什么程度；而人的本质力量又只能通过文化和文化的创造表现出来，人之所以成为人，人之所以不是动物，同动物区别开来，就在于人有文化，能创造文化。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缩影、载体、确证。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人的本质力量是主体的一种内隐要素，而文化则是主体的一种外在显现。它们集主体于一身，是主体的两个不同侧面和表现。可见文化本质与人的本质是相互照应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离开了人的本质，就无法把握文化本质。

那么，人的本质如何规定、制约着文化呢？

关于人的本质的含义，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表述，有三种不同的提法。在《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表述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的特性”，在《提纲》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称“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马克思这些不同的表述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揭示了人的本质，它们相互联系，有机统一。我们应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中来揭示文化与人的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首先，人的本质决定了人的活动同动物的活动的本质区别。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生命活动的区别。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既使人类同动物区别开来，又是人类本质的确证或表现。人正是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创造“对象世界”，构成“第二性的存在”，它就是人的文化世界。

其次，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联系，在于人的社会性，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的社会性赋予文化以社会的意义。人的本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处于永恒的发展之中，是人的一种无限性的创造活动，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无限过程，因此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文化，不能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流动着的、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过程。人的本质作为一种社会联系是多样的，从时空角度出发，社会联系既有历时性，又有共时性。人的本质发展的历时性，是社会文化历史性、时代性的根源。人的本质力量具

有历史性，它决定了文化的历史性。人的本质发展的共时性，是社会文化区域性、世界性的根源。人的社会联系越广，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就越深。文化的过程性、历史性、时代性、地域性、世界性等社会属性，无不根源于人的本质的社会性。

再次，人的需要是人的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是人自由自觉活动的内在动力和根据。而人的需要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人们对于需要是以社会为尺度，以文化为尺度，而不是单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人在实现自己的需要时，以主体的姿态把自然和自身作为客体来认识和改造，使人的本质不断对象化，使人的智力和体力不断凝结为人所需要的产品。人的需要满足的程度以及需要的方式和途径，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也是衡量人的本质力量的尺度，是文化发展的尺度。需要的满足与人的本质力量的水平成正比。将来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正是这种“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调节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原则，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的确证，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标志。

文化：社会实践的能力和产物

承认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必然承认文化是社会实践的能力和产物。因为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表现出来。自觉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是人区别动物的根本标志。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正是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的表现。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从“现实性上”去理解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谓从“现实性上”去理解人的本质，就是从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即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方面，去理解人的本质的规定性，而不是把社会关系当作几条僵死的规定。其实社会关系，就是在社会实践中人与人结成的关系。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社会关系”或它的“总和”的几条僵死的规定，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为此，马克思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旧唯物主义包括象费尔巴哈这样伟大的唯物主义，都不懂得社会实践的意义，它们不知从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方面去理解事物，“不知从现实的本质”去批判宗教，把人看成“离开历史进程”的“抽象的”、“孤立的”东西，看成“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或“类”。费尔巴哈把客观对象只是当作感觉的对象，而不是把它当作人们用自身的活动来改造的对象；他把人的活动了解为只是消极的直观，而不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因此，旧唯物主义无法揭示人的社会本质，从而也无法把握文化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类的一种自觉的实践活动。人在实践中，自身作为一种物质力量的运动，对工具的操行，对客体施加的作用和这种作用所引起客体的改变，都不仅仅是一种外部的活动，而是受自己内在的目的、受自己自觉的意识、思维调节和控制的。人不是一种机械的非受本能支配的物质力量，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物质力量。这种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是通过支配物质活动的形式对象性地表现出来的。实践就是人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对象化的表现。在实践中，实践主体对客体对象的改造和占有，

都是文化世界。

从实践角度揭示文化本质，文化首先表现为人的实践能力。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一切能力，都是文化。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本质力量是人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不同层次的有机整体。它包括人的物质力量、精神力量以及在二者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综合本质力量。人作为实践主体首先有其存在的自然前提。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物质力量，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自然力”、“生命力”。人类这种肉体本质力量包括人的体力，劳动力，各种活动力和各种感觉力。但是必须指出，人的自然力、生命力尽管是一种“天赋”，但它同动物的自然力、生命力根本不同，因为人的自然力、生命力，包括人的感觉器官和感觉能力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社会本质的反映。正是因为人的感觉能力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发展，因而具有文化的意义。人类精神本质力量是人脑的活动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表现。它包括思维能力、联想能力、想象能力，等等。人的思维及思维能力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人类的社会综合本质力量是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在各种社会实践中综合表现出来的一系列本质力量，它包括组织社会生产的能力，进行阶级斗争的能力，从事科学实验的能力，等等。人的本质力量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各种能力，是人类文化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前提和依据，也是人类文化创造性、历史性、多样性的依据。人类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把隐藏在人类身上的本质力量释放出来，创造出丰富多采的文化世界。可见，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其实质内容是人类的社会实践能力的对象化。实践能力是文化发展的尺度和确证，实践能力的广度和深度决定和制约了文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人类社会实践能力是历史的、具体的、多样的。社会实践能力的对象化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多样的。不同历史时代的多样的具体的社会实践能力的对象化，构成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形式。古今中外的一切丰富多采的文化，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还是制度文化，都是社会实践的结果，人的创造，人的作品。

物质文化是文化的物质形式，当今琳琅满目，品种繁多的物质财富，都是人的心智能力和行为本质的综合构造，是精神与物质结合的产物。这种物质文化就其具体形态来说是一种具体的物质，但它们是一种人化了的物质，在这样的物质躯壳中，不仅凝结着人类的体力，而且凝结着人类的智力，沉积着人类的种种观念，如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科学观、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风俗观，等等，一句话，沉淀着人类的文化观。纵观人类文化史，从原始人的第一件石器到现代的机器人，都不是纯粹的自然物，而是“人工合成物”，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社会实践的产物。一切物质财富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物化的知识力量”。有一类物质财富，诸如“空气公园”、“原始公园”等，尽管没有改变其自然形态，但它们同样打上人的烙印，同样是一种“物化的知识力量”，因而是文化。

制度文化是文化的一种制度形式，是人类在实践中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的文化产物。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等等。人类社会数目繁多的社会制度无一不是实践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制度文化中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都有其物质根源，是人的创造物。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其在社会实践中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结成了一定的联系。一定的关系。人类在进行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过程中也生产出社会关系。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以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各种不同的制度。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大到各种社会制度，小到婚姻、家庭、礼仪、风俗、民俗等制度，都是人的本质在社会交往中的对象物，社会实践的产物。

精神文化是文化的一种观念形式。它是人的本质在文化心态及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对象化，包括人类的文化心理和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精神文化也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也是文化的基础。正是由于人们为了获得生活资料，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人们才把自己同客观世界对立起来，把客观世界看作是改造的对象；把思维和存在对立起来，把客观存在作为认识的对象，提出认识的任务，提出了文化的要求。实践还确立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文化的创造者和被创造者，并把它们分离和对立起来，使人类认识和文化创造成为可能。而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文化的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出现、分离和对立，都是实践的结果。认识主体和文化创造者是在实践中确立的。人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但人及其感觉器官，思维能力，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社会本质的反映。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没有实践就没有认识主体，没有文化创造的主体，因而就没有认识，没有文化。认识客体，是人们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它们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这就说明，没有实践，就没有认识主体和客体，也就无所谓认识，因而也就没有观念文化。

文化：人类活动的方式

文化还表现为人的活动方式，表现为人的活动的发展过程。一切人类活动方式都是人类文化的体现。

人类活动方式包括思维活动方式和行为活动方式。思维活动方式又包括心理活动方式和生理活动方式。行为活动方式则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各种社会活动方式，诸如经济活动方式、政治活动方式、文化活动方式以及家庭、婚姻、社会等活动方式。人类一切活动的形式和方法，都是人类处理其与客观世界对象性关系和解决人类思想矛盾的方式，这样的方式表现为、对象化为丰富多采、千姿百态的文化现象。因此，人类一切活动方式，也就是人的对象化活动及其形式，都属于文化世界。

首先，人类活动方式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表现，也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存在物。人类的活动及其各种具体形式，都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具有深刻的文化意

义。其一，人类活动方式是人类的文化行为，是在一定文化的指导下发生的。人的活动方式，不管是思维活动方式，还是行为活动方式；不管是个体的活动方式，还是群体的活动方式；不管是历史上人的活动方式，还是当今人的活动方式，其背后都有文化的动因。人类活动方式的千差万别在于活动主体的文化差别。人类活动方式实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文化行为或行为文化。其二，人类活动方式是人类文化的确证、标志和尺度。人类活动方式是人的本质在人的活动领域的对象化，也是人类文化在人类活动中的缩影和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如何，即人的文化如何，文化的性质、水平、优劣如何，决定于人的活动方式的性质、活动方式的内容和活动方式的结果。这是因为人的活动方式受人的内在尺度的制约，如感觉尺度、认识尺度、审美尺度、需要尺度、价值尺度等的制约，也就是受文化尺度的制约，在什么样的内在尺度的支配下，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活动方式。人类活动方式就是人在活动领域中的文化，观其行，知其人。这个“人”就是文化。其三，人类活动方式是人类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统一，是两者相互结合的产物。而人类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是人类文化的不同形态。因此，就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相互结合的角度来说，人类活动方式又是文化的产物。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表现出不同的人类活动方式，形成不同的文化。

其次，人类活动方式是一个无限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人类的本质和本质力量的发生发展是有限的，同时又是无限的，是有限和无限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人类本质和本质力量发生发展的具体的有限性，构成了整个人类本质和本质力量发生发展的无限性。人类本质和本质力量的发生发展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这一进程构成了人类本质和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无限进程。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既表现在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对象性存在物上面，又表现在人的本质和本身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即表现在人类的活动及其方式上面。从静态角度考察文化，它是人的对象化的存在物，从动态角度考察文化，它是人的活动的过程及其方式。人的对象化活动过程，实际上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文化的过程性同人类活动及其方式的过程性是一致的。我们只有把人类的本质和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和对象化结果有机统一起来，才能揭示文化唯物辩证的本性，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划清界限。

再次，人类活动方式是人类处理和解决主体与客体的矛盾的方式，也是文化创造的方式。人类活动方式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因而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得以形成和实现的现实基础的方式，是解决人—自然、主体—客体结构中一种基本的功能关系的方式。人和自然、认识主体和客体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通过人的活动方式表现出来，并通过人的活动方式各自使自己得到规定，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具体性包括历史性、时代性以及地域性，以及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的性质、结构、功能、作用、水平等都受到人类活动方式的影响和制约，这是因为人类活动方式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媒介和桥梁。没有这个媒介和桥梁，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就不能确定，因而，就没有相互作用，没有对象化，没有认

果，没有文化。

综上所述，文化是一个标志着人类本质和本质力量发展水平的社会范畴，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社会实践产物，人类活动方式的总和。它是人类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存在物以及对象化活动的有机统一，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统一。它包括人类的本质和本质力量发展的水平，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的过程，人类对象化活动的结果等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的领域。

这一文化定义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着力揭示文化本质，同文化自然主义划清界限。文化是人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又是自然物、人类创造物的主体化，是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外化和内化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它属于人和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离开了人和人类社会，就无所谓文化。这就把文化同自然界作了严格的区别。

第二，突出实践的作用，有助于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我们无论从那个视角考察文化，文化都离不开实践。从动态方面考察文化，文化发生和发展是实践过程，从静态方面考察文化，文化是实践的结果。从文化主体方面考察文化，文化主体是实践的主体。从文化客体方面考察文化，文化是实践的存在物、实践产物。从文化主体和文化客体的中介方面考察文化，其中介是实践方式。文化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发展，受社会实践的制约和影响。

第三，强调文化是个过程，有助于克服机械论。文化不是僵死之物，而是运动之流，人和人类的本质力量的发生发展是有限的，同时又是无限的；人类的社会实践的发生发展是有限的，同时又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文化的发生发展的有限性和无限性。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作为人类实践的产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只有相对的意义，它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某一文化形态的发展是无限的，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更是无限的。把文化看作是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显然违背了文化发展的辩证法，必然陷入形而上学。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范英

精神文明学本体层次 及其主要特征

范 英

近些年来，我国在精神文明的理论研究方面，已陆续出版了多本学科式的著述成果。这些成果，既是我国社会实践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迫切需要，也是理论工作者努力探索的初步结晶，正在引起人们的热切关注。为了推进这一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自有许多问题需要加以探讨。本文仅就精神文明学的本体层次及其主要特征方面，谈点粗略的看法。

精神文明学本体的三个层次

精神文明学的本体即本身，是有不同层次的。这里有两个问题需作些简要的界定。

一、关于精神文明学学科式著作的确定。

怎样的论著才属于精神文明学学科式的范围？这是个未有人论及的新问题，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一般原则来确定。

首先，它必须明确地回答作为精神文明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由此而决定的研究方法是怎样的。

毛泽东曾经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要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①这就告诉我们，确定某一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而形成的某一门学科对象，是一般学科体系最为根本之点。作为精神文明学的学科体系，也要从这一点开始。如果没有明确地回答精神文明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样的论文集或专著，只能说它们为精神文明学的诞生作了相关的资料准备，在精神文明学的形成、发展及其今后的完善过程中，尽了应尽的义务，做了有价值的贡献。这固然相当重要，但毕竟不属于精神文明学的学科体系的本体范围。同时，由于没有明确地回答学科研究的对象，尽管那些专著或论文集在研究方法上，会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与学科式地明确表述出来的研究方法相比

较，其缺乏整体性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前后的差别也会较大。

其次，它必须明确地展示由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所决定的学科体系的构架与内容。

这个构架与内容，是由研究对象的内在要求所确定的。如前所述，学科研究既要根据学科对象所具有的矛盾的特殊性，又要根据物质运动形式的相互联系来确定。每一学科，“都是分析单个的运动形态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变的运动形态的”；同时，学科的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态本身之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②任何一种学科在研究对象与方法确定之后，必然会这样来展示其体系的内容与构架的。如果对“单个的运动形态”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变的运动形态”的内在规律没有较为系统、全面的认识，即使对其中某个方面的认识是对的，也不是它的体系构架本身的全部或大部内容，因此，也不能作为学科体系看待，不属于精神文明学体系本体范围。

再次，确定精神文明学研究对象及其体系构架的必要性，是我国精神文明研究的现实情况提出来的。

由于这几年有关论文集或著作的出版，有些书评者在热情支持和诚心指导的同时，往往把没有确定精神文明学研究对象及其体系构架的某些著述或论文集，也划进了精神文明学自身体系这一范围。这种泛化的做法，一会模糊一般问题的论述与作为学科形态研究两者之间的界限，二会降低对精神文明学研究的要求。这些，都不利于本新学科的建立。在我国，精神文明学正处于初创时期，为了其健康的成长，及时地避免一些弯路，及时地提出上述带有规则性的关于学科体系范围的界定，显然不是多余的。当然，这个界定是否全面、准确、合理，有待理论界通过不断的争鸣来达到基本的一致。

二、关于精神文明学本体层次的现实区分。

在上述规则性范围内，必须确定我们所要建立的精神文明学本体的层次。任何事物都会有其自身的层次。人们观察的角度和要求不同，该事物本身的层次也会有别。此间所指的层次，是我们现实中已出现的，主要是从精神文明学的一般到特殊这一角度来说的。其层次有三：

1. 人类一般的精神文明学。

钱学森教授曾经讲过，人类一般的精神文明学，应是一门宏观的、综合的、高层次的学科，它要研究的，是人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和整个社会发展变化的关系和规律。^③我认为，他所讲的宏观的、综合的、高层次的意思，总的就是要从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许多特殊性里面，抽象出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发生、发展及其同其它意识形态等的形式相互联系的东西，来建立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学科的一般，而不是指哪一个社会形态精神文明学科的特殊。这就是人类一般的精神文明学，也即是精神文明学的第一个层次。

迄今为止，对第一层次的精神文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方法和内容构架，作过明确界定的著作已有两本。为简便起见，这里只录其研究对象的主旨：

第一本认为，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主体精神的形成、发展及其同客体存在交互作用的科学。主要的内容，一是研究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起源与演进规律；

二是研究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内部结构与外部联系的规律；三是研究人类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精神文明自身建设的规律。^④

第二本认为，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一是研究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起源与演进规律的科学，二是对各种具体精神文明现象的概括和总结的科学，三是注意分析和评价人类思想史上各种不同文明观的科学。^⑤

前面的两种表述，虽然各有侧重与特点，但对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的主要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至于这两种界定在各自的著作中能否得到较为彻底的贯通，从而表现出研究对象所确定的那个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的本体层次，这是需要另作探讨的事情。仅就上述两种界定而论，它们对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的阐析是很有学术意义的，也将给人们以启迪。

2. 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学。

在我国已有的研究著作中，有的标明自己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学，并对其研究对象等作了界定。较有代表性的也有两种：

一种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就是通过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领域中的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高尚与卑微、美好与丑陋等特殊矛盾，揭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⑥

另一种认为，在界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时应当强调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而，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精神文明发展的条件、特点和规律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式。^⑦

从上两说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包括初级阶段）精神文明学不是研究人类一般的精神文明状况，而是比之要次一些的层次。归结起来，它是以人类社会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为起点，以揭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为主题，以培养社会主义成员的精神素质为根本。因此，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共性，而不是人类一般的共性。这两者虽有交叉与联系，但各自的区别是明显的。这表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有必要从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中相对地独立出来，而不是相互取代。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把它作为一门学科层次来对待，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问题在于，这些初步的界定应在今后的探索中，逐步加以完善。这就是精神文明学本体的第二个层次。

3.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

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以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学科相继出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也应运而生。从一些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作过界说的论著中看，有两种表述：

有的著者认为，它包括两层内容：一是精神文明学，一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同一本著作的另一处，对这两层内容则表述为：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是中国特色。^⑧这两种有差别的表述，并非互相矛盾，其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就是说，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是人类一般的精神文明学或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学的共性、普遍性，同中国具体国情所显示的精神文明的个性、特殊性的有机结合与统一，这个有机结合与统一的过程，是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有的论著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的努力，方向也是对头的。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曲折与艰难，在今天，怎样进一步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研究，是当务之急，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这就是精神文明学本体的第三个层次。

精神文明学本体各层次的主要特征

我国理论界所研究的精神文明学本体三层次，各有何主要的特征？这也是个新问题，在此作些探讨，以祈抛砖引玉。

一、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的主要特征。

精神文明学的第一个层次即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相比较，具有两个主要的特征。

1. 它以揭示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一般为主要任务。

一般是指许多个别事物所属的一类事物及其共性。任何一般大体包括个别，寓于个别之中。人们只有从认识个别开始，才能认识一般；又在一般指导下，加深对个别的认识。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一般可知，所谓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一般，就是指精神文明这一类事物，在人类各个社会形态中形成、发展的普遍性即共性。要较好地把握其共性，必须力求更好地认识各个社会形态的精神文明及其在特定社会形态中的具体状况。从精神文明学本体层次上看，人类一般精神文明的主要任务，是借助于对人类各个社会形态的精神文明及其在特定社会形态中的具体状况的认识，以达到认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一般。这与认识个别的、具体的社会形态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学本体层次的任务，有着明显的区别。就是说，精神文明学本体的第一个层次，其主要任务是揭示精神文明的一般，其它两个层次都是认识精神文明个别。在这里，一般不能取代个别，个别也不能取代一般。

同时，区分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的一般任务与其他两个层次的个别任务，是带有相对意义的。因为“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⑤但必须明确的是，第一层次要求人们站在一般任务的方位上来观察其他层次的个别任务，其他层次则要求人们站在个别任务的方位上来化解第一层次的一般任务，这种区别又是不能混淆的。在我国现有的一些第一层次的论著中，由于受一般与个别之间相对性的关系的影响，而未有严格地区分一般任务与个别任务，甚至把个别任务直接地当作一般任务，或者反过来，这是有待改进的。不然，这种“位移”现象，无益于精神文明学本体各层次的专门化建设。

2. 它对各种具体形态的精神文明赋有一般的指导作用。

由于第一层次的精神文明学以揭示人类社会精神文明一般为其主要任务，便决定

它对第二、第三层次及各种具体形态的精神文明的一般指导作用。其中，我认为逻辑的指导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首先是形式逻辑的指导作用。人们所理解的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撇开具体事物这一思维内容，从形式结构上研究概念、判断、推理及联系规律，主要有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等。它告诉人们如何正确地使用概念、判断和推理，以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和表达思想，以避免思维的混乱。形式逻辑的这些作用，转化在精神文明学本体第一层次中，使之具有形式逻辑的品格，表现为一般的指导功能，用于促进具体形态的精神文明，这就是精神文明学本体第一层次的形式逻辑的一般指导作用。在精神文明研究的一些著作中，之所以产生本体层次“位移”的现象，也同没有理顺这种作用息息相关。

其次是辩证逻辑的指导作用。辩证逻辑不是研究思维的外在形式，而是研究概念的矛盾转化，是作为现实矛盾运动在思维运动中的反映形态和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历史“纽结”来考察的。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不仅具有形式逻辑的品格，也具有辩证逻辑的秉性。它对于一定的、个别的社会形态的精神文明来说，能够给予具体的思维方式、思维方法和思维原则，使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上升到个别，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一致。这在现有的一些论著中，特别是层次方法论的研究中，已被明确地提出了的。然而，提出了并不一定完全贯彻了。要完全贯彻，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只能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加以完善。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主要特征。

精神文明学本体的第二层次即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学，是介乎第一层次与第三层次之间的特殊层次。它相对于第三层次来说，与第一层次较接近的地方，是具有研究精神文明一般的特点；而相对于第一层次来说，它与第三层次较一致之处，是具有研究精神文明个别的特性。大凡中介性的事物，都具有其同上下、左右、前后、里外、远近、大小、强弱等等两头相趋的特点或特性。精神文明学本体第二层次当然不会例外。但这个特点或特性还不是这二层次的本质属性。

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是以社会主义为其本质属性的。这是它诸多特征中最为明显的特征。

精神文明学的第二层次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它固然要以人类一般精神文明为基础，不能脱离共性的统摄，并随时随地去表现这种共性的普遍存在与活力。但是，作为基础的东西，还要求助于第二层次自体自性的本质属性。不通过这一本质属性的基础，或没有社会主义这一本质属性的基础，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学，其研究对象就可能会回复到第一层次的精神文明一般上去。所以，社会主义本质属性，首先是区分第二层次与第一层次的标尺。其次是区分第二层次与第三层次在同一属性下面的差异。这种差异表明：第三层次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是以个别面目出现的，而第二层次则是以一般姿态亮相的。可见，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研究中，认识和把握它的社会

主义本质属性，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其关键的特征，才能摆正它同其他层次的关系。毫无疑问，不以人类一般精神文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这一本质属性，是不能作为第二层次的精神文明学的主要特征的；同时，不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般所属的社会主义为本质属性，也不是这里所讲的主要特征。

此外，坚持对社会主义国家群的考察，是第二层次精神文明学的重要特征。

顾名思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不是只讲某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相关规律的学科。这就需要对历史上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群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从而抽象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这一学科体系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经受着曲折与变化，甚至有的倒退变色，但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群存在过的历史，一些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以及社会主义在全球必胜的远景出发，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来指导其精神文明建设，是完全必要的。因此，这一学说的社会主义国家群的特征是不会马上消失的。但是现有的著作中，有的仅仅考察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文明，论述的也只是这个国家的情况，却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构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时，没有坚持对社会主义国家群的考察，因而在方法论上失却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这一重要特征。

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主要特征。

作为第三层次的精神文明学，相对于前述两者而言，其主要特征有如下两点：

1. 突出的中国特色的个性。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其前提是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同时反映这些前提的各自特征，证明自身的存在与世界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紧密关联。但仅从这个方面来理解是不够的，也不是最主要的。这就必须从其自身所具有的个性出发。其自身最明显的个性，就在于有中国特色这一点。精神文明学第三层次范围内所说的中国特色，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的反映，而不是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特色的写照。在构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体系时，重点镜头要对准中国国情，充分反映中国特色，而不是别的。如不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就可能变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或人类一般的精神文明学；或杂乱无章，前后矛盾，什么都不像。诚然，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可以抽象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或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的东西，但这些经过抽象的东西，已不属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范围；转化为共性、普遍性的中国特色、中国个性，已失去了原有的真谛。有些论著，从其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及构架来看，应该说是属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因为它对中国特色、中国个性的阐析是作为主体进行的。但其中的许多篇幅却用来作这些特色、个性的抽象，并使之超越第三层次，这无疑会削弱第三层次，也于其他层次无补。所以，在第三层次的精神文明学中始终突出中国特色这个个性，是应有之义。

2. 更具体，更生动，更丰富。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个别都比一般更具体、生动、丰富。作为精神文明学本体的第三层次，讲的是精神文明个别，比第一层次的精神文明一般，其具体、生动、丰富的特征是较易理解的。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与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之间，也存在着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这个个别同样具有比一般更具体、更生动、更丰富的特征，并非第三层次所独有。这是对的。然而，我们是在精神文明学本体的全局上，来观察各层次的主要特征的。前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与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比较而来的个别特征，如果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个别特征相比较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个别特征已转化为一般性的东西，而仅存后者的个别这一根本特征。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它在精神文明学本体的全局上，处于双重的精神文明个别的地位，决定其重要的特征中那个更具体、更生动、更丰富的天性。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284页

②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9页

③ 参见范英主编：《精神文明学论纲·代序》，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1—2页

④ 同③，第2页

⑤ 参见张汉青主编：《精神文明学》，红旗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18页

⑥ 参见王驰主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4页

⑦ 参见马中柱主编：《精神文明建设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3页

⑧ 同⑤，第521页

⑨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责任编辑：冯生

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辩证法 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陈 冲

张江明同志在《建立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探索》一文中，主张非对抗性矛盾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我认为，非对抗性矛盾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广泛内容，而不是它的逻辑起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才是它的逻辑起点。

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客观辩证法从哪里开始，主观辩证法也应从哪里开始。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历史应该从哪里开始呢？应该从社会发展客观的主要矛盾的转化为标志开始。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里明确指出了这个矛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开端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正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的性质和内容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基本解决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产生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结束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发展过程。作为科学形态的社会主义辩证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客观辩证法的抽象和概括。作为逻辑起点的抽象不是空洞的幻想，而是对客观事物某一方面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它来源于客观现实。主要矛盾正是社会主义社会诸多现实矛盾中最本质的矛盾。社会主义辩证法的逻辑起点应是对它的概括和反映。所以，这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所规定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非对抗性矛盾起点论，不能说是根本错误的，但并不是逻辑上升的结果，不能充分反映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特点，因为任何社会都存在非对抗性矛盾，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掌握了政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的社會中，非对抗性矛盾广泛存

在，都可以以非对抗性矛盾为逻辑起点，这样，就难以显示它与别的社会的区别，尤其难于显示它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区别。所以，非对抗性矛盾是不够切合社会主义辩证法新特点的逻辑起点。

张江明同志在文章中说：“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它的主要矛盾、本质矛盾，这种对抗性矛盾成为它的逻辑起点。那么，在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对抗的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应该以社会主义的非对抗性矛盾为社会主义辩证法的逻辑起点。”这段话表明了两个观点：第一，主要矛盾是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辩证法的逻辑起点，只不过是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的性质和内容不同罢了，这是对的；第二，把非对抗性矛盾等同于主要矛盾，这是不妥的。从逻辑上看，社会主义社会的非对抗性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关系是属种关系，非对抗性矛盾是属概念，主要矛盾是种概念，主要矛盾比非对抗性矛盾的外延小，更具体。主要矛盾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最本质的矛盾关系，它内在地包含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并由此展开各种各样的矛盾。这种客观必然性规定了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的逻辑起点的应有地位。

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联系和发展的实质是矛盾的联系和发展，离开了矛盾的联系和发展，就没有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也就没有客观辩证法。我们创立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不能以概念为依据，而必须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矛盾的运动和发展为依据。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联系和发展的科学，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和发展规定、影响着其他一切非主要矛盾的运动和发展。所以，主要矛盾应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理论体系的立足点、出发点，也是构成各门科学的细胞和最基本单位。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大厦，应是从主要矛盾起点出发逐步建立起来的。

作者单位：韶关师专马列室

责任编辑：冯生

关于辩证逻辑发展的思考

王 媛 关老健

在我国，辩证逻辑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不仅在吸取黑格尔思辩逻辑，建构辩证逻辑范畴体系方面人们有了进一步探索，还吸取现代逻辑成果，尝试用符号、形式化来丰富辩证逻辑；特别是将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成果吸收到辩证逻辑体系中，对辩证逻辑发展起着积极推动作用。这种研究趋势造成了可喜的局面：一方面自然科学方法论推动了辩证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辩证逻辑促进了自然科学方法的完善。二者的互动作用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然而，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当前辩证逻辑的研究在对实践问题、面向社会领域问题上还有某种程度的忽视，这种情况是不利于辩证逻辑的发展的。

一

认识社会的逻辑方法是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现实的社会斗争中发展辩证逻辑的典范。列宁曾经指出在《资本论》第一章摹仿黑格尔对推理的分析（单一、特殊、普遍），而认为：“警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①列宁的论述指出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意义。而实际上，辩证逻辑本身又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论证的工具，二者的结合，便产生了比黑格尔辩证逻辑更高水平、更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论。由于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对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进行了改造，因此，这种方法就不再是描述思维运动发展的笼统轮廓，而是具体地运用于分析社会现状和解决社会问题。这样，辩证逻辑的任务和目的

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成为分析社会现状、指导社会实践的理论思维工具。这种改变标志着马克思超越了当时唯理论与经验论、演绎主义和归纳主义的局限，创造性地建立了从结构上展开专门科学知识理论体系的逻辑——方法论系统，并远远胜于当时的任何一种方法论。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马克思（包括列宁）曾试图创立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体系，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形成辩证逻辑专著，这对于辩证逻辑的发展，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激励着辩证逻辑工作者把建设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②

从马克思《资本论》逻辑的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必然是历史发展着的，“马克思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种特异的规律”。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为实践社会主义留下广阔的天地，为社会主义留下众多的理论课题，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提炼、概括和发展科学的思维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然包括方法论的发展，尤其是当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迫切需要有象《资本论》那样博大精深的、集逻辑、历史、社会、现实于一身的巨著，因此，辩证逻辑与马克思主义必须协调、同步、统一地发展。辩证逻辑发展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发展为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要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科学方法论论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辩证逻辑在健康、科学的轨道上发展。

二

辩证逻辑面向社会领域也是时代、科学发展的要求。作为科学思维的辩证逻辑不仅要从自然科学方法论吸取养分，也同样要从社会科学方法论吸取养分，要总结认识社会的方法，它必须“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伸出来。”④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我国较为薄弱，但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指导，必然运用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并从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具体不断总结、概括。何况，现代科学发展出现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趋势。分化标志着人们具体、深入地认识物质运动的各种结构和形式的规律性，综合标志着人们全面、广泛地把握世界的统一性。人们为了更好地推动科学的发展，必须运用辩证思维认识这种科学发展趋势，而对这种科学发展趋势的认识，又丰富了辩证思维的内容。

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纪，科学被分割为物理学、化学、地学、天文学等各种学科，并且越来越专业化，这对于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对科学发展缺乏辩证的认识和整体的把握，所以那一时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基本上是不相干的。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裂发展，会导致某种畸形的结果。自然科学的片面发展，将会引导人们无限度地消耗地球日

能耗竭的资源，破坏人类生存条件以及生态平衡，甚至制定出具有毁人类于一旦的尖端武器——核子武器、生化武器、基因武器……因此，自然科学的发展必须考虑它跟人类社会发展的利害关系，考虑它对社会的后果以及应负责任，接受社会对其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这就直接导致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渗透，这种渗透的结果对自然科学发展方向起了某种规范、制约的作用。社会科学的片面发展，也会造成社会科学陷入困境。社会科学发程度如何，往往取决于它吸收科技成果的程度，例如史学和考古学，就是运用现代科技所提供的新工具新方法，才实现了新的突破的。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的整体化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它们各自的发展，另一方面形成许多边缘与交叉的横断新科学如环境科学、社会心理学、管理科学、科技美学等，从而造成了自然科学、人的科学、社会科学的划界越来越模糊，这正符合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所作的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⑤是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整体化发展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正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并日益得到社会的公认。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发展十年的规划中指出：“特别重要的是消除那种将文化和科学看作是各处一个天平两端的思想，把文化纯粹看作是人文主义的向量；把科学看作纯技术，并以自身的条件强加于文化特征而对它构成的严重威胁。”^⑥这种意见不失为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精辟之见。

两类科学的整体化发展，必然会引起人类思维的变革，导致新的思维方式、方法、形式、规律的产生，从而形成具有时代、社会特征的理论思维。辩证逻辑作为一门研究理论思维的科学，它必须从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获得自身的时代、社会意义。

三

辩证逻辑的发展如何才能适应现代社会以及现代科学的发展呢？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⑦原来抽象层次极高的理论思维，思辨性极强的辩证逻辑也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因此，辩证逻辑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活动，是思维产生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源泉。“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⑧社会实践在历史地改造世界的同时，反过来促进人类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的进步。因此，社会实践对辩证逻辑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黑格尔在创立辩证逻辑的时候，曾直接把实践纳入他那辩证逻辑的范畴体系之中。他认为，人的目的的活动是“推理”的一个中介环节，概念推演出观念。概念通过人的有目的性活动而创造观念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他在哲学全书中阐述绝对精神从逻辑阶段外推到自然阶段又回到精神阶段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黑格尔把人类的实践活动纳入其辩证逻辑体系，实际上是把思维与实践的同步、协调而产生的实践观念作为过

程用范畴体系描述出来。可惜的是，黑格尔把这一切都视为自主的精神活动过程，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其实，思维内在结构、方法以及规律，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产生，并且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列宁就是从这一角度肯定黑格尔的。列宁指出：“如果黑格尔力求——有时甚至极力和竭尽全力——把人的合目的性的活动归入逻辑的范畴，说这种活动是‘推理’，说主体（人）在逻辑‘推理’的‘格’中起着某一‘项’的作用等等，——那末这不全是牵强附会，不全是游戏。这里有非常深刻的、纯粹唯物主义的内容”。⑨

的确，把辩证逻辑立足于社会实践，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或重新研究。

关于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的问题。列宁曾经指出：“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⑩这段论述表明一方面思维的形式、逻辑的格是在实践中形成并由实践所决定的，另一方面这种形式是由于千百万次实践的重复而带有巩固性和公理性（即具有规律性）的。因此必须用实践的观点考察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这种实践的观点按照马克思的思路：人在生产中以及在一切实践中，一方面要使自己的活动符合自然事物本身的客体尺度，另一方面又要使自己的活动符合自身的主体尺度。两种尺度的统一，才能保证实践的顺利进行。因此，这两个尺度必然熔铸、统一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因而，实践的本质特征决定了逻辑的格必然是客体规律性和主体目的性相统一的格。这表现在：实践使主体越来越懂得掌握客体的本性和规律的知识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这种原则重复地反映于思维，成为客体规律性的逻辑的格；另一方面，主体按照自身的“内在尺度”去认识和改造客体，并最终用“需要是否满足”来检验这种认识和改造的结果，这也作为主体思想和行为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这种原则重复地反映于思维，成为主体目的性的逻辑的格。这两种逻辑的格是以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个最基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形式逻辑以分立的方法研究了这两种基本形式，辩证逻辑如何研究这两种基本形式的相互推演、辩证运动的规律，就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摆在每一个辩证逻辑工作者面前。很明显，必须把实践范畴、价值范畴引入辩证逻辑，这一课题才具备深入研究的可能。

思维过程及思维方式的问题。对人类思维过程及思维方式的研究，辩证逻辑着眼于思维运动的辩证本性、思维的内在矛盾。随着思维科学的发展，随着对思维实际的深入分析，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理性和非理性是伴随着人类思维过程始终的。理性和非理性对立统一是思维的内在矛盾。人类的思维成果、科学发现、文艺创作，尽管主要是人类理性的结晶，但同时也包含着理性与非理性的综合作用，体现创造者的欲望、灵感和种种情绪的困扰和冲动。黑格尔在他的辩证逻辑中对非理性因素予以高度的重视，他认为：“需要和意欲的满足恢复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和平。因为那客观的事物，只要这矛盾尚存在，或只要这意欲尚未满足，虽仍站在对方或外面，但通过与主观性相结合便同样会扬弃它的片面性。”⑪因此，辩证逻辑以理性思维为研究对象，不应当简单地抛弃非理性因素，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中把握理性思维，把握思维过程和思维方式，这才符合

理性思维的辩证特征。因为，对非理性因素的重视，可以引导辩证思维探索人类潜意识活动，非理性辩证法的深入研究，将会揭示东方神秘主义之谜，使我国古老的文化传统焕发出科学的光辉。

关于思维的社会性问题。思维不可能是纯粹地属于个体的，它只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个体思维系统只有在与社会这个大系统进行信息交流中，只有在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思维成果的学习、吸收中，才能够形成并得到发展。辩证逻辑如何研究思维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辩证关系，如何认识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这也是推动辩证逻辑发展的重要课题。

四

时代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需要高层次的思维。辩证思维运用对立范畴把握对象世界（主要是现存社会）中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运动以及真善美的联系和转化。人们对真善美统一的正确认识，实质上就是对真善美统一进行辩证思维，辩证地分析、反映真善美的矛盾运动。因此，对真善美统一的理解，必须上升到辩证思维这一层面上。辩证逻辑发展立足于实践、面向社会领域，要求它不仅需要提供关于“真”的方法论，而且需要提供“善”与“美”的方法论，通过思维中真善美逻辑形式的具体运演来把握丰富多彩的客观世界。

辩证思维向真善美境界的不断追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思维发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从直观的、朴素的形式向抽象的、深刻的形式发展，从感性具体向理性具体发展，从形式的向辩证的发展，这一发展并不意味着思维的终结，它必然要从社会发展中吸收新的内容，不断使自身深入化和具体化。因此，辩证逻辑的任务不仅在于揭示对象的矛盾运动的一般性图景，而且还在于分析这种图景是怎样产生、运动、向前发展的，从而有效地指导实践的进行。这就要求辩证思维不仅是一种合规律性的思维，而且还是一种合目的性以及“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思维。这种辩证思维的构成，与社会要求造就一大批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①②④⑨⑩《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1页、第357页、第84页、第203页、第233页

③《毛泽东选集》横排袖珍本第263—264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文化发展十年实用指南》（1988—1997）第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⑦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3—374页

⑪黑格尔《小逻辑》第389页，商务印书馆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冯生

陈白沙的自得心学

王伟民

陈献章（1428—1500），广东新会人，字公甫，号石斋，世称白沙先生。他的学说既出于象山，又异于象山。象山的“心”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本心；他的“理”是仁、义、礼、智等封建伦理纲常；他的人生境界是与自身四端本心相统一而合于宇宙之诚，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道德境界。白沙则把象山所倡导的这种“儒家真精神”为己观念，发展为为己之学。其“心”是“无所著”的“虚明静一”之心；其“理”是无限至大、无任何规定性的道；其人生境界是“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忘身忘家忘天下的自然自足、天机活泼的境界。明人李经纶说：“象山之学……再传而为白沙……三传而为阳明子、甘泉子也。”^①这反映了白沙心学的传统关系，但没有反映出它的特质。

一、白沙的“心”、“理”范畴

白沙认为，“心”与“理”是人的价值之所在，是人最可宝贵之处。“人其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②他的为学，就是要寻此心和此理的吻合凑泊处。“从吴聘君学……未知入处、比归白沙……唯日靠书册寻之……累年卒岁而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唯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浑然呈露。”^③他是从静中见吾心之体的，因此提出“为学须从静中养出个端倪来。”^④此“心”是人所共有、千古共同的。

白沙所强调的“此心”、“端倪”、“吾心之体”究竟是什么呢？明末学者黄宗羲曾提出过疑问：“静中养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⑤今人侯外庐

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亦有此问：“何谓‘端倪’、‘心之体’？是否即是孟子的四端？陈献章自己没有作过明确的说明。”但白沙曾说：“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⑥“以无所著之心而行于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⑦可见，白沙所说的“此心”“吾心之体”，就是“无所著”的“虚明静一”之心。这种心，才是人所共有，千古共同的心，才是人们自己行为的主导。他教导他的孩子：“儿曹莫问前程事，若个人心即是天。”^⑧

至于“此理”，白沙认为“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⑨“此理”无内外，无终始，干涉至大，就是至大而为天地之本的道。白沙说：“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而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曾足以与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⑩此道“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人得之而为人。”^⑪它没有任何规定性，因而能成就一切规定性。它不能用语言和文字去描述、去解释，只能由个人体悟自得。他说：“道不可状。道至于可言，则已涉乎粗迹矣。物固于形，道通于物。状之以天则遗地，状之以地则遗人。”^⑫因此，“道自我得之，自我盲之可也。不然，辞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乱人也。”^⑬可见，白沙的“此理”乃是无限至大、无任何规定性、不可言状而只能由人们自己去自悟而自得之的道。这种道，既不同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纯无之道，也不同

于朱子、象山的仁、义、礼、智之道。它是“有物万象间，不随万象调”，^⑯内容丰富，只不过语言文字不能穷尽它而已。它的关键在于人们自悟而自得。你通过无所著的虚明静一之心，悟得道是这样，就可按这样的道去生活；他通过此心，悟得道是那样，就按那样的道去生活。但那只是“涉乎粗迹”的道，而不是道之全体。因而不能以你悟得的道去强加于人。白沙的悟，当然不是随时随地的悟，而是由自己深切的体验得来的一种自信。每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等客观因素各不相同，他们由自己深切体验得来的思想观念，不可能是脱离客观而完全由自己凭空杜撰的。

白沙认为，从客观上来讲，人和天地万物都是此道涵盖中，独立、平等、自足的存在，都是得此道而生。不论天地万物如何变化，人所秉得的道体，却不由此而增损。“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则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无所增；天地之终吾之终也，而吾之道无所损。”^⑰从主观上来讲，天地万物不存在对自身道的认识和把握，人则有无限的认识能力，可以认识自身之道，并以此而推及天地万物。对人来说，天地万物就不是外在的盲目的纯客观的存在，而成为有序的为我的存在。

由此可见，白沙这种对“心”和“道”的认识，已把人类的主体性和个性充分地突示出来。象山清一色的“四端本心”和“仁义礼智”之理，被发展改造成了主体性和个性盎然的“无所著”的“虚明静一”之心和“自我得之，自我言之”之道。在象山那里，“仁义礼智”之理，是人所固有的本性，它预先就决定了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他所强调的只是人在践行“此理”时的自觉主动性。人与宇宙的合一，总体上讲，只是被动的、直接的合一。而在白沙这里，虽然道是万化之本，人是得此道而生，但道具有无限丰富的内容，是不可言状的，不可对它作出任何独尊的规定。人们“自我得之、自我言之”的道，才是具体、现实、可以指导人的行为的道。这就把象山只是在做人方法上的自觉主动性，发展成为世界观上的以个性为基础的主体性。这是心学观念的一种飞跃，成为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先声。

二、白沙“以自然为宗”的自得之学

象山心学在宋末虽然未被封建统治者所肯定而趋式微，但它所执著讲求的儒学做人为己的真

精神，却是它能在逆境中顽强发展的不可磨灭的生命力量。元、明两朝，朱子理学得到官方的提倡，被“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⑲出现了“天下学皆朱子之书”的局面。^⑳但象山心学还是能够通过依附于朱学（朱陆合流）的形式，而得以广泛地传扬。其原因就在于其自得自立的为己观念。白沙继承了这一观念，并把它发展成为为己之学。

白沙认为，世界是以道为本、自然自足的世界。人与天地万物，都是此道涵盖中的平等、独立而自足自然的存在。他说：“宇宙内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动自静，自阖自辟，自舒自卷。甲不待乙供，乙不待甲赐。牛自为牛，马自为马。感于此，应乎彼，发乎迩，见乎远……无一物好于其间。”^㉑在他的诗文中，常可见到他对这种自足自然世界的崇尚。如：“说到鸢飞鱼跃处，绝无人力见天机。”^㉒“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鸢飞鱼跃……万化自然。”^㉓处于这一自足自然的宇宙中，人不应当执著而自私于自己的形骸，应当把自己融入宇宙大化中去。他提出：“一痕春水一痕烟，化化生生各自然；七尺形骸非我有，两间寒暑任推迁。”^㉔因此，他主张做人应当一切顺道自然，学者以自然为宗。”^㉕做人为己，是做自然之人，为自然之己。这首先要立自然之本。“立本贵自然。”^㉖若不先立此自然之大本，则“所务者小，所丧者大。”^㉗“学莫先于为己为人之辨。”^㉘而为己最重要的是自得。他强调指出：“夫学贵自得也。自得之，然后博之以典籍，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则，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㉙只有自得，所博之文才能为我所用，才能真切为己，而不至于人云亦云、飘浮无根，形同影响。他批评当世学者“不求自得，诵说虽多，影响而已。”^㉚自得为己，就能无愧怍于天地之间，而获得人生之真乐。“富贵非乐，湖山为乐。湖山虽乐，孰若自得者之无愧怍哉！”^㉛

那么，白沙这种以自然为宗的自得之学，其所自得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地认为，其所自得的内容就是象山的“四端本心”。白沙自己没有对其自得的内容作直接的阐释，但从他一些言论中看出，他自得的内容乃是不可言状的道。“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贵贫贱，死生祸福，曾足以以为君子所得乎？君子之得如此，则天地之始吾之始，而

吾之道无所增；天地之终吾之终也，而吾之道无所损。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损，则举天地间物，既归于我，而不足以增损于我矣。”^⑩这里的“得”有两层含义：一是客观上的得，即“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人客观上秉得万化之本的道；二是主观上的得，即自得，觉悟和领会自身所秉得的道体。

三、自得之学与现实社会的结合

白沙心学以自然为宗，以自得为贵，处处表现出超凡脱俗、孤傲自足的气象。但是，他生活于其中的毕竟是现实的封建社会。在思想领域可以逍遥自由，在实际生活中，他也不得不与封建伦常相妥协。出于应酬，他承认朱子为吾道之宗主，接受“敬”的观念和义利之辨。他说：“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说敬不离口，示我入德方。义利分两途，析之极毫芒。”^⑪他宣扬了程朱理学“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人为理而生而活而死的价值观。“两节妇贵贱不同，但死于义，一也。……今之诵言者咸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故临利害、彼二氏乃能之，学者固不能于此。然则从事于诗书，反无所以，彼之不学，乃能不坏其性，何耶？是必有所以然者。学止于夸多斗靡，而不知其性为何物、变化气质为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于禽兽者几希。”^⑫他深许学生湛甘泉“随外体认天理”的主张，认为“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⑬他还说：“名节，道之藩篱也。藩篱不守，其中未有得存者。”^⑭白沙也曾对他的自得之学，作了符合现实社会的描述：“重内轻外，难进而易退，蹈义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似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盖亦庶几乎吾所谓浩然而自得者矣。”^⑮这就是白沙自得之学与现实社会的结合。但这种结合，不是全面的结合，而是部分的结合。蹈义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只是自得之学的一种，而不是它的全部内容和实质。所以白沙这里用的只是“盖亦庶几乎吾所谓浩然而自得者矣”。这样或然的语气，而不是肯定的语气。

白沙自得之学与社会现实的这种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掩饰它有悖于封建伦常的实质，使后人大都把它等同于象山的心学。这也使得白沙本人

得到封建统治的褒扬，于1585年被赐谥“文恭”并从祀孔庙。

- ① 《明儒学案·卷五十三·诸生李大经先生经纶》
- ② 《陈献章集·卷一·禽兽说》
- ③ 同②《卷二·复赵提李金宪》
- ④ 同②《卷二·与贺克恭黄门》
- ⑤ 同①《师说·陈白沙献章》
- ⑥ 同②《卷一·书自题大塘屋诗后》
- ⑦ 同②《卷二·与林郡博》
- ⑧ 同②《卷六·示儿》
- ⑨ 同②《卷二·与林郡博》
- ⑩ 同②《卷一·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
- ⑪ 同⑩
- ⑫ 同⑩
- ⑬ 同②《卷二·复张东伯内翰》
- ⑭ 同②《卷四·偶得寄东所》
- ⑮ 同②《卷一·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
- ⑯ 《滋溪文稿·卷五·伊洛渊源录序》
- ⑰ 《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六》
- ⑱ 同②《卷三·与林时矩》
- ⑲ 同②《卷六·赠周成》
- ⑳ 同②《卷四·示湛雨》
- ㉑ 同②《卷六·观物》
- ㉒ 同②《卷二·与湛氏泽》
- ㉓ 同②《卷四·答张内翰延祥书括而成诗呈孺希仁提学》
- ㉔ 同②《卷一·书漫笔后》
- ㉕ 《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上·语录》
- ㉖ 同②《附录·二·白沙先生行状》
- ㉗ 同②《卷二·与湛氏泽》
- ㉘ 同②《卷一·湖山雅趣赋》
- ㉙ 同②《卷一·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
- ㉚ 同②《卷四·和杨龟山所同不再得韵》
- ㉛ 同②《卷一·书韩庄二节妇事》
- ㉜ 同②《卷二·与湛氏泽》
- ㉝ 同②《卷二·与崔楫》
- ㉞ 同②《卷一·李文溪文集序》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范英

访苏格兰哲学见闻

张华夏

1988年11月至1990年10月，我应邀到苏格兰阿伯丁大学进行了两年的学术访问。虽然社会制度不同，学术体系有别，但学术交流，取长补短，却是极有益处的，下面谨将我访英的一些哲学见闻辑录于后，以飨读者。

一、返老还童：“你今年读几年级了？”

我访英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西方的科学哲学，准备利用英国的丰富的图书资料，撰写一部科学哲学教程，另一方面，我要了解英国的哲学教学，以便我们的哲学教学改革有所借鉴。开始，我操着很不熟练的英语，艰难地听了他们开设的科学哲学、解释逻辑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三门课程。一个学期过后，我想想不对。为了全面了解英国哲学系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光听几门科学哲学课是不够的。于是我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当个老“学生”，听了阿伯丁大学哲学系给学生开设的大多数基本课程。除科学哲学外，哲学原理、符号逻辑、政治哲学、伦理学、环境哲学等课我都听了。有些课程我还做了习题，交了作业，另一些课程我还参加了课堂讨论。

阿伯丁大学，是英国4所古老大学之一。英国的第一所大学是剑桥大学，成立于1210年；第二所是牛津大学，成立于1230年；第三所是苏格兰的圣安佐（ST Andrew）大学，成立于1413年；第四所就是阿伯丁大学了，它成立于1490年。这所大学有一个非常庄严、非常美丽而又非常宁静的校园。就在这里，我背着书包来往穿梭于图书馆、教室、学生宿舍和学校专为我配备的办公室（即书房）之间，仿佛自己回到了早已消逝了的学生时代。我今年快59岁了，可是阿伯丁大学

不到20岁的年青生长了满脸的胡子，他们看不出我这个只有一点点胡子的人的年龄，常问我读大学几年级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样地返老还童，真是太滑稽，而且太美妙了。由于亲身参加了阿伯丁大学的教学活动和研究活动，既当了研究员又当了普通大学生，所以对于他们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学组织与管理、学术风气和学会活动略知一二。

二、奇特的哲学分类：“你是一个道德哲学家，还是一个科学哲学家呢？”

苏格兰有8所综合性大学，其中6所有哲学系。我只到过其中4所，这4所大学的哲学系，其课程体系大同小异。以阿伯丁大学哲学系为例，它的基本课程分为5类：第1类哲学原理或一般哲学（General philosophy），包括心物问题，知识、信念与理性，人与自我，逻辑初阶，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分析哲学引论等。第2类是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奎纳，洛克，休谟，笛卡儿，康德，康德的形而上学，康德的道德哲学，存在主义，海丁格，中世纪的逻辑与哲学，维特根斯坦，实用主义，20世纪的法国哲学，苏格兰哲学。第3类是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包括道德哲学导论，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美学，战争与环境等。第4类逻辑与科学哲学（Logie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包括科学哲学导论，社会科学哲学，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科学伦理学，知识论，逻辑与语言，形而上学与语言哲学，符号逻辑，因果性与解释逻辑，哲学与计算机（原理论与模态逻辑）。第5类是

专题哲学(Special philosophy)，包括环境哲学、应用伦理学、伦理学与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宗教哲学、心理哲学与行动哲学等。课程的体系问题不仅是一般的课程设置问题，而且体现了哲学学科的分类和哲学研究的动向。从哲学学科的分类结构来看，这个课程体系有两个重大的特点：

第一，除了一般哲学(他们有时将哲学史称为一般哲学(II))之外，哲学基本上划分为两类：道德哲学和科学哲学。我在苏格兰各种哲学学术会议上，当主人向客人介绍我是从中国来的学者时，我常遇到别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一个道德哲学家呢，还是一个科学哲学家呢？”而苏格兰最古老的大学圣安佐大学就有两个哲学系，第一个哲学系是道德哲学系，第二个哲学系是逻辑与科学哲学系。一栋罗马式的十分对称的古典建筑物，左边一个门挂着第一个哲学系的牌子，右边一个门挂着第二个哲学系的牌子。以极其形象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出，当代英美的哲学有这两个基本的门类。

第二，哲学划分为理论哲学与应用哲学。现代哲学有向应用哲学发展的趋势。例如阿伯丁大学哲学系有一个研究中心，叫做CPTS研究中心，即centre for philosophy, Technology and society(哲学、技术、社会研究中心)。它的研究课题就包括环境课题，污染控制，自然资源的管理，能源的节约，医疗中的资源分配，生物技术开发的界限，自动技术与就业，版权与专利，农业工业化，动物的福利，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等。乍一看这些课题不像哲学，倒像社会学与管理学。也许正因为其中有许多哲学问题、伦理学问题需要解决，所以也就进入了哲学家们的视野。总之他们这样重视哲学的应用研究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的。过去我们也曾提出过应用哲学这个概念，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哲学可以分为理论哲学和应用哲学两大类。

三、五花八门的课程内容

苏格兰大学的哲学课，它的哲学原理或一般哲学是分析哲学。这类课程是哲学系低年级学生学的。也有许多外系的学生选修这门课程。上课时，整整一个阶梯教室坐满了人，有70、80人左右，而其中哲学系学生只有10余人。普通用的教材是美国加州大学哲学教授John Hospers写的

《哲学分析引论》。已出版了第7版，篇幅很大，内容很多，共有600多页，可以说是我们研究当代英美哲学的入门书了。

苏格兰在大学的哲学教学，特别重视逻辑和语言哲学的教学。已经没有形式逻辑课程了，逻辑课讲的都是符号逻辑。我问教授们为什么不讲形式逻辑，他们说，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教学体系已经被淘汰，由符号逻辑取而代之。例如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已由类演算所代替。上逻辑课时，教师常常请一些学生上黑板前进行推演。我发现，这些文科大学生在逻辑演算方面的形式推理能力是很强的。阿伯丁大学的逻辑课有各种不同层次，要求低的只学10周到15周，学完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就完了。要求高的，还可以选修证明论和模态逻辑。但不论要求高低，逻辑教学已经可以用计算机辅助进行，有一个软件可以用计算机来证明64个符号逻辑定理。至于语言哲学，有些哲学系开设的语言哲学课程种类繁多，已经到了我们无法与他们交流的地步。

在科学哲学方面，他们的教学与研究都很详细，在英国所有著名的大学，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阿伯丁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等，除哲学系之外，另外有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阿伯丁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专门研究牛顿。由于太专，我没有听他们的课，但哲学系的几门科学哲学课我是从头到尾都听过了。高层次科学哲学课程基本上还是逻辑经验论的那一套，在这基础上也讲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但是都持批判的态度。可见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还是根深蒂固的。至于低层次的科学哲学课程，苏格兰各大学几乎都用A.F.Chalmers的《科学究竟是什么？》作基本教材，其他自编教材都不过是这本书的变种。

关于政治哲学，阿伯丁大学哲学系除了讲授洛克和罗素的政治哲学之外，主要是讲韦伯的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学期的课程。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重要著作都收入这个选读本中。学习这门课程，还必须阅读《资本论》第1—5章和第8章共300多页。我发现英国哲学系的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兴趣的。学生自己组织的讨论会中还有这样的题目：市场经济下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讲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教授对马克思是很崇拜的，他说：马克

恩是我们英国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确，英国人是很熟悉马克思的。有次我前往伦敦，瞻仰马克思墓。在地铁站Hightgate下车还得走半个钟头。我一下车就迷失了方向，只好边走边问路，几乎问了上10个英国人，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都有，其中没有一个不知道马克思墓在那里的。

四、环境哲学新课题

我到了英国，特别到了苏格兰，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环境的优美。英国在保护环境方面是举世闻名的。英国是工业化最早的国家，也曾经是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50年代和60年代，由于人民群众反公害斗争以及绿色运动的兴起，迫使政府通过法律，采取措施。现在伦敦的泰晤士河，河水明净，海鸥、水鸟成群结队飞来，即使许多大城市的中心，野生岩鸽也常常盘绕在行人身边，展示出一幅人鸟同乐，自然与人类相协调的景象。有次我约了几个中国留学生，假日骑自行车从阿伯丁沿公路北行，骑车共8个小时，沿途没有看到过一片黄土，树木、森林和草原全部覆盖了大地。除了稀疏的住房外，到处是绿树成荫，绿草如茵，英国在环境保护方面之所以取得一定的成就，其中哲学有一份功劳。我在阿伯丁大学，学过一门课程，叫做环境哲学（Environment Philosophy）。这门学科，首先分析了哲学上的两种环境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自古以来就有两种环境观。一种观点是“人居于自然之上，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西方的宗教就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人是上帝的特殊创造物，自然界是上帝制造出来供人使唤的，它是人的奴仆。人类可以掠夺它、破坏它，自然界并非人的家，而只是人们来此受苦赎罪的场所，它终非我们久留之地。因此人类无须保护自然，也无需保护自然环境。环境哲学批判了这种环境观，主张“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侵犯了自然就会遭受自然的报复。所以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地、协调地发展。不过环境哲学认为，迄今人类还未曾找到有建设性的有关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于这种建设性的人与自然的协调方法，有人主张从东方哲学的“天人合一”中寻找，有些人则主张从现代系统论中寻找，总之研究这个问题是现代哲学的一个紧迫的任务。

于是在环境哲学中，出现了一个重要部分，它就是环境系统哲学。环境哲学认为用系统论、

控制论的观点分析环境，人类生态系统就如同任何一个系统一样，作为整体有它的发展的暂态过程（青少年时代）和稳态过程（壮年时代）。暂态过程即开发时期或开拓时期，其生存的策略是人口高生育率、工业高速度增长、资源大量开发与滥用。但是现代的人类社会，像中国、美国、欧洲这样的社会已经成熟，它已经或早已达到饱和的程度而进入了稳态，生存的战略早就应该转变到它的对立面。于是人口控制、工业的低增长率、资源节约与再循环、土地使用规划化成了人类生存的新的方针。

环境哲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认为，伦理学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第1阶段主要是调节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制定这方面的行为规范。第2阶段主要是处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订立这方面的行为规范。第3阶段即现阶段要处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人应该以一种文明道德的态度对待环境，建立人对待环境的正确行为规范。70年代至80年代，在世界范围出现的环境运动，意味着环境伦理学已被普遍接受了。环境伦理学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做动物的权利animal rights，动物也有自己的生存权利，它的生存应受尊重，残忍对待动物也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甚至是一种罪过。所以法律规定捕杀鸟类要受处罚，即使开车无意将它压死也要罚款。另一个概念是后代人权（The rights of unborn generations）。后代人虽未出生，但是他们的人权不应受到侵犯，他们作为未来公民的权利应受到保护。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侵犯他们的人权了，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世界比我们从祖先接受的世界差得多了。我们多生殖了人口，侵犯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我们用尽了肥沃的土地，我们破坏了森林，我们毒化了空气，我们扔下了一堆垃圾……已经到了有负于后代的程度，这是对后代人的不道德行为。总之，环境哲学是一门很有现实意义的哲学学科，它普遍地受到英国各大学的重视。Lancaster大学还专门有这方面的硕士学位。我想，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和宣传这门学科应该是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的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严格的教学组织和活跃的学术气氛

过去曾听说英国的大学非常正规，这次访

英，对此算是有了亲身的体会。所有的教授讲师上课，都不是随便讲一些什么，讲到那里算那里。我接触到的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教学大纲。讲课时每人几乎都有一份用计算机打印得整整齐齐的讲稿，每次上课都向学生分发一份讲课提纲，其中详细列举该次讲课要讲的内容和详细参考书目。并且，每次上课都要点名签到。课堂上学生可以随时提问而学生也经常提问，但课堂纪律却是很好的。教师们每人几乎都同时给学生上2—3门课。除了讲课外，教师还要亲自主持课堂讨论。讨论时学生每5个人一组，安排在不同的时间，都由主讲教师主持，所以对于每个学生学习情况和思维能力，他们是了如指掌的。英国社会，生活节奏并不紧张。一般人很讲享受，由于福利待遇比较优厚，造成许多无业游民，有工作不做的懒汉和“失业者”。但是，大学里教师的工作却异常紧张。我在阿伯丁大学有一个专用的办公室。在我办公室的隔壁，是逻辑学讲师P. Clarke小姐的书房和办公室。Clarke小姐已40多岁，不过人们还是叫她小姐，大概是未婚罢。我看她星期六和星期天，都在办公室备课、改作业，忙个不停，有时晚上还工作到深夜。至于系办公室的工作效率更高，阿伯丁大学哲学系开设20—30门课程，只有教师11人，办公室只有一名女秘书，收发书信文件、处理日常事务、替系主任打印讲稿，全包在她一人身上。和我们中国某些大学的哲学系相比，我们的机构确实显得太臃肿了。

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大学哲学系的学术活动是很灵活而且很活跃的。系里都有定期的学术讨论会，叫做staff seminar。本系教师必定参加，也有研究生甚至本科学生参加。在学期开始前将一学期学术讨论会的安排公布于众，其他系甚至其他学校有兴趣者都可前来参加。每次讨论一个题目，报告人报告个把钟头，讨论个把钟头，发

言都是非常踊跃，非常热烈的。剑桥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每周有一次这样的学术讨论会。我最初曾打算到这个系进行学术研究工作。系主任给我的邀请信就说明他们系的优越条件之一是每周有一次学术讨论会，有许多名家在此作报告并进行讨论。后因那里的生活费用高昂，只好放弃了。阿伯丁大学哲学系学术讨论会规模小一些，平均每2周一次。我在阿伯丁大学作了3篇科学哲学论文，都是在哲学系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讨论并答辩的。我的英语本来说得很不流畅，不过更大的困难还是即席回答学者们连珠炮般的问题。每次宣读和讨论我的论文之前，我都花了足足1周的时间，对估计可能被提的问题，作好准备，写好发言提纲。经过一番艰巨的准备工作，我的答辩总算还过得去，大家给我的评价是，“你讲的问题很有兴趣”。我因为体会到定期学术讨论会的优点，所以我回到中山大学后，征得校长的同意，组织了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定期的“科学哲学论坛”，每2周一次，有校内外同行或爱好者参加，发言异常踊跃，有时辩论异常激烈，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除了各校各系的学术讨论会之外，整个苏格兰地区，有一个哲学俱乐部(Scots philosophical club)每年召开两次年会，一次叫做春季学术会议，另一次叫做秋季学术会议。每次开会两三天，无非是宣读讨论论文，共同聚餐，交流学术，由苏格兰各大学哲学系轮流主持，轮流坐庄，这次在你校开，下次在我校开，自由参加。方式上显得格外灵活，筹备工作异常简单。发一个会议通知注明时间、地点、附近旅馆、费用，一个电话、一张支票就几乎解决了所有的会务问题。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冯生

晚清社会的游民问题

王跃生

“游民”实际上是流动人口的一种。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混迹于城市乡村。在晚清（1840—1911年），游民数量庞大，活动广泛，其行为给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带来影响。对此很有必要加以研究。

清王朝进入晚期，封建统治秩序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各种力量的极大冲击，国内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国外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干涉，整个帝国呈现出一派混乱、动荡的景象。经济更加凋弊，百姓生活异常艰难。旧的经济结构已经不能满足人们谋生的需要，新的经济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加之人口众多，所以，许多行业都出现了一支游民队伍。其主要有：

失去土地的农民。晚清阶段，失去土地的农民大大增加。其原因固然有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而人口过多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我国人口在清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达到四亿。^①晚清的人口一直保持在四亿上下。但人均占有土地量不断减少。康熙二十四年全国有可耕地607842300亩，^②当时人口为1亿，^③人均占有6亩；道光年间全国约9亿亩，人均2.3亩（按四亿人口计算）。同时，在私有制经济下，两极分化的现象越发严重。农民无田可耕，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所以，咸丰年间有人指出：“今地不加于汉，垦田不能加多，夫民倍于昔而田不加增，则民乏本业者众。”^④农民无田可耕，游离于土地之外成为“闲民”，无所事事，最终加入游民的行列。在山东，“人多田少，不敢耕种”，“闲民日多”，“弱者坐守饥困，黠者流为剽窃”，其中曹州、东昌等地，“历年多盗，诛不胜诛”，“良由年壮游闲，迫而为此”。^⑤福建永春一带，“田土

瘠隘”，百姓“资生无策，半游食于延津两府”。^⑥至于四川、广东等地离土农民则更多。在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社会中，却有比例如此大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并且绝大多数不能被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近代工业部门吸收，因而，成为晚清游民队伍中的主要部分。

失业的手工业者。鸦片战争后，外货的输入、倾销给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很大打击，即所谓“洋货日销，土货日绌”。从业者因而陷入无利可图，甚至无以继续维持而失业的境地。在安徽，“洋货充斥”，本地“物产滞销”，因而旷土游民日以加增，举凡皆仰给于人。^⑦传统的纺织业受打击最大。通商以来，洋纱洋布岁销“五千六百万”，小工、小贩因而失业。苏州的机业原先有缎纱机一万余个，从业者不下十余万人。1900年，其中失业者达“七八千人”。^⑧手工业发展的不景气，直接导致手工业工人谋生的困难。1879年，南昌一个工人每日工钱只有十数文，如此“尚无人收养，实缘人力太多……势不得不贱其值”。^⑨清政府的苛捐杂税摧残了手工业，人为地造就了无业游民。如广东新会“阖邑之老少男妇……率皆业葵扇业为生”，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开始征收厘金，当地百姓不敢种葵，“所有一切手工皆苦无以养活”。1900年前，北京的食力、食技之人“不下数十万”，他们“皆系客民”。“惟自洋兵入城、资本无出，坐食山空，不免流为匪类”。^⑩不过，总的来看，手工业者的谋生条件比农民要容易些。近代所兴建的新式纱织厂、造船厂、枪炮局等就吸收不少原来的纺织工、木工、铁工等。因而从其中产生的游民相对就少一些。

裁减的兵丁。近代社会中，反抗清王朝统治的起义不断发生。为加强镇压力量，清政府大量募集兵勇。这些兵勇本来就是城乡游手好闲之

辈，为糊口、食粮而应募，一旦战争平息，他们就会被解雇、遣散，重新加入无业队伍，成为活动方式更加肆无忌惮的游民。19世纪60、70年代，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两支起义队伍后，即大量裁撤营伍勇丁，其中有湘军数十万，淮军和川军十余万，绿营兵五六十万。此外还裁减了大量巡防营和其它杂散武装。这些人回到家乡后，生活无着，不少人加入当时纷纷兴起的秘密会社组织，或窃盗、或“散票取钱”。被遣散的湘军兵勇回籍后，“不能秉耒于西畴，剽掠椎埋，扰害闾里”，“竞为浮荡”。^①上海晚清时期盗贼盛行，明火抢劫比比，“推原其故，盖裁兵逃匪时而集合，时而解散，生计所迫”造成。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溃兵散勇，化为伏莽，患乃复深”。^②1900年后，这一带遂成为“胡匪之世界”。^③由此可见，裁汰的兵丁在晚清游民队伍中占有很大比重。

失业的运丁。漕运是清代一个重要的运输行业。漕运业全盛时期，“粮船水手，河岸之纤夫，集镇之穷黎，借此为衣食者不啻数十百万人”。^④太平天国起义之后，特别是起义军攻克南京之后，漕运中断，清政府转而以海运代之，并一直保持下去。大量以漕运为生的运丁、船夫因而失业。原先江浙地区的粮船水手“俱系山东无业游民”，他们终年受雇在船，无家可归，可谓“在船则为水手，在岸即为游民”。^⑤漕运取消后，他们变成地地道道的游民。江苏江都地区的百姓，自元明以来，“丁壮逐河漕之利”，“漕运改革，向之千指万插者，今则悉成游手”。他们无从谋生，“穷而为盗”，“罪至斩枭，不能禁止”。连清政府官员也称，“其情形亦甚可怜”。安庆帮漕船水手，自粮船停废，“无以为生”，于是“散处各州县，名日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他们起初“千百成群”，游荡于淮海一带，后来蔓延“江南郡县”，以至“无地无之”。^⑥晚清漕运的废止实际等于取消了一种社会职业，而当时其它行业已经满员，因此这些新失业者不可能找到正当的谋生之路，只好游行于各地，以趁机的方式去寻求衣食之源。

灾民。晚清时期，封建的经济基础非常脆弱。正常年景人们尚有衣食不继之虑，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大批百姓便被迫离乡背井，前往附近城镇求生。而城镇的容纳力又十分有限，走投无路的灾民只好随处乞讨，最终由流民变成游民。

1880年至1890年间，长江流域的江苏、湖北、湖南6省区连年受灾。当地百姓纷纷投奔上海、南京、汉口等沿江城市，数量常达十万至数十万。他们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成为街头乞丐和江湖游民。就一般情况而言，如果自然灾害能在短期内消除，那么流往他乡的百姓还是会返回家乡的。而晚清时期的天灾在许多地区常常要持续数年，所以灾民只好长期谋生他乡，成为职业游民。

以上所述只是晚清游民来源的几个主要方面。如细分起来并不止这些。游民的来源不同，其活动范围也有不同。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游民遍及各地；灾害年代其数量最盛；手工业失业者则主要在城镇地区，无业运丁在运河、长江两岸活动较多。兵勇则以江淮、东北为众。对于游民，清政府虽深感忧虑，却无法从根本上堵塞游民滋生之源，因而晚清游民问题一直很突出。

二

城镇游民大量增加。1840年以后，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一批工业、港口城市在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先后出现。同时，上述地区的传统城市也开始引进新的技术，建起轻纺、机器等工业。不少在农村难以谋生的百姓和其它行业的失业者一批批涌入这些城市寻找职业。而能够在其中获得固定工作者只是少部分人，大多数人只能从事一些临时性雇佣劳动，或者干脆闲游于街头。上海的地棍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人“平日皆无职业，专事游荡，设阱陷人”；“昼则饭馆，晚则逆旅，茶坊酒肆更无不有其踪迹”。

这些活动于城镇地区的游民，主要谋生方式有以下几种。

偷窃。这种行为在城市游民中普遍存在。上海作为晚清时期新兴工商城市，也是游民汇聚之地。该地偷窃之多名闻天下。当时人指出：上海多盗而少贼，通衢大道，商店民居，皆为群盗出入之地。“盗之多，始以光绪之中叶，而蔓延于宣统时”。他们往往“成群结伙，携枪带刀”，当地的巡捕也畏惧几分。在广州，为防范盗贼，当地居民于天井上“网以铁丝，复砌屋瓦成阶级形，屋与屋之断续处，贯以木桥”，以便击柝者夜行巡逻。^⑦由此也可见当地盗窃者之猖獗。

乞讨。近代城镇中乞丐极多。如果说城市中的盗窃者多为强壮之人的话，那么，乞丐队伍则是一个成份多样的群体，男女老幼，健壮残废皆

有。他们“无恒产，无恒业，而行乞于以图生存之男女曰丐，世界列邦皆有之，而我国为独多”。晚清的乞丐可分成以下数种：（1）专门于别人家有庆吊活动时前往乞讨者。当时一些城市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商店人家之有庆吊事也，乞丐例有赏封可得”。这类乞丐常常“分疆立界，各有门户，两不相犯。凡在其界中者，不论庆吊之为何事，皆有所获”。赏赐数目“视门户大小以定多寡”。同时，庆吊时“迎亲、出殡所用夫役，亦皆由丐承充”，以此来得佣金。（2）专走江湖之丐。这些人一年去一二次，“至则索钱于丐头，亦有自丐于商店人家者”。（3）挟持之丐。他们一般游行江湖、从事唱曲、耍棒等卖艺性的活动。（4）劳力之丐。这些人在桥头帮人曳车上桥，于车站、码头替人运送行李，以获取酬资。（5）残疾之丐，由于身体残疾，于街头热闹处行乞，博得过往之人怜悯和施舍。（6）诡托之丐，通过各种欺骗手段来骗取人们对其同情，谋得钱财。（7）强索之丐。按当时习俗，徒流罪人，赴配所途中，于所经市乡镇，“例得求乞”。若乞钱不予，则用刀自伤，或额或颊，以流血吓人相威胁。（8）卖物之丐。从事一些小商品的买卖，这些人多被丐头控制。^⑦从中可见晚清游丐业之发达。当时全国各城市都集中着一批乞丐，而上海尤为突出，上海的乞丐来自全国各地，其原因是“贫贱之子谋生于沪而不成，遂至流落行丐”。湖北城镇中有一种乞丐“皆妇孺”组成，她们往往“集云五人，游于市，手持乐器”，其所“背负之囊藏刀刃杂物，于街头巷尾表演”。^⑧这实际是艺丐。北京作为国都，“四方观望，而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残疾，无人收恤废死道路，日日而有”。^⑨

拐骗。这主要是指那些拐卖妇女、儿童，牟取暴利的人。这些人“凡繁华处所皆有之”，特别是在上海，“华洋杂处，水陆交通，若辈遂得来往自由、肆其伎俩”。^⑩他们最常用的方法是以介绍工作为名，将农村妇女骗至城市贩卖。如扬州、苏州、松江、无锡等地的农家女儿以为上海工资“较内地为昂”，心向往之，拐匪则趁机以好言诱之到上海，立即转卖他人。长江各城镇，“自成都、重庆而下，直至黄州”，拐卖骗子“彼此交通”，形成一个贩卖人口的网络。

投身娼妓业。晚清城市中，娼妓业是一个十分兴盛的行业。这个时期，人们靠正当手段谋生的机会日渐减少，加之社会风气日渐败坏，传统

的道德观念受到冲击，人们追求享乐的欲望越来越强，这就为娼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各地城市的娼妓多非土著，而为谋生或自己流落或被他人骗至远离家乡的城镇从事此种行业。兰州的娼妓，“皆为私卖，且十九非土著”。江苏苏州、扬州、清江（今淮阴）一带的女子被掠往外地从事娼妓活动的甚多，“南之间粤，北之辽沈，无不为其殖民之地”。汉口的妓院规模宏大，有苏帮、川帮、湖南帮、江西帮、本帮之别。其中每个妓院合计龟鸨、鸟师、侍役、轿夫等项，“多者至百数十人”。苏州作为传统的商业城市，是东南一大都会。光绪初，该城湖田、平康一带妓院达数百家，^⑪而领风骚之地还要数上海。上海是“富商大贾及各方游手之人群聚州处”之区，“娼寮妓馆，趋风骈集，列屋而居”，其中“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尚不与焉”。^⑫

农村地区以抢劫为目的的游匪大大增加。1840年以来，清政府的统治地位日趋衰弱，各级官员更加腐败，封建秩序陷于紊乱，治安力量明显不足。这就为游匪创造了活动条件。

游匪的主要活动是抢劫、偷盗。其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常常使官兵难以抗拒。游匪的活动范围遍布全国。各地均有横行一方的抢劫集团。其成员主要是当地不事生业的农民、遣散的兵勇，官府追捕的罪犯。

北方地区的游匪形成了多股势力。河南西部“山箐丛密，宛、络之交，尤号盗藪”。光绪时豫中吏治不修，政弊民困，所以“贫者以盗为生，富者奉盗以苟存，白昼剽劫，掳人勒赎”，莫敢谁何。^⑬河南归德郡的游匪最初只是在丰、沛、邳、砀、曹、单等县往来窜扰，后来则分为许多大帮、小帮，“飘忽无常，遍地皆是，几难缕指”。^⑭山东也是游匪势力猖狂之区。该地游匪最初起于郓、巨，盛于荷、曹，南扰归德，东去丰、沛，而东北蔓于兗、沂、泰安诸属，几乎遍及整个山东境内。游匪集团“众或千余人，少则数百人，最下六七十人”，“敢与兵吏抗”。^⑮光绪年间，山东曹州所属十一个州县，几乎“无地无匪，其中不少人是‘曾入军队之逃兵溃勇’，多携带新式快枪，“每遇官兵无不迎拒”。^⑯值得指出，这些地区的游匪与官府、官兵常常是互相利用。近代不少军阀就是游匪出身。

东北是清代中期以后才不断有关内百姓大批

迁入。近代以来，清政府对此地控制放松，日、俄等外国势力于此插手。故而东北有许多“权力真空”地带。这里的游匪显得十分活跃。光绪二十八年御史攀桂指出：东北“盗贼素多，近日愈形炽盛，少则三五结伙，多至千百成群，抢劫行旅，焚掠商民，奸淫妇女，捉人勒赎”。他们“始则抢掠僻村，今则肆及市镇。初仅劫夺富室，渐且搜及贫家”。^②足见游匪的行为危及各阶层的利益。

华南地区的游匪活动也很广泛。光绪年间广东盗风之炽甲于他省，其“小则抢劫勒赎，大则纠党置械”。东江一带，“盗匪充斥，抢劫频闻”。^③广西的游匪是一种综合性群体，其中有一般游民，有土匪，还有各种盟会成员，在粤桂、粤交界地区，“散勇不下万余”。此辈“遣撤无归，大率仍为游匪”。其他土匪“更从而响应”，“大股数千，少亦数百”，故清政府官员惊呼，“南、太、泗、镇各属警报沓来”。^④

东南地区的游匪规模虽比不上上述地区，而分布却很广泛。道光以来，江苏一带“沿江滨海，水陆交冲，五方杂处，匪徒最易托足”。这些游匪来源很多，活动方式各有不同。如上海一带有“闽广游民”，苏松常镇有“土匪棚民”，淮扬徐海有“捻匪盐枭”，跟随漕船的为“水手青皮”，以船为家有“渔户流丐”。这几类人“防范稍疏，每虞滋事”。^⑤光绪十二年八月，江苏巡抚陈夔龙上奏说：“苏有盐枭、会匪，频年到处充斥，蔓延勾结，深为地方隐忧”。火车通行之后，“此辈恃其便利，尤复无处不到，倏往倏来”。^⑥

此外，西北、四川、福建等也是游匪活动较多地区。

晚清社会的游匪给当时民众生活造成很大危害，人们生存的安全感大大降低。有产者则更是如此。而这也是当时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所带来的结果。清末民初人徐珂对广东一带的论述很具典型性，他说：“广东贫富之不均，甚于他省。富者极富，而贫者极贫。贫人既无生计，饥寒亦死，为盗而为官所捕亦死。等是一死，而饥寒重迫，必死无疑。为盗虽犯法，然未必为盗者，人人尽为官所捕。即捕，亦不过一死。是不为盗则死在目前，为盗且可以侥幸不死。既若此，是亦何乐而不为盗也。粤人为盗者之心理盖如此”。^⑦这恐怕是游匪中具有普遍性的心理。而其中的地痞无赖则另当别论。如果说贫富分化是

游匪行为的最初动因的话，那么，官府的腐败，对民众的敲榨则是一种助长剂。

三

晚清游民问题的突出，给社会所带来的危害，使清政府感到不安，他们当然仍象清前期政府那样，继续采取“禁止”、“镇压”的手段。但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步骤，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各地城镇创办工艺局就是其中主要的形式。

清政府也意识到，游民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无业可就，无以谋生。创办工艺局的目的是为游民提供自食其力的条件。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北京地方政府首次开始创办工艺局。收留市区游民。工艺局将收留的对象规定为：（1）身家清白，穷无所归者为上；（2）本有行业，遭难流离者次之；（3）平日懒惰性成，兼有嗜好者又次之；（4）甘心下流，近于邪僻者为下。对于这几类人，工艺局要“一一查明来历籍贯，取有切实保人，登注册簿，方可收留”。此外，“有孤老幼孩，愿来习艺者，亦准取保挂号，挨次传补。衣履不周者，由局制给”。工艺局聘请数十位教习向他们传授技艺，其内容有书画、数算、镌刻、织布、织绒毯、绣花、珐琅、铜铁、瓦木等。“学徒俗例三年为满师”。^⑧然后即可出去自谋职业。

直隶当局也于光绪二十九年创办教养局，“收养贫民，教以工艺”。以后教养局改为实习工场，额定工徒五百人，最多达七八百人。实习工场分十四种科目。先后毕业两千余人。另外，该省还办有劝业铁工厂，广仁堂女工场。省城以外，各属州县所办工艺场、织工厂、艺徒学堂，习艺所有八十余处。^⑨

山东于光绪二十六年由巡抚袁世凯负责于省城设立教养局，专教贫民无业者，学作粗工，另设工艺局，“考求各项精巧工作”。此外，还于曹州、沂州等府以及济州、莒州、峰县、福山潍县等处，各设工艺分局。^⑩

江西光绪二十八年于省城设立工艺院一所，收诸游荡及曾犯轻罪者，“雇派工师，教以工艺”。院中分设三厂，即粗工厂、细工厂、学工厂。粗细工厂收成年人，学工厂则“凡良家之不肖子弟，父兄师友所不能约束者，听其送院，教以浅近书算及精致工艺”，并负责“禁锢不令外出，以收其心，以儆其惰行”。^⑪

① 四川成都光绪三十八年设立四川通省劝工局。内分四厂，工艺厂、副厂、迁善所、养病院。其中副厂“专以收纳贫民、游民，教以寻常可存活之工艺。其宗旨在于教工以养民教之有业，使之不穷不游。”②

贵州于宣统元年设立警务工厂，安插游民。工厂“教令人娴一艺，昼令工作，夜为训导，使他们‘将来出外，可以营生’”。③以此消除游惰之源。

广东、广西、河南、湖北、云南、新疆、热河、吉林、黑龙江、奉天、安徽、甘肃、陕西、浙江、江苏、福建、山西等省都建立了类似的工厂。

上述工艺厂（局）的开办既安置了一部分游民，解决了其生计困难，又创造了一定的社会价值。山东省城工艺局开办数年，规模粗具。该局所出货品如丝绣绒毡等类，“遐迩传播”。四川德阳由无业青少年和犯罪应释人员所组成的工艺局生产绢扇、手帕、鞋布等货，“均能畅销，尚有作不敷售之势”。④江苏苏州工艺局专收十六岁以上无业贫民，教以手艺如织毯、造鞋、木工等，“出品渐优，成绩大著”。不过，按照清政府的要求，这些官办工艺局，“意在养民，不同谋利”；“使工有所劝，民有所归”。⑤

这些措施固然不错，然而能被工艺局收养者只是众多游民中的极少数。一般工厂只有几十名，多者一二百名；教养局一期多者上百，少者几十。并且主要设置于城镇地区。这对于庞大的游民队伍来说可谓杯水车薪，或者可望而不可及。然而，清政府采取的这一措施，其进步意义是不能否认的。

① 《清宣宗实录》卷261。

②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3。

③ 《清圣宗实录》卷118。

④⑤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4，卷41。

- ⑤⑥ 朱寿朋：《京华续录》光绪190。
- ⑥ 徐继畲：《徐先生全集》奏疏卷下。
- ⑦ 《皖志便览》卷2。
- ⑧ 《苏州市情》1900年。
- ⑨ 《申报》1879年1月15日。
- ⑩⑪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
- ⑪ 《刘坤一选集》2794页。
- ⑫ 魏声龢：《鸡林旧闻录》。
- ⑬ 贺长龄辑《江苏海运全案》卷1。
- ⑭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944页。
- ⑮⑯⑰⑱⑲⑳ 《清稗类钞》，盗贼类，乞丐类，拐骗类，娼妓类。
- ⑲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
- ⑳ 陈子庄：《庸闲斋笔记》。
- ㉑ 宣统三年闰六月，军机处原折。
- ㉒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军机处原折。
- ㉓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军机处录付奏折。
- ㉔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军机处原折。
- ㉕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宫中未批奏折。
- ㉖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付奏折。
- ㉗ 李桓：《宝书斋类稿》卷91。
- ㉘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付奏折。
- ㉙ 孙多森：《直隶实业汇编》卷六。
- ㉚㉛ 《光绪政要钞本》实业三、六。
- ㉜ 《清续文献通考》卷384。
- ㉝ 光绪《德阳县续志》卷2。
- ㉞ 光绪二十七年上谕，转见陈璧《望富堂奏稿》卷3。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中国人口科学》编辑部

责任编辑：凌 峰

秦三十六郡考

严 宾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三十六郡。秦三十六郡之名，首有《汉书·地理志》列于前，继有《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述于后，两说当中，有三十三郡名称是相同的，唯有桂林郡、象郡、南海郡各执己见。前者以为秦并天下，南服百越，于其地置桂林、象郡、南海，此三郡皆在三十六郡之数。后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以为秦击百越并置上述三郡均在秦始皇三十三年，而秦三十六郡之设是秦始皇二十六年事，故三郡不属三十六郡之列。自此以后，歧说日多，争执颇剧，迄无定论。察班固与裴骃两人之说分歧的根源，完全在于秦击百越究属何年的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有关秦三十六郡的争论便可迎刃而解。

秦南击百越，实有前后两次。第一次大约在秦始皇二十五年。这个问题，首先可以从文献记载直接查知。《史记·王翦列传》说，王翦“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史记》不少篇章均记秦灭楚国在始皇二十四年，南击百越自当在此年之后。《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据《史记·越世家》，楚威王时楚国已经大败东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秦所置会稽郡当在楚国所取故吴地。秦“降越君”必继灭楚之后，这个越君大约就是东越之君。《史记·南越列传》说秦有杨越之地，“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集解》引徐广说：“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岁。”从秦二世元年上推十三年，为秦始皇二十六年。秦以此年徙谪戍越，南取越地当在此前。西汉人说：“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行十馀年，秦皇帝崩”。秦始皇崩于即位后的三十七年，其前“十馀年”也应为始皇二十五年。其次，从秦地的南部边界亦可考定。《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地“南至北向户”，又载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台刻石说，秦地“南至北户”，北向户即北户。北户在南方甚远的地方，《淮南子·时则》说“南方之极，自北户”。该地所以名为北户，《集解》引《吴都赋》以为“开北户以向日”。《汉书·地理志》说汉日南郡，为“故秦象郡”。颜师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尔雅·释地》又称北户为“回荒”之一，“荒”即荒服。《尚书·禹贡》说荒服之地“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可知北户是蛮人居地，此蛮殆即南越。秦始皇二十六年已有北户，秦击南越应为此年之前的事情。

秦第一次南击百越的主将是王翦。他率秦军首先攻击东越，并迅速取得了完全胜

利。《史记·东越列传》说，“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秦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闽中原为闽人所居地区。《周礼·职方氏》有“七闽”之说，据郑玄注，“七闽”就是周王朝降服的七个闽人国家。可见闽人分散的地区是很广的。《山海经·海内南经》说，“闽在海中，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海中之闽只能是闽人的一部分。据《山海经·海内东经》，这个位于闽西北海中的山名为三天子都山。《山海经·海内经》说，三天子都山在“南海之内”，是闽人居住的地区延及南海。秦闽中郡的南部当也与南海为邻。王翦之军征服东越后，接着又征南越，南越慑于秦之声威，也迅速降服。贾谊《过秦论》说，秦“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此言“百越”实指南越，以秦服南越后仅置两郡；唐代张铣注《文选·过秦论》，即持此种见解。另据《汉书》《两越传》、《高帝纪》，汉高祖五年封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地；十一年封赵佗为南越王，王桂林、象郡、南海；十二年又以“南武侯织亦越之世也”，封为南海王。织所王南海，即自南越分割出的南海郡；吕后临朝时，赵佗曾斥责长沙王欲击灭南越与“南海”并王之。南海王织本属闽越，见《汉书·严助传》。汉以闽越后裔王南海，盖因南海郡的领土至少有一部分故属闽越。这样看来，秦征服南越后，很可能仅在其地设置了桂林、象郡。这两郡的辖境虽不可详考，但当初一定相当广阔，这由汉灭南越而置九郡可以略见。《山海经·海内南经》说，“桂林、八树，在番禺东”。清郝懿行认为，此桂林就是《逸周书·王会解》中的“桂国”。朱佑曾《逸周书校释》引王念孙说，“《山海经》说桂林、八树在番禺东，秦取之为桂林郡”。可见桂林郡的领域向东已逾番禺。

秦第二次南击百越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汉书·地理志》说，越地“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一反”。秦残酷地统治越人，不断引起越人的武装反抗，这是秦人再次出击越人的直接原因。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发诸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所谓“陆梁”，《正义》以为指“岭南之人”，这是对的，但其谓“其性强梁”，于义犹有未尽者。史言“陆梁”，不少时候是专指反叛暴乱行为的。例如《后汉书·西羌传》说羌戍之患，“揭木为兵，陆梁三辅”。《三国志·魏高贵乡公纪》说蜀将姜维攻魏狄道，魏主诏曰“蜀贼陆梁边陲”。秦时岭南“陆梁”，实际也是指越人造反。《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说，此年秦派“五十万人守五岭”。《淮南子·人间》说，秦“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馀干之水”。高诱注曰，“镡城在武陵西南，九疑在零陵，番禺在南海，南野在豫章，馀干在豫章”。由这种军事布置可以看出前三支军队是用以攻防南越的，后两支军队是为了攻防东越的。

这次秦击百越取得胜利后，如何治理东越成了突出问题。因为，据《汉书·东越列传》说：“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此地的越人变乱无常，为敌为友实难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发兵征伐是困难的。《汉书·严助传》说得十分明白：“欲屠灭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年经年，则士卒疲倦，食粮乏绝。”其地多山岭丛林险谷恶水，又多蝮蛇怪兽湿热疾病，道路难通，进军不便。因此，

秦对东越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这就是废除闽中郡，将其北部领地划入会稽郡。例如《汉书·地理志》会稽郡的治县，颜师古即注曰“本闽越地”，闽越地即闽中郡地，这说明会稽郡的领域确向南方有所扩张。会稽郡最初向南扩张当在秦时，汉时此郡的版图只是恢复了秦代的旧貌而已。这时闽中郡的南部领地与桂林郡东部土地，合并起来置为南海郡。《御览》卷172引《唐十道志》说：“潮州，亦古闽越地，秦属南海郡”。《史记·南越列传》已言，南海郡治番禺。这时桂林郡与象郡虽然名称依旧，但其地理范围与边界位置必皆有所改变，只是今天已难详考了。

根据以上的考索，结合《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我们对秦代所设之郡便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秦始皇二十六年所置三十六郡，为河东、太原、上党、三川、东郡、颍川、南阳、南郡、九江、泗水、钜鹿、齐郡、琅邪、会稽、汉中、蜀郡、巴郡、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邯郸、碣郡、薛郡、长沙、桂林、象郡、闽中。到秦始皇三十三年，秦仍为三十六郡，其中唯有闽中郡被废除，更立南海郡，其馀诸郡名皆无变更。直至秦代灭亡，这三十六郡无论在数量或名称方面，均未再发生改变。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科院历史所

责任编辑：凌 峰

（上接第117页）

综上所述，教育市场有赖于计划和政策干预才能进入有序状态。无论教育运行的投入、生产、产出各环节均需计划干预。即使可以由价格调节供求的专门教育，其价格信号的传递也会由于教育具有长期性而对教育计划有促进的作用。一般教育更不待言。需要强调的是，干预不是统制，而是通过教育计划，去调节教育运行中市场所无法（或具有盲目性）调节的那些方面。而且，这里的教育计划是依据有序的完整的信息结构制定的，其功能是通过市场并与之相辅相成，促进教育系统结构功能的有序化。

-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第108—109页。
②④亚·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页、103页。
③⑤Mark Blaug“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1980, P.109, 123.

作者单位：华南师大教科所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中国的感生神话

蒙 梓

感生神话，或称贞洁受孕神话，图腾受孕传说，或孕育图腾主义。它是关于人类始祖诞生的一种神话类型，一般包括了这样的情节结构：某女（通常为处女）身体接触或感受到某物、或者意念涉及到某物而受孕，然后产生出人类的始祖，该女性则为人类始祖之母。

感生神话通常的结构要件有：（1）始祖之母；（2）感生物（或图腾）；（3）始祖；（4）感生地（可能成为最早的“社地”，成为最早的祭祀祖先、加入图腾、保存图腾的地方）。

在这些要件当中，“始祖之母”与其说是为母亲的人，还不如说是传人的文化英雄，即人神兼半的“假定的女性始祖”，①往往仅仅作为概念存在，意在表明“最早的人从这里开始”，而关于她的身世却多半只字不提或没有着重强调。“始祖”在最原始的神话中指最初的人类，而不是仅指本氏族的祖先。追溯不同于别的民族祖先起源的关于本民族始祖由来的神话应该是在“最早的人类”和“祖先”这两个概念分离之后，人为地崇拜其祖，仿神话附会其事的始祖传说的出现则又更在其后了。

下面，拟从“感生物”的角度，联系古代生命信仰，对我国主要的感生神话进行分类评述。

（一）植物和动物

1. 沙壺（壺）触沉木感生九隆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壺，居于牢山，常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

龙、出水上。沙壺忽闻龙语曰：“若为我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

《华阳国志·南中志》：一妇人名曰沙壺，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谓沙壺曰：“君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唯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舐而舐之。沙壺与言语。以龙陪坐，因名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壺收元龙居九龙山下。元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黠而有智，无所贵也。”共推为王。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

这是一则盛传于我国西南地区彝、傣、白等民族的感生神话。感木而生的观念当源于对植物有灵的崇拜。最早的人类生活在山林之间，植物是他们生活资源的主要来源。茂密的草木、丰硕的果实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力，他们崇敬这些超人的力量，并且相信通过某种方式的接触，这些力量也会传递到人的身上。植物与人的这种关系亦在古代或现代的一些民族的宗教仪式中体现出来。云南纳西族在祭天大典上，无论是在什么地区、祭祀何种天体，都必须用几种树木作祭木，象征地祇。去祭坛的路上和祭坛上都要撒上树叶——青松针叶。对草木的崇信同他们生存和繁衍的祈求是一脉相承的：“一株翠柏生了

个枝丫，我们的福泽连贯千年；一棵银柏生百个枝丫，我们的福泽贯穿百年。”②事实上，感植物生民的神话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是存在的，并且，一般产生的时代要早于其它几种神话。

2. 女子感大竹于水滨得竹王

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载：有竹王者，生于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材武，遂雄夷狄，氏以竹为姓。

严格地说，这个神话的竹王不是女子所生，而是直接从竹中出来的，女子只是间接扮演了母亲的角色。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感生神话雏形或处于物生神话和感生神话之间的一种中间形态。

3. 女嬉（修己）吞薏苡感生禹

《吴越春秋》：“鲧娶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孕，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娠，剖胁而产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

禹母感生禹的神话的异文较多，有感流星生的，有吞月精生的，还有吞石珠生的，等等。此处禹母吞的薏苡当是指薏苡的果实薏米。吞食植物果实就能生子的观念直到今天还在民俗中残存着，民间婚娶常用“花生”、“栗子”、“枣子”撒帐，寄托人们良好的祝愿。

4. 简狄感玄鸟卵生契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郑笺：“谓孰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为尧司徒，有功，封商。”

《诗经·商颂·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郑笺：“有女简狄，吞孰卵而生契，尧封之于商。后汤王因以为天下号，故云帝立子生商。”

故玄鸟、孰同物异名，皆指燕子。这是一则感燕生民的神话。

玄鸟生商的神话散见古籍，说法繁多，似乎最初并非感生神话，而是卵生神话。

5. 女修感玄鸟卵生大业

《史记·秦本纪》：“秦之先，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秦起于西戎，这则神话却与玄鸟生商的神话惊人地相似，究竟是独立发生还是流传变异的结果，尚待进一步考证。不过据《秦本纪正义》所言，女修之子大业即是皋陶，《白虎通》谓：“皋陶鸟喙”，此是可推断秦之先民与鸟有不寻常的关系，很可能曾以鸟为图腾或崇拜物。据胡厚宣先生考证，大约在秦汉前后，中原地区有过盛况空前的

崇鸟习俗。③范文澜先生则认为“东方诸族”流行过卵生神话。④

感鸟生人的神话在少数民族中也屡见不鲜。

6. 蒲莫列衣感龙鹰血生支格阿龙

《勒俄特衣》（彝族）：“蒲莫列衣／要去看神鹰／要去玩龙鹰／龙鹰掉下三滴血／落在蒲莫列衣身上／一滴中头上，发辫穿九层／一滴中腰间，毡衣穿九层／一滴中下部，裙褶穿九层。……／毕摩来到主人家／念过生育经／蒲莫列衣啊／早晨起白雾／下午生阿龙。”

7. 佛库伦感神鹊红果生布库里雍顺

《满文老档》载：传说布尔和里池有三个女子恩古伦、曾古伦、佛库伦来沐浴，最后的女子获得神鹊衔来的果实，含在嘴中进入咽喉就怀孕了，生下布库里雍顺。⑤

满族人自称长白天女的后裔，清朝统治者则说布库里雍顺是爱新觉罗氏的始祖。这与简狄生契和女修生大业的神话极相似，看来，东北部地区同中原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民族渊源和文化联系。

我国南方的古代百越先民当中也盛行过崇鸟习俗。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实物中，有大量鸟粪骨骼，而且还发现众多的雕刻有鸟形图案的珍贵工艺品。广东、广西等地的铜器纹饰常有一组组头戴羽毛的“羽人划船图”。1981年更在绍兴的战国墓中发掘出一鸟图腾柱，这与晋代干宝《搜神记》的记载（“越地深山中有鸟，大如鸠，青色，名曰治鸟……越人谓此鸟是越祝之祖也。”）不谋而合，说明当时鸟崇拜已经有了始祖崇拜的涵义，可推断有关于始祖与鸟的关系的神话存在。直到近代，古越人的后裔台湾的高山族仍传说一种叫“西稀利”的小鸟是他们祖先附托的神物。⑥可见，把人的由来同飞禽相联系是一种很普遍的观念，但感鸟而生的神话的发生却可能是多元的。

8. 安登感神龙首生神农

《春秋元命苞》：“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于常羊，生神子，人面龙颜，是谓神龙。”

《帝王世纪》：“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

《史记集解》班固曰：炎帝“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神农即农神，同“有巢氏”、“燧人氏”

一样，是一种农业文化的代表。考古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的农业就相当发达，可以断定农业神的出现不会太晚，但是史籍对农神信仰的记载却相当晚近，而且杂糅了很多阴阳五行观念，呈现出古史化的倾向。

龙的形象是由动物自然崇拜向拟人形态的社会神过渡的中间形态，它源于初民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最初，动物引起人们羡慕和崇拜的是其外形、能力和作用，即动物的自然属性，后来随着敬畏情感的积累和综合能力的提高，神话中才呈现出几种动物拼凑而成的动物神，其动机无非是希望通过人与其创造的对象的某种联系，使自己也具有这些神性或获得这种动物神的福祐。当人们崇拜的不再只是动物神的自然属性而更多的是它的想象的社会性功能时，它就成了拟人化的社会神了。龙的过渡性特征就体现在：一方面它在局部形态上保持动物的自然特征，另方面它与人的社会性活动关系更加密切了。从司母戊方鼎上镌刻的古朴龙形可知，殷商时龙就开始在宗教祭祀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至汉代更出现了大量的“人面蛇身”或“人身而龙首”的始祖形象。龙的神性增添了人间的神圣色彩，龙的形象代表着神力和祥瑞，而身世与龙相系的人则是受天命者的化身。所以，古之帝王常或以龙来渲染其先祖身世的显赫和神奇，或以“真龙天子”自命，以宣扬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9. 邹屠氏女履神龟生禹及陌益等八人

《路史后记》：“初帝僇蚩尤，迁其民善者于邹屠，恶者于有北。邹屠氏有女履龟不践，帝内之，是生禹祖及梦八人。”

蚩尤即蚩尤，龟足蛇首。联系大禹治水的神话观之，禹祖似应同龟鳖类有关系，因为按“图腾社会的习惯，仅有水族动物图腾的人才能治水”，^⑦且禹父鲧亦是三足鳌。龟不仅是“四灵”之一，而且是四灵中唯一实在的动物，因此龟被视作神物似应早于龙、凤、麟。从殷墟的大量龟甲可以推断，龟同原始先民的生活有过密切关系。龟类动物长寿和多卵，生命力极强，因而被神化为天地的神灵。神龟又称“天鼋”，鼋同鳌与龟同类。我国古代崇拜的龟常见的是为蛇缠绕的神龟，称玄武，可能是“龟足蛇首”的蚩尤的变形。《楚辞·远游》：“召玄武而奔属。”洪兴祖注：“玄武为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后汉书五梁传》：“玄武，水神之名。”李贤注：“玄武，北方

之神，龟蛇合体。”龟蛇合体还有“交合”的含义，如同伏羲女娲交尾，因此神龟亦有生殖神的意义。商周铭文“天鼋”作龜，象人龟相合之势。郭沫若先生认为，黄帝的号“轩辕”即“天鼋”的音转，天鼋可能是黄帝族的图腾。^⑧《路史后记·杜宇鳖令》中亦提到一个来自长江下游以鳖为图腾的部落被一个以杜鹃鸟为图腾的氏族所迫的故事。颛顼也以龟蛇为图腾，^⑨《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偏枯之鱼即龟鳖类，为蛇所化，即玄武，称之为鱼妇，尊之为母也，谓颛顼死后灵魂返归图腾祖先，然后获得新生。

10. 扶始睹白虎感生皋陶

《春秋元命苞》：“尧为天子，季秋下旬，梦白虎送马啄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丘，睹白虎，上有云，感而生皋陶。”从考古资料看，古代中国曾有过广泛而繁盛的虎崇拜。1987年辽宁丹东后窑发现六、七千年前的大量动物形、植物形艺术品，其中人兽合一的玉器虎头佩饰有同商代虎头纹相似的基本轮廓。同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了六千年前的原始墓葬，中有用蚌壳镶嵌而成的虎和龙各一条，位于死者的左右，虎左龙右。西周、春秋时期都有贵左的习惯，可见是以虎为尊。在我国西部，在四千余年前的甘肃半山文化发现的彩陶人头壶盖也有虎形、虎耳和虎皮斑纹。在南方和西南的湖南、四川等地也出土过多种虎纹铜器。

虎崇拜的痕迹也从古籍中的神话传说和民间宗教崇拜中表现出来。我国最有名的女性神西王母（王母娘娘）的原形是虎豹类。^⑩在我国西部的陕、甘、青一带，历史上可能有过一支很强大的崇虎部落或氏族。据史书记载，周时青海东部的湟中羌人就是以虎为图腾的。西王母当是西方崇虎部族的图腾形象或部落首领，其形态和性别，尚保持了较原始的形式。古羌人的后裔纳西族至今还有崇虎的习俗，他们供奉“也丁喇木”和“格姆女神”（意为“西番地上的女神或母虎”）。古羌人的后裔彝族则供奉“西凤圣母”（“西摩”），意为母虎，是女祭司的称谓，与“穆天子传”中对西王母部的地域和部属称谓相同。云南哀牢山南涧县祭十二兽山神庙时，女祭司西摩头戴虎头面具，腰系虎尾，学神啸，率十一个系虎尾的男女巫师跳舞，^⑪俨然一个西王母的形象。《史记·

五帝本纪》载，黄帝与蚩尤和炎帝分别作战，教熊、罴、虎等六种野兽参加战斗，实际上也就是黄帝率领包括虎部族在内的六个图腾集团征战。黄帝原是北方戎狄人的祖先，^⑫可见北方也有虎崇拜。

西王母的形象是“人身虎首”、“白首善啸”的“白虎”。故白虎被尊为神虎，瑞兽。古时候许多珍禽异兽神皆从白色，如白马、白犬、白鸟、白泽、白狼、白鹤、白蛇、白猿、白鹿、白犀、白雉等等。^⑬白色象征神奇，并代表西方。《说文解字》：白，“西方色也”；《周礼·冬官·考工记》：绘画之事，“西方谓之白”；又《礼记·檀弓》：“殷人尚白”。故白虎又有西方神虎之意，扶始所见的白虎可能就是“西王母邦”的图腾。尚白的风俗随着西部羌戎的东渐而传入中原和东方。帝尧世系的混乱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反映。

（二）自然天象

11. 帝喾之妃梦吞日生八子

《拾遗记》卷一：“帝喾之妃，邹屠氏之女也，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其恶者于有北之乡。女行不践地，常履风云，游于伊洛，帝乃期焉，纳以为妃。妃常梦吞日，则生一子，凡经八梦，则生八子。”

据郭沫若、袁珂先生考证，帝喾即帝俊或帝矣，为东方殷民族所祀奉的上帝，鸟头人身，亦是东方崇鸟民族的图腾。在东部地区的神话中，太阳与鸟有不解之缘：“日中有三足鸟”；（《论衡·说月》）“日中有踶鸟。”（《淮南子·精神训》）高诱注：“踶尤蹲也，即三足鸟。”“日中有三足鸟，鸟者阳精。”（《春秋元命苞》）踶鸟俨然是太阳的化身，故又称阳鸟、金乌，可见帝俊一族崇鸟也崇日。踶鸟与太阳一体，这可能是一种较原始的神话观念。

羲和为帝俊妻，一说太阳为羲和（或常仪、常羲）所生，《山海经·大荒西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故太阳为帝俊族的图腾，帝喾妃梦吞日即是感图腾，通过接触律而受孕生下八子。这是一则典型的“图腾孕育”神话。

12. 索离国王侍儿感日影生东明（朱蒙）

《后汉书·夫馀传》：“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侍儿于后身妊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

不死。复徙于马栏，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虽然东明（朱蒙）诞生的神话已有很浓的传说色彩，但从它所属的部族来看，可以确定是一个崇日的东夷集团的族源神话。

朱蒙诞生后的经历同由姜嫄“履帝武敏”生下的后稷的经过相似，同中原的周族或许有某种渊源关系。据殷墟甲骨卜辞和古文献材料可以肯定，中原地区的太阳神崇拜早在夏朝就存在，并一直延续到商周。^⑭南方的楚国则奉祀人神化了的太阳神“东君”或“东皇太一”。

13. 修己吞月精生夏禹

《太平御览》卷四引《通甲开山图荣氏解》：“女狄暮汲水于石纽山下大祠前水中，得月精如鸡子，爱而食之，不觉而吞，遂有身，十四月而生夏禹。”

女狄为大禹的母亲，亦作“女志”，“女嬉”，“修己”。禹母感生大禹的神话很多，或说吞薏苡而生（《礼纬》），或说吞石子而生（《绎史》引《通甲开山图》），或说感流星而生（《尚书》）；这里说吞月精而生，似为一个原型的演变。

“月精”的释义较多：

（1）月精即嫦娥。《文选·祭颜光禄文》注引《归藏》：“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

（2）月精即蟾蜍。“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⑮

（3）月精为白兔。“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王逸注：“夜光，月也；言月何德于天，死而复生也。”^⑯“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腹而顾望乎。菟一作兔。”^⑰

但是，这三种释义很难同女狄感生禹的神话联系起来：嫦娥为人神，食一大活人不近情理；蟾蜍这样形貌的生物亦很难被“不觉而吞”；白兔也同理。“月精”似应另有解释。

“月，阙也，大阴之精”。（《说文》）而“玉者，阴之阴也。”（《管子·侈靡篇》）美玉和明月纯美润泽给人以感官上的同感而引起联想。^⑱因此，女狄所吞的月精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恰恰是一颗皎洁似月，大如鸡子的石子或美玉。（下文另一则大禹降生的神话，可以作为旁证。）

14. 女节意感大星生朱宣

《河图握矩记》：“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而生朱宣。”

15. 女枢感瑶光生顓

《诗含神雾》：“乾荒取蜀山氏回枢，是为河女，所谓淖子也。淖子感瑶光于幽阴而生顓顼。”

《河图握矩记》：“瑶光之星如虹贯月，正向，感女枢于幽阴之宫，生黑帝顓顼。”

16. 修己感星生姒

《尚书帝命验》：“禹，白帝精，以星感。修己山行，见流星贯昴，意粟然，生姒，戎文命禹。”

星辰崇拜也是一种古老的原始宗教，这种崇拜虽然不像日月崇拜那样重要和普遍，产生的年代也更晚近，但是星星的变幻莫测及其运动轨迹对原始人来说仍然是神秘的。星辰崇拜的内容之一就是把人的生命同星体的存在和消失联系起来。《书·洪范》中的“庶民惟星”，就是说一颗星代表一个人。当这种信仰同灵魂永存，生命不朽的“死亡—复活”观念相联系时，就会产生始祖转世或“图腾受孕”的神话。流星陨落，既是旧生命的结束，也是新生命的诞生。上面三个感星生子的神话都体现了这样的思想。但是从“白帝”、“黑帝”、“白帝精”这些称谓看，这些神话已经染上较浓的“五行”色彩。

17. 附宝见大电绕星生黄帝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母曰附宝，之郊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

黄帝最早的形象是与雷电有关的大神，“以雷精起”，感大电生，掌行雷播雨之职。黄帝原先可能不是个体的人名，而是一个崇雷电的部族名称。《山海经·大荒经》记载“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生牡牝，是为犬戎，肉食”；“黄帝有天下，号有熊”；^⑩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貔、貅、虎为前驱，雕、鹖、鷦、鷯为旗帜。”^⑪可见黄帝族亦崇兽，而且还是许多兽图腾部族的首领。

黄帝族崇拜的雷电和猛兽很可能原是同一物，源于同一种观念。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雷电之神的形象虽然各不相同，但大都是一种凶猛、怪异的动物形象，《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而震。”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二：“霹雳头似猕猴”。唐房千里《投荒杂录》：“雷公豕首麟身。”李肇《唐国史补》亦谓雷公“状类彘”。元《王教搜神大全》谓雷为“鸡形”，“妖其头，啄其嘴，翼其两肩，左尖右锐，足踏五鼓而升，天帝封之为雷门荀元帅。”《淮南子·地形

训》：“雷泽有神，龙身人头，鼓其腹而震。”黄帝与雷神同为龙体，象闪电之状。

18. 撼登见大虹意感而生禹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瞽叟姓姚，妻曰嫫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

19. 神母感青虹生庖羲

《拾遗记》：“春皇者庖羲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州。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妊。历十二年而生庖羲。”

“虹”又称“蜺蜺”、“蠛蠛”、“蝃蝃”，李圃在《甲骨文选读·自序》中认为，能够上天入水者非龙莫属，虹字象二龙头吸水状。虹或许是龙的原形之一。《字汇补》：“宛虹，龙也。”虹有阴阳性别之分，雄为虹，雌为蜺。虹霓冬隐春现的特征同古人的季节性生理变化和社交活动是一致的，如民间的“春社”或“社会”，^⑫除了祭祖、娱乐、交易之外，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于古代婚姻制度的回忆和庆祝”。《周礼·地官》载：“以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诗·漆沮》也描述过郑国漆洧水畔青年男女谐谑调情的欢快场面。在这种欢乐愉悦的时候，人们不可能忽视适时出现的点缀节日气氛的绚丽的虹霓，因此，彩虹又成了性结合的标志和婚姻的象征。

20. 伏羲因风而生

《三坟》：“伏羲氏，燧人子也，因风而生，故曰风性。”

有关伏羲降生的神话很多，因风而生的记载却不多见。这与禹母吞薏苡而生禹，禹故姒姓；简狄吞乙子而生契，契故子姓；夜郎王生于竹，故竹姓一样，是与图腾有关的氏族祖先诞生的神话。因风而获生命是原始的宗教观念。《五运历年记》说，盘古垂死化身时“身之诸虫，因风而生，化为黎甿”。许多古代民族把风或气息视为灵魂的载体或灵魂本身，而灵魂又是永生不朽的，还可以托生转世，开始新的生命。在“造物主造人”一类神话中，常有这样的情节：造物主塑造出人的胚样之后，对它吹一口气（或吹来一阵风），人便有了生命。因而许多民族也都有因风而受孕的神话。在中国古代，风又被当成鸟的化身，风神亦即凤鸟，在甲骨文中“凤”、“凤”通用。《禽经》则说：“凤禽，鸾类。越人谓之风伯。飞翔则天大风。”由此看来，伏羲也许是因神鸟而生。神话同源异流。殷商宗祀帝喾，亦称帝俊。“俊”为东方来风之名。^⑬俊本作“衆”，象鸟头人

身之形，且与五采之鸟为友，帝俊似为鸟神，故其次妃简狄吞玄鸟卵生契，即因图腾受孕。在有些古籍中，伏羲与大皞合二为一，变成风姓四国的祖神，成了东方之帝。^②结合东方部族崇鸟的习俗可推断这个神话与玄鸟生商的神话同出一源。

21. 华胥履巨人迹生伏羲

《帝王世纪》：“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蛇人首。”

22. 陈丰氏履大迹生帝喾

《路史后纪》：“文侨极，娶陈丰氏回夏，履大迹而生帝喾，方喾之生，握裒莫觉，生而神异，自言其名，遂以名。”

23. 姜嫄履帝武敏生弃

《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日，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诞寔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寔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寔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从文字记载观之，周祖弃诞生的传说同帝喾神话显然有族源关系。喾（俊）为陈丰氏践巨人足迹而生，姜嫄是喾之元妃，因此，喾之子后稷因本氏族图腾而神降是顺理成章的。如袁珂先生所言，帝喾本生日月之天神，历史化后，遂为下方人五，至殷周时代成了周人的第一祖先，配享最高礼祭。^②伏羲与帝喾属于东方两个关系极密切的部族，它们在信仰上有诸多相似。伏羲又称大皞、太皞、大昊，据《帝王世纪》，太昊帝也就是太阳神，同帝俊族一样，伏羲族也有崇日的信仰，它们在族源信仰上相似是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感生神话的感生圣地和感生灵物——“雷泽”、“扶桑”和“大（巨）人迹”或“大迹”。关于巨人迹和雷泽，《孝经钩命诀》写道：“华胥履迹怪生羲皇。”注：“灵威仰之迹也。”《广雅疏证》：“苍曰灵威仰。”《河图》：“苍帝神名灵威仰。”苍帝疑指苍龙。苍龙为古代“四灵”之一，方位配以东，伏羲亦名“苍帝”，“东方之帝”。^②又“大迹出于雷泽”，《山海经·海内东经》曰：“雷泽中有雷神，……在吴西。”清吴承志《山海经地

理今释》卷六云：“雷泽即震泽。”袁珂按震泽即今太湖，位东。由是推出雷泽中的大足应为雷神遗迹，伏羲为雷图腾部族的后裔，雷泽为该族的社地。至于扶桑，则是中国古代有名的神木，亦被称作空（穹）桑，榑桑，扶木，蟠木，若木。《十洲记》：“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万里……地多林木，叶皆如桑。”后由树名变为地名。因太阳每天从茂密的桑树中升起，其中高而大者便被视作神木而受崇拜。这个观念再赋予生命的意义，人的祖先的生命便被认为从这里开始。《吕氏春秋·本末》就有伊尹生于空桑的神话：“侁诜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浮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固化为空桑，故命之伊尹。”屈原《天问》也提到这则神话。可见伊尹生空桑的神话在春秋以前就成形了，且有莘为殷汤之妾。“伊尹”象“殷”字的拆读，《水经·伊水注》认为命曰伊尹，是蒙“殷以为尹”。故伊尹为殷汤后裔，其降生的空桑之地为殷族祭奠先祖的社地。

又“殷人禘喾而郊冥”，以太阳神帝喾（俊）为其始祖。因而空桑之地即帝喾显灵的地方。据王国维和郭沫若先生考证，甲骨文中的“夔”即帝俊。由此观之，桑林中的大迹当是这“一足”之夔龙的杰作。但帝喾尚未诞生，陈丰氏生帝喾所感的“大迹”从何而来？从原始社会灵魂观念的演变来看，把“大迹”假定为夔或帝喾的足迹却并非没有道理。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灵魂是不朽的，可附着于他物而重新出现。用列维·布留尔的话来说，在原始人看来，“生理上的出世只是祖先的返回，因此在有些原始民族中新生婴儿也会受到祖先一般的待遇。”

以上对23个感生神话的分析表明，中国正史中夏商以前成世系的帝王大都有“感天而降”的神奇历史，从这些神话的“感生物”的复杂性和与生命关联的普遍性来看，这些始祖神话可能原来归属不同的原始部族，感生物或许就是各个部族的图腾。神话产生的时间和地域不尽相同，不能排除一个部族有多个感生神话的可能性，但是神话排列的顺序应有别于正史的单线嬗替却是肯定无疑的。

〔附表〕中国的感生神话母题结构

	始祖	始祖母	感生物	感生地	资料出处
1	九隆	沙壘(壹)	沉木	水中	《后汉书》 《华阳国志》
2	竹王	一女子	大竹	水滨	《华阳国志》
3	禹	女嬉	薏苡	砥山	《吴越春秋》
4	契	简狄	玄鸟卵		《诗经》
5	大业	女修	玄鸟卵		《史记》
6	阿龙	蒲莫列衣	龙鹰血		《勒俄特衣》
7	布库里 雍顺	佛库伦	神鵠	布尔和里池	《满文老档》
8	神农	安登	神龙首		《春秋元命苞》
9	禹	邹屠氏	神龟		《路史后记》
10	皋陶	扶始	白虎	高丘	《春秋元命苞》
11	帝喾子	邹屠氏之女	日		《拾遗记》
12	东明	索离国王侍儿	日		《后汉书》
13	禹	修己	月精	石纽山泉水	《遁甲开山图》
14	朱宣	女节	大星		《河图握矩记》
15	颛顼	女枢	瑶光	幽防	《诗含神雾》
16	禹	修己	流星		《尚书》
17	黄帝	附宝	大电	郊野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18	舜	握登	大虹	姚墟	《史记》
19	庖羲	神母	青虹	华胥之洲	《拾遗记》
20	伏羲		风		《三坟》
21	伏羲	华胥	巨人迹	雷泽	《帝王世纪》
22	帝	陈丰氏	大迹		《路史后记》
23	后稷	姜嫄	武敏	扶桑	《诗经》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下), 第341页。

② 《祭天古歌·放生篇》。

③ 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 《甲骨文商图腾的遗迹》(《历史论坛》第一辑)。

④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06页。

⑤ 转引自《民间文学论坛》第5期。

⑥ 参见林嘉文《越人崇鸟源流考》(《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6期)。

⑦ 杨堃《关于神话学和民族学的几个问题》(《民间文艺文丛》第27页)。

⑧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54年重印本第4页。

⑨ 《蜀国春秋》:“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景嫫, 生乾荒。乾荒娶蜀山氏女曰枢, 生颛顼。”可见颛

- 项崇龟同蜀王整令有渊源关系。
- ⑩ 见《山海经·西山经》。
- ⑪ 参见曹振峰《中国的虎文化》(台湾《汉声》杂志)。
- ⑫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第8章。
- ⑬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第131、133页。
- ⑭ 参见《殷契粹编》第354、355页和《礼记·祭义》。
- ⑮ 《初学记》卷11引《淮南子》。
- ⑯ 《楚辞章句·天问》。
- ⑰ 闻一多《天问释天》。
- ⑱ 如李贺咏月句：“玉轮轧露湿团光”(《梦天》)，“晓月当帘挂玉弓”(《南园十三首之六》)。
- ⑲ 《白虎通·号》。
- ⑳ 《列子·黄帝》。
- ㉑ 古代亦称之为“桑林云梦”之会。今壮族的“歌墟”，瑶族的“要歌墟”，布依族的“赶表”，苗族的“游方”，侗族的“玩寨”、“玩山”，傣族的“串姑娘”等，也是这类习俗的遗风。
- ㉒ 《山海经·大荒东经》：“日月所出，名曰析母，东方曰析，来风曰俊。”
- ㉓ 如《路史后记》：“大皞伏羲氏，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尝暨叔姬翔于渚之汾，巨迹出焉，华胥决履以验之，意所动，虹且绕之，因孕，十有二岁，以十月四日降神。”
- ㉔ 《礼记·祭法》：“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 ㉕ 《易经·卦检》、《淮南子·天文训》。

作者单位：《神州学人》杂志社
责任编辑：陶原珂



《癸辛杂识》与《元史》之“叶李”小考

刘家钰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记有叶李事共四条，计有“叶李遭黥”、“叶李纪梦诗”、“叶李姓名二士”、“避讳去姓”等。其中“叶李姓名二士”云：“叶亦愚名李”。按此叶李即《元史·叶李传》之叶李。然《元史》却不载其“亦愚”之名号，传云：“叶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然二叶李实为同一人是没有疑问的，试论列如下：

一、叶李上书遭黥事，不仅见之于《癸辛杂识》，也见之于《元史》本传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其上书事，《元史》本传记载最详，其中说：“(贾似道)复入相，益骄肆自专，创置公田、关子，其法病民甚，中外毋敢指议，李乃与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阙上书攻似道……似道大怒，知书稿出于李，嗾其党临安尹刘良贵，诬李僭用金饰斋扁，锻炼成狱，窜漳州。”其遭黥事，本传是借扬州儒学正李澐之口道出的，其言曰：“叶李本一黥徒……”《南村辍耕录》亦纪其事，并云叶李“遂遭黥，流岭南。”

二、叶李仕元事，除本传外，《癸辛杂识》与《南村辍耕录》亦均有载。《癸辛杂识》“叶李纪梦诗”条称之为“叶亦愚右丞”。其“避讳去姓”条又云：“叶亦愚之为右丞相也，李漸泉班通书题衔云：‘门生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班’，盖径去自己之姓，以避其名，其苟贱不足道如此。漸泉在前朝为省元，为从官，为督府参谋，所守如此，宋安得不亡！”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叶亦愚之为右丞相也”是指仕元而言的；“前朝”，则是指南宋而言的。《南村辍耕录》亦云：“(叶)李后仕元。”并云：“元世祖平江南，即召见叶李官之。凡有军国大事，必问曰：‘曾与蛮子秀才商量否？’一日议事，叶病足，遂以所御五龙车召之。”看来叶李仕元是很受宠遇的。

三、《癸辛杂识》所记叶李卒年，亦与《元史》本传同。《癸辛杂识》“叶李纪梦诗”条云：“叶亦愚右丞辛卯八月初四日夜，忽梦一老人……明年壬辰二月初六卒。”壬辰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元史》本传亦云：“(至元)二十九年二月，李南还，至临清，帝遣使召之，俾为平章政事，佐丞相完泽治省事，李上表力辞。未几，卒，年五十一。”

从上来看，叶李(亦愚)与叶李(太白)系一人无疑。“亦愚”似应为其别号，恐非其又一字云。

陆一帆《关于文艺本质问题的思考提纲》讨论(续)

刘伟林：

文艺作品通过“中间环节”反映现实生活

陆一帆先生提出的“文艺并不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本来，这个问题是文学理论的题中之义。文艺作品是在作家的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既然是经过作家的头脑，这就必然渗透着审美主体的审美理想和态度，就必然根据这些审美理想和态度的不同，而对现实生活有不同的选择和筛选。同一创作题材（同一社会生活），在不同的作家头脑中，产生了不同情节和不同思想的作品，这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常说文艺创作与拍照不同，不是现实的照搬和实录。其实，就是拍照，在不同的摄影师手上，也有不同的取材和风格的审美选择，其成品也不是千篇一律的，何况其题材和思想的跨度无限广大的各类体式的文艺作品。

如此题中之义，为什么倒引起了争论？我认为这与我们的思维定势有关。我们有些同志，是长期被二范畴（感性—理性）认识论统治着的。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主张三范畴（个别—特殊—普遍）认识论的。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肯定了黑格尔提出的“情况—情境—情节”的三范畴认识论和论述了认识运动中的特殊性范畴的人类思维运动中的思想成果，并且加以归纳、总结和发展，把“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三范畴认识论称作“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法则。特殊性的发现也便是中介理论的发现。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世间事物的联系都包含着“直接联系”和

“间接联系”，并且更为重视“间接联系”。马克思把黑格尔的中介理论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指出创造商品的“劳动”是联系劳动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并运用这种“中介”（“劳动中介”）理论揭开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秘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则把“中介”概念放在自然事物的动态“转化”中去阐发，提出了“中间环节”、“中间阶段”的概念，也就是“中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转引了黑格尔关于事物间的“直接性”和“间接性”的一段话，接着批注道：“一切都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在这里，列宁特别注意事物的“间接联系”，因为“间接联系”是隐蔽曲折的，是一种辩证思维。事物的这种“间接联系”也就是中介。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黑格尔的中介概念进行了改造，使“中介连接对立”，从而使中介理论成为唯物辩证法认识论的组成部分。

显然，如恩格斯所说，在物质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存在着“中间环节”即“中介”的。由此推广到文艺创作来说，文艺作品对现实生活反映也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中间环节”即“中介”的。至于这个“中间环节”是指什么，普列汉诺夫和陆一帆先生均说是社会心理。我觉得，“中间环节”是包含了社会心理的，但是否就是指社会心理，还须确证。我认为，文艺创作过程中，在审美客体（现实生活）和审美主体（作家）之间，存在着一个“审美的主观形式”作“中介”，这个“审美主观形式”也就是“社会审美心理”，其具体表现是“审美感知——审美表象”。其实，马克思也论述过这个问题的。马克思说过，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而这种“美的规律”，既有外在的客观规律，也有内在的审美规律。在“生产——消费”这一互为创造的系统中，其中间环节就是生产中人的带有审美特征的“主观形式”。而

建筑师在着手用蜡来造蜂房之前，作为中介环节的“蜂房”的审美表象就已经在建筑师的头脑中存在着了。

由此可见，在文艺创作中，作家是不能直接反映社会生活，不能以外部世界为直接表现对象的，直接的表现对象是主体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心理等，现实生活必须以社会审美心理为中介反映于文学中。就文学艺术的源泉问题来说，说社会生活是源泉，是无可非议的；但若说上述“中介”也是“源泉”也未尝不可。列宁便说过：“认识论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地就是：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源泉。马赫承认了第一个前提，但是搞混了第二个重要前提，即客观实在反映在人的感觉中，或者说客观实在是人的感觉的源泉。”（《列宁全集》14卷124页）我们与马赫不同，因为我们既承认第一个前提，又承认第二个重要前提。但我与陆一帆先生不同的是，我认为在文艺创作中，社会审美心理等中介不是直接源泉，而是间接源泉。社会生活才是直接的、最终的源泉。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陈培湛：

社会心理并不是 文艺的直接源泉

陆一帆教授的《关于文艺本质问题的思考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指出社会心理在文艺反映现实中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文艺的本质问题。然而，《提纲》得出的“社会心理是文艺的直接源泉”的结论，却值得斟酌！

（一）《提纲》所引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说明了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不可能由此引出“社会心理是文艺的直接源泉”的结论。

《提纲》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经济是人类初期的事”，“后来由于生产力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人类意识就摆脱了对物质关系的直接依赖。”这一立论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人类意识摆脱了对物质关系的直接依赖，并没有摆脱对社会存在的依赖，没有摆脱经济条件的决定和制约作用。以文艺为例，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

下，原始文艺直接反映了原始人类以劳动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在出现阶级分化后，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除物质关系外，还有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矛盾斗争，所以，文艺反映的生活内容更为深广。但是，后来的文艺作品无论内容怎么深广，其源泉仍然是社会现实，而不是某种观念（如社会心理）。这不仅为马列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所证明，而且也符合文艺发展史的事实。《提纲》还引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一段述：“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这一论述，指出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关系的复杂性。在说了这段话后，恩格斯紧接着又指出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紧密联系。他说：“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9—250页）恩格斯明确指出了宗教、哲学等形式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艺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并不认为一切文艺作品都直接反映社会现实，但是也没有否认有些作品是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这种反映，当然不是机械的照搬，而是能动的反映）。无论何种类型的作品，其创作源泉都是社会生活。社会心理只是文艺反映社会现实的中介因素，不可能成为创作的源泉。

（二）普列汉诺夫指出社会心理这一中间环节，但不能认为他“就解决了恩格斯提出的意识形态如何产生的问题”，也不能得出“社会心理是文艺的直接源泉”的结论。

《提纲》在谈及意识形态如何产生的问题时，认为马、恩还来不及解决这个问题，而普列汉诺夫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提法不够确切，对普列汉诺夫的贡献评价过高。《提纲》引述了恩格斯给梅林信中的论述：“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

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为，而当时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方式和方法产生的。”在这段话中，恩格斯并没有说他与马克思没有论述意识形态如何产生的问题，而只是说忽略了对观念产生的方法、研究。马、恩指出社会意识的产生和发展都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意识形态如何产生的问题。至于观念产生的方法问题，马、恩也作过不少论述。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指出人类认识或“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理论的、艺术的、实践—精神的。当然，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初，马、恩针对唯心史观长期独霸的情况，特别强调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这在当时是应该这样做的。恩格斯在晚年的著作中，在继续坚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时，又特别强调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以及上层建筑各个部门的相互作用。他在《致符·博尔吉乌斯》中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马、恩的论述，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意识形态如何产生的问题。普列汉诺夫对社会结构的论述，揭示了社会心理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作用，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存在如何转变为社会意识。但是，从根本上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功劳不应归功于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指出了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但“中介”不等于“源泉”，不能由此引出文艺的直接源泉是社会心理的结论。社会心理毕竟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因而，文艺的源泉归根到底是社会生活。把社会心理说成是文艺的源泉，容易导致作家远离生活，热衷于表现自我或某一群体的心理，而忽视了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王才勇：艺术反映现实的 中介是主体精神

我国文艺学研究在艺术本质问题上，由50年

代的艺术认识本性论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艺术审美本性论（形象反映论），由80年代中叶对艺术认识特殊性的探讨到几年前围绕艺术主体性问题展开的争论，凡此种种，尽管在所关注的问题方面不断走向深入，但均未迈出触及问题实质的一步，即在承认艺术反映现实的同时，未触及艺术如何反映现实这一根本问题。时至今日，我国文艺理论界已有不少人认识到，艺术反映现实需要一系列中介，但没有人明确指出这些中介是什么，更没有人在艺术本质问题的高度上去谈论这些中介。因此，陆一帆教授“社会心理源泉说”的提出，为我国文艺学研究走向新的深入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社会心理作为艺术与现实之间的一个中介环节显然是不容置疑的。艺术对现实的反映离不开社会心理的折射，但是，把社会心理作为艺术反映的唯一中介、直接源泉，似乎又筛掉了一些同样为艺术所具有，而社会心理范畴又无法涵盖的其它精神内容，诸如政治、法律、道德乃至潜意识、下意识等。我以为，较之于社会心理，用精神范畴去言说艺术反映的中介具有更大的涵盖面和实质意义，因为，社会心理也被包容在主体精神之中，而且，尽管社会心理在艺术反映过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但是，艺术反映现实的根本载体乃是主体精神。前几年在有关艺术主体性问题的争论中得到关注的艺术主体性内容，在艺术反映现实的过程中也只能由精神中介得到体现，其中当然包括社会心理。任何艺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都必然是在精神中介中实现的。因此，用反映论去言说艺术的本质，必须具体阐明这个精神中介。

反映论的提出，在哲学上是为了说明精神的本质，说明人的意识活动的实质。人的艺术活动尽管属于人的精神活动之列，它与精神的一般特点具有一致性，但是，反映论不能用以直接去说明艺术的本质，这样会把艺术与科学相混同，从而抹杀艺术本身所固有的特殊性，即主体精神因素对反映的制约或参与作用。艺术作为人精神活动的一种，它必然拥有精神的一般本质，即如反映论所说的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但是，艺术反映又有它的特殊性，它是以精神为中介的。无论是反映社会的直接存在，还是反映社会的本质真实，其中都离不开精神中介。至于直接反映人的精神世界，反映自我的现代派运动，它的精神中

介就更是不言自明了。

艺术反映的精神中介总的就是指：艺术反映是以主体精神方式实现的。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艺术反映的对象绝不是纯然客观的存在，它是进入主体精神视野中的对象，是被主体精神解释过、或打上主体精神印记的对象；第二，艺术反映的过程绝不象科学活动那样是一个纯客观的认知过程，其间在很大程度上融汇着主体的情感、意志、社会心理等精神内容。艺术反映是一系列主体精神活动的过程；第三，作为艺术反映结果的艺术作品也是以精神为中介而存在的，艺术作品中的一切都是精神化的产物，例如，作为文学存在方式的文学语言，作为音乐存在方式的乐音符号、作为影剧艺术存在方式的画面、场景等，都是主体精神活动的产物，它们是直接以精神化的方式存在的。所以，艺术反映不能离开精神中介，艺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只能在精神中介中实现，只能在精神中介中存在。我们以前所说的艺术反映包含着对主体内容的反映，而且这个反映中还溶贯了主体精神内容，这其实说的就是艺术反映的精神中介，而不是艺术反映本身。反映和反映中介还是有所不同的。反映是一种主体行为，反映中介则是这个主体行为赖以实现的方式。艺术反映就是以主体精神方式实现的，它离不开主体的精神中介。

精神是一个综合概念，是人的认识、情感、意志、心理等活动的总和，其中既包括处于意识层面的内容，也包括处于无意识或潜意识层面的内容，既包括个体和社会心理这些低级形态的意

识，也包括思想、情感等属于意识形态的内容。所以，把艺术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中介视为主体精神，这不仅比社会心理具有更大的涵盖面，而且更具有实质意义，因为，艺术反映的精神中介，不仅表明了艺术的直接来源，而且还宣明了艺术赖以存在和实现的方式。

这里，说艺术反映离不开精神中介并没有否认艺术的客体性，而只是在艺术活动的直接层面上指出了艺术反映社会现实的精神中介。一旦走出这个直接层面，深入到艺术的终极存在，艺术最终还是由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它来自社会现实。就精神这个中介来看，任何一种精神都折射了它由之而来的外在存在，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对某种存在的反映或折射。因此，精神内容最终受制于某种客观存在，主观精神最终由客观存在所决定。也许，在某个实际的艺术反映活动中，决定该精神内容的社会现实已不复存在，或是与制约、作用于它的现实不相一致，但是，精神内容本身无论如何都不是天生自在的，它必定由某种社会现实所制约、所决定。所以，强调艺术反映的精神中介，并没有因此而否认艺术中的客体性。相反，它既肯定了艺术的客体性，也张扬了艺术中的主体性。在我看来，主体性是艺术的直接存在方式，客体性是艺术的最终本源。因此，用艺术反映论来表示艺术的本质必须看到艺术反映的精神中介。这个看法尽管在具体结论上与陆一帆教授不尽相同，但总体思路是一致的。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哲学所

“竹林七贤”称名始于东晋谢安说

周凤章

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是继汉末“建安七子”之后出现的又一著名文人集团，但是，关于“竹林七贤”的一些关键问题，迄今并未弄清。限于资料的不足，本文不拟作系统的论述，仅就“竹林七贤”的称名问题略述管见，以期得到专家的指教。

一、关于“于时风誉扇于海内”

人们在谈论“竹林七贤”时，往往引用东晋人孙盛《晋阳秋》“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这一说法。但《晋阳秋》成书约在东晋孝武中^①，去七贤交游之时已逾百年；而且，这一说法又失之模糊：“于时”，究竟于何时？“风誉”，是“风”还是“誉”？均难确指。所以，要想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看来还须亲自对“竹林七贤”从游之当时，“七贤”自己以及其他人的著述、言谈作一番考察。

“竹林之游”的时间，据笔者所见，约有三种说法，时间跨了十五年：

- A. 陆侃如“正始说”，公元245—248年^②；
- B. 陶渊明“嘉平说”，公元249—253年^③；
- C. 周一良概引前人意见作“正元、甘露说”，公元254—259年^④。

为方便计，我们索性把这段时间定为魏末的二十年间。

先看七贤的著作和言谈。

他们这一时期的著作，见于记载并流传下来的有：阮籍、嵇康的诗和文，刘伶的一篇《酒德颂》和向秀的一部分论文。按一般理解，阮籍的《大人先生赋》及其《咏怀》诗、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及赠友和叙述身世之诗、刘伶的《酒德颂》，都是抒怀之作，又间及放浪形骸之事，似应涉及“竹林之游”罢，然而，在阮、刘的作品中，竟无一言提及“竹林七贤”之名，又无一言涉及“竹林之游”其事，岂非咄咄怪事！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既论交道，似更应重忆昔日“竹林”订交旧事，然而也没有，不宁惟是，《书》中竟云：“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偶与相知”或系康偏激之辞，但据康诗文，从未提及“竹林七贤”和“竹林之游”，则可断言也^⑤。

据《世说·任诞13》载，阮浑长成，亦欲作达，其父阮籍曰：“仲容（按阮咸字）已预之，卿不得复预此流。”^⑥仅谓“此流”云，并未明言是“竹林七贤”或“竹林之游”。

七贤成员无此称，或缘其不欲自我标榜也。既云“于时风誉扇于海内”，时人当有称道，事实并非如此。

《晋书·何曾传》：“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干宝《晋纪》、刘义庆《世说》并载此事，文稍异）据何曾“若卿之曹”语，蔑视已甚，参以嵇康《绝交书》“阮嗣宗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之句，可知在魏末司马氏柄政的政治气氛下，朝野口碑不利七贤，遑论“贤”者之称。

综上可见，七贤及时人之著述言谈，并无“竹林七贤”之称。

二、中朝所未闻

魏末已如上述，那末西晋有无“竹林七贤”的称谓呢？

西晋著名文士，如张华、夏侯湛、潘岳叔侄、张载兄弟等都是由魏入晋的，其中张华且与阮籍有过交往，《晋书·张华传》载，阮籍读华《鵩賦》后，叹曰：“王佐之才也。”但在他们的著作或言谈中，也并未提到“竹林七贤”之名和“竹林之游”其事。

著名史学家陈寿，原为蜀汉观阁内史，于魏景元四年蜀亡入魏，后仕于晋，历任著作郎、治书御史，晋灭吴后，他广泛搜集三国时官私著作，著成《魏蜀吴三国志》传世，被后世推为“信史”。据《晋书》本传：“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著，便坏己书而罢。”也可见其搜集魏国材料之丰赡、叙事之翔实。但他在《王粲等传》中，叙阮籍、嵇康事迹仅只五十四字：“隽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气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亦无一字涉及“竹林”之事、提及“七贤”之称。

还有葛洪，据其事迹，著《抱朴子》应在中朝，他对汉魏以来清谈任诞之风极为不满，曾著论批判⑦，追根溯源，亦仅及阮籍，不涉六子，更勿论“竹林”放诞之事。

而“七贤”中人，除阮、嵇已卒，其他五人皆仕晋。这一时期，据今所能见者，只向秀有少量著作，其他人仅严可均辑录有残章断篇而已。而据向秀《思旧赋序》：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身见法……余逝将西见，经其旧垆，于时日薄虞渊，寒汎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时，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明谓“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大约此时政治气氛缓和，故无须讳言也。既如此，提“竹林”之交更无须讳矣，但文中甚至连阮籍等根本未提。另外，既“追思曩昔游宴之时”，理应稍及七贤“竹林之游”，又只字未提。足见至西晋，所谓“竹林七贤”中人仍无此说。

不过，据《世说·伤逝》：

王徽之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王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

却说王戎曾与嵇康、阮籍饮于黄公酒垆，并言王戎自谓“竹林之游”中，自己是年最少者。时、地、人、事，皆言之凿凿，岂非又证明七贤中人亲口承认有“竹林七贤”之交，而且端的有“竹林之游”其事！

然而不然，这段记载在东晋已有人否定了。据《世说》此条下刘孝标注引戴逵《竹林七贤论》曰：“俗传如此。颖川庾爰之以问其伯文康（按庾亮谥文康），文康曰：‘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盖好事者为之耳！’”

二说何者可信？

这可以从王戎任尚书令的时间加以推断。《晋书·王戎传》：“惠帝反官，以戎为尚书令。”另据《惠帝纪》：“永宁元年正月乙丑，赵王伦篡帝位，迁帝于金墉城，号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宫……三月齐王同起兵以讨伦，四月……辛酉……乘舆反正，群臣顿首谢罪，帝曰：‘非诸卿之过也。’”这即是“惠帝反官”本事。又“永兴元年春正月景午，尚书令乐广卒。”可知王戎任尚书令必在301—304年间。

永宁、永兴间，庾亮十三至十五岁，已涉人事。而王衍、王澄（皆为王戎从兄弟）、胡毋辅之和庾數（为庾亮从叔）号称“四友”^⑧，过从甚密，庾亮与他们也接触频繁，通过他们，庾亮对王戎事必甚了解。而按戴逵的说法推之，后来被刘义庆所辑录的王戎轶事，显系得之于闾巷之“俗传”，当时，天下大乱，朝野浮动，人人自危，各谋自保，遂借王戎之口传达出世态人心之一斑，不过尔尔。两相比较，庾亮的说法较为可信：中朝所未闻也。

三、江左忽有此论

揣摩庾亮此句意味，“此论”所指恐不仅是指王戎过黄公酒垆事，而且指“竹林七贤”及其“竹林之游”也。因为，“俗传若此”者，即今所谓社会舆论的倾向，按照我国长期形成的“同情弱者”的社会心理定势来推测，这种“俗传”，显然不仅是针对与司马氏关系密切因而飞黄腾达并且寿终正寝的王戎而发的，恐怕主要是为已去的“嵇生”、已亡的“阮公”及类似曾被司马氏政权压抑、摧折的其他人而发的，含有借题发挥的政治意图，表达了在政治上为所谓“七贤”打抱不平的意味。而作为当时朝廷重臣的庾亮，不会不清楚这种社会舆论的背景和意图，他的如上回答也不仅是着眼于个人的，而是从评价一个政治问题出发的。明乎此，我们可以把庾亮这句话理解为：过江后，时过境迁，忽然出现了关于“竹林七贤”的称呼以及“竹林之游”的传说，大概也不算错吧。

事实是否如庾亮所言呢？让我们再来考察一番东晋人的著述和言谈。

近人梁启超云：“唐修《晋书》，十八家晋史皆废。”^⑨梁说不妄，唐代以后两晋的原始材料确实大部佚亡，所幸还有一部《世说新语》为南朝刘宋刘义庆编辑，又为梁代刘孝标注为之注，为后世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原始材料。因此，我们要考察东晋人关于“竹林七贤”的著述和言谈，根据《世说》及其注引材料要比唐人所撰之《晋书》更为可靠、全面。

查《世说》记载“竹林七贤”事迹者不下七十余条，其中称名者凡六条，而刘孝标注引材料称名者也有六条。概引如下：

A：《世说》原文称名者：

《赏誉29》为刘义庆撮录诸书而成，称“林下诸贤”；《赏誉97》谢安称“七贤……入林”；

《品藻71》谢安称“竹林……七贤”，《伤逝2》王戎称“竹林之游”，《任诞1》据侯外庐意见，此条出孙盛《魏氏春秋》^⑩，称“竹林七贤”，《排调4》不知刘义庆录自何书，称嵇阮五人“竹林酣饮”。

B、注引材料称名者：

《文学36》孙绰称“竹林七贤”，《文学94》袁宏称“竹林名士”，《品藻17》邓粲称“竹林诸人”，《品藻71》孙盛称山涛、向秀等五人，并为品题名次；《贤媛11》孙盛称山涛与阮、嵇“著忘言之契”，《任诞11》戴逵称“竹林诸贤”，而其著题曰《竹林七贤论》。

另外，清人陶澍《陶靖节先生集》收《集圣贤群辅录》（一名“四八目”）亦称“竹林七贤”。

南朝诸代作者关于七贤的著作还有多种，因与论题无关，兹不录。

合计：王戎一则，谢安二则，孙盛三则，孙绰、袁宏、戴逵、邓粲、陶渊明各一则，刘义庆二则。而孙绰一条，经核对《全晋文》《道贤论》原文，孙绰并未迳称“竹林七贤”，知为刘孝标注加，应属其名下。王戎，西晋人，二刘，东晋以后人，皆不计。则知东晋人在著述及言谈中涉及“竹林七贤”事迹者甚伙，而直接称名者亦多，可见庾亮之说不为无据。

又据庾亮本传，其卒于咸康六年（340），既言“江东忽有此论”，则“此论”之首唱不得晚于是年。陶渊明生年较晚，又其说“得之故老传闻”^⑪，而邓粲“与南阳刘𬴊之、南郡刘尚公同志友善”^⑫，应与陶同时，他们不可能是这一称谓的提出者。袁宏生于公元328年，庾亮卒时他才十二三岁，戴逵与宏大致同年^⑬，他们同样不可能是“此论”的首唱者。比较可能的，只孙盛、谢安二人。

四、盖好事者为之耳

庾亮显然对本无其名其事，而无中生有地“忽发此论”者，大有不以为然之意，故他哂之为“好事者”云。

那末，谁又是这位“好事者”呢？我以为弄清了这个问题，则“竹林七贤”的称名悬案即接近于了结矣。

从生年看，孙盛和谢安都有可能。谢安生于建武三年（320），庾亮死时他已二十岁。孙盛生年无考，他是孙统的从弟，据统传：“统字承公，幼与绰及从弟盛过江。”孙统生年虽不详，但孙绰生于西晋建兴三年（314），前人已有定论^⑭，由此可推知孙盛于元帝渡江时，已是相携过江之幼童矣，则他又长于谢安。

但从情理推之，似谢安比孙盛的可能性更大。因据庾亮、戴逵“俗传”云云，显见这个称谓见之于言谈之间而非著作之中，此其一；而“俗传”之得以流传，则首唱者应非寻常人，此其二。据此两点看，谢安出身于陈郡望族，“少有重名”，弱冠之年已与朝廷大臣如王导、王濛、桓彝有所交往，朝廷累征而辞不就，隐居会稽，为东晋初清谈界的领袖人物，围绕在他身边的有一大批名士高僧（可能包括孙盛在内），与之游处，“出则

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⑩，所以他的言谈流传开去是很自然的。何况，他曾说“先辈初不臧贬七贤”^⑪，又说“我曾与诸人道江北事”^⑫，皆可证他在隐居东山时，确曾屡屡道及七贤之事，这些都与庾亮、戴逵的说法相吻合。而孙盛出于中都孙氏，父死于难，少孤贫^⑬，社会地位无法与安相比，其所著《魏氏春秋》、《晋阳秋》虽多次述及七贤事，但该书成书较晚，不仅距庾亮卒年已有两纪，甚至也晚于戴逵之著《竹林七贤论》矣^⑭。

复从事实看，据《世说·文学94》：

袁伯彦（按：误，应从下文校改）作《名士传》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

据此可知：（一）谢安与时贤“隐居会稽”、“言咏属文”之时，确曾谈论过魏末到西晋的名士及其事迹，而且自承是“特作狡狯”（徐震堦《世说新语词语简释》解“狡狯”为游戏），正与庾亮“好事者”的讥弹契合；（二）袁宏所撰《名士传》必取材于谢安关于“江北”名士的品藻之谈。当时袁宏年尚少，地位也较低下^⑮，未必会参与聚会并亲聆品藻，但他后来得之“俗传”，并据以著《名士传》，因为他清楚谢安为此“俗传”之首唱者，故一俟书成，首先拿给谢安鉴定，以示不敢掠人之美。另据孝标注，似江北名士初未分列品题，而袁宏之分目实安为之张本也，亦未可知。要之，这两点有力地说明：谢安“尝与诸人道江北事”，实为东晋盛传之“竹林七贤”的发祥之谈，殆无可疑也。

综上所述，我以为后世盛传之“竹林七贤”的称名，始于东晋初的“俗传”，而东晋初的“俗传”又系谢安为之首唱。此“俗传”虽一度被庾亮所否，谢安也被讥为“好事者”，但后来谢安一登台辅，集望族、重臣、名士于一身，人贵官重，此“俗传”随之不胫而走，遂为士林所接受，为朝野所乐道。于是，孙绰从宣扬佛道出发，以七僧和七贤相提并论，作《道贤论》^⑯；袁宏将“江北”名士析而为三，作《名士传》；戴逵为隐逸者张目，为七贤“辨迹”、“达旨”^⑰，作《竹林七贤论》；王洵采之作赋^⑱、裴启辑之《语林》^⑲……而作为史学家的孙盛，采时贤之谈、众书之名以为大成，把它载入二春秋，使其名垂后世，彪炳史册，从此，“竹林七贤”之名遂广为流布，而“竹林之游”亦成为文坛之佳话矣。

一九九〇年十月初稿

一九九一年四月定稿

⑩《建康实录》太元十一年：“是岁，辽东裴徽送孙盛《魏晋春秋》二十卷。”此《魏晋春秋》即孙盛《魏氏春秋》与《晋阳秋》合称。

- ②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
- ③、⑪见陶澍《陶靖节先生集·集圣贤群辅录》及渊明自注
- ④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 ⑤侯外庐先生以为“《酒会诗》及《四言》十章，疑七贤游竹林时作”，见《中国思想通史》卷三163页，
我以为此疑证据不足，今不从。
- ⑥此条引文，系采自思贤刻本《世说》，与他本文字小异。
- ⑦见葛洪《抱朴子外篇·刺骄》
- ⑧见《世说·品藻15》及注引《八王故事》
- 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⑩见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卷三123页
- ⑪、⑫、⑬分别见《晋书》邓粲、谢安、孙盛、戴逵传
- ⑭据《戴逵传》，孝武时，累征不就，郡县敦逼，乃逃于吴。会稽内史谢玄虑逵远遁不反，上《疏》为
之开脱，称其“年垂耳顺”。又据《通鉴》，谢玄太元十二年为会稽内史，次年正月即卒，则玄上《疏》必
在太元十二年内，以此推之，逵约生于公元329年。
- ⑮参见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及各中国文学史。
- ⑯、⑰、⑱、⑲分别见《世说》“品藻”71、“文学”94、“文学”88、“文学”90、“轻诋”24
- ⑳戴逵《竹林七贤论》约作于太和年间（366—370）。参阅拙文《“竹林七贤”称名考辨》刊于《宝鸡师
院学报》90.3期
- ㉑陈寅恪认为，孙绰《道贤论》迎合当时“格义”风气，“以内教的七道（即天竺七僧），拟配外学的
七贤”。转引自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出版）64页。

作者单位：宝鸡师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陈白沙诗论探索

彭建康

一、白沙诗论主旨与江门自然之学

陈白沙是一个具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的理学家兼诗人，其诗论渗透着他的理学思想。

白沙在《与湛民泽·第九》中申明了他的学说宗旨：“此学以自然为宗者也”，“自然之乐，乃真乐也。宇宙间复有何事？故曰，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白沙的宇宙观中，“自然”是一个哲学的核心命题，“自然”便是“道”，“道”便是“自然”。“道”不离形器，又不滞于形器，所以白沙说：“道超形气元无一，人与乾坤本是三”（《次韵张东海》），又说：“道眼大小同，乾坤一螺寄”（《浮螺得月》）。天、地、人都为自然之道所贯通，万事万物都遵循着自然之道而生生化化，人们通过“作圣之功”，又可以得道，达到“道我合一”的境界。因此白沙的高足湛民泽解释“自然”时，赋予“自然”以人伦道德的属性，他说：“夫忠信仁义淳和之心，是谓自然也。夫自然者，天之理也。理出于天然，故曰自然也。”（《重刻白沙先生全集序》）又说：“盖其自然之文言生于自然之心胸，自然之心胸生于自然之学术，自然之学术在勿忘勿助之间。如日月之照，如云之行，如水之流，如天葩之发，红者自红，白者自白，形者自形，色者自色，孰安排是，孰作为是，是谓自然。”（同上）据此可知所谓自然即出于天然之理，一种天生的自然本性。“忠信仁义淳和之心”即是自然本性所体现的善心。白沙认为这种善心，通过致虚养静的修养功夫可以求得，亦须摒除一切俗习之气方能保持。

学术的“自然”与文章的“自然”本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前者属哲学层次，后者属文学层次。在

白沙那里，这两个层次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夕惕斋诗集后序》中说：“受朴于天，弗凿以人；稟和于生，弗淫以习。故七情之发，发而为诗，虽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全经。此《风》、《雅》之渊源也。”白沙论诗远溯风雅，认为即使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本“受朴于天”，只要排除一切人为的安排与习气。其性其情发而为诗，自可得风雅之旨。在这篇序文里，又说：“天道不言，四时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诗之妙用？会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枢机造化，开阖万象，不离乎人伦日用而见莺飞鱼跃之机。”此盖在说明宇宙万事万物无不体现自然天理，故诗之作无论小至鸟兽、雪月风花之品题，大至皇帝霸之褒贬，无不涵盖在这个天理之内。在白沙的心目中，天道、人道、诗道本是自然相通的，因此，他说：“会而通之，一真自如。”“一真自如”，佛家语，有真实如常不变之义。借用这个佛语，喻指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永恒的自然之道。白沙认为，把天道、人道、诗道会合贯通，依自然之道观照宇宙社会，即能把握万事万物的开阖变化；而寻常的人伦日用之事，也无非体现了自然天理生生化化之妙，依自然之道，把它们表现到诗歌里，自能显出“莺飞鱼跃”的天机理趣。白沙已经把创作主体的人及其创作活动纳入到“自然”之中了。据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白沙的诗论何以一再强调：“率吾情盎然出之，无适不可”（《认真子诗集序》）的原因，其中的真谛正是契合自然，抒写“受朴于天”的真性情。白沙的学术以自然为宗，白沙的诗论也是以自然为宗的。

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儒、释、道趋向合流，白沙的思想以儒为主，又受释、道的影

响，尤其在涵养论上，他主张静坐，更近似禅学。因此白沙的诗论主旨和他的自然之学一样，带有较浓厚的道佛色彩。

二、理融情中，天人合一的诗学审美观

如上所述，白沙诗论主旨和他的宇宙观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带有唯心主义成分，但它的美学意义却十分值得我们重视。

陈白沙是宋明理学由朱熹重“理”到王阳明重“心”的过渡人物，他的学说比程朱更倾向于“心”，因而，在审美的主、客体关系上，更重视主体的审美意识，强调审美中的感性体悟。他的诗论讲求理融情中，以情显理，《次王半山韵诗跋》指出，作诗“须将道理就自己性情上发出，不可作议论说去。离了诗之本体，便是宋头巾也。”对于诗歌“别是一体”的抒情艺术特征白沙体会甚深，他的诗都是率情写怀之作，其情其性发而为诗“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为云飞，或为川弛，声之不一，情之变也”（《认真子诗集序》）。白沙虽为理学家，但其诗绝少空洞说教，无“语录讲义押韵者”。白沙既重诗教，又重率情，两者的结合，形成了这位教育家所喜好、擅长的以诗为教的审美教育方式。陈炎宗说：“族祖白沙先生，以道鸣天下，不著书，独好为诗。诗即先生之心法也，即先生之所以为教也”。（《重刻诗教解序》）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点，白沙确实写了不少寓物说理的论道诗，但绝非篇篇言性说理。明杨慎《升庵诗话》指出，对白沙诗“ 缪解者，篇篇皆附于心学理性，即是痴人说梦。”罗邦柱在《空灵俊逸、平实渊深》一文中（见五邑大学学报社科版88年第三期），以充分的诗例证明，白沙从仁道出发，并没有忘情世事，他的不少诗作，字里行间凝聚着深沉的臣子之爱。如果忽略了这个方面，仅仅看到论道诗，就无法更全面地体会白沙诗作的抒情美学特点。

和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一样，白沙的宇宙观与天人合一的思想息息相通。他曾明言：“天人一理通，感应良可畏”（《天人之际》）。中国美学史表明，我们民族美学观念意识的孕育和发展，始终贯串着“一天人”这根主线。这根主线反映到白沙的诗论和诗作里是十分有趣的。他的抒写性情，契合自然的主张本身就是天人合一的。在他眼里，“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鸾飞

鱼跃。”（《示湛雨》），“江山都太极，花草亦平生”（《病中咏梅》）万事万物都充满着蓬勃生机，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和谐。他的《对竹》诗云：“窗外竹青青，窗间人独坐。究竟竹与人，原来无两个。”你看，人与物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物我交感谐和，既是自然之道的体现，也是美的体现。在这里用得着歌德评论中国诗人的一句话：“人和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在中国古诗中，天道、人道，诗道的会合贯通，常常通过比兴的手段，所体现的正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和谐统一。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框架里，在人与自然的契合中，自然影响人，并渗透到人性人情之中，人性人情又渗透到自然之中，天道与人道合二而一了。“忠信仁义淳和之心”本属社会道德伦理的范畴，但同时又是“自然”，是“天理”。“蚊蜂自识君臣义，豺虎犹闻父子亲”（《答陈秉常问儒佛异同》）。这就是说，人和自然之物都能体现忠君、亲亲仁爱的自然天理。这天理是善的，因而也是美的。白沙强调：“诗之发，率情为之，是亦不可苟也已，不可伪也已”（《淡斋先生挽诗序》）又说：“大抵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先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性情好，风韵自好；性情不真，亦难强说”（《与汪提举》），他把性情的善和真与诗歌美学范畴的“风韵”联系起来了，这就是白沙的以自然为宗的真善美统一的审美观。对于写“真”，白沙在主张出于自然的同时，又强调写出“精神”，认为写诗“非但直说出本意而已”（《与张廷实主事·第九》），“若论道理，随人深浅，但须笔下发出精神，可一唱三叹，闻者便自鼓舞，方是到也”（《次王半山韵诗跋》）。《寄林虚庵》诗云：“辋川树石愁摩诘，与可精神动老坡”，这个“与可精神”正是苏东坡“胸有成竹”的“传神论”。白沙所讲的“笔下发出得精神，可一唱三叹”与苏轼的“传神论”是一脉相通的。凡优秀的诗作，必具含一种启发感动的审美特质。这是中国诗学传统的一个共识。白沙“笔下发出得精神”的提法，即是对这个共识的明确的体认。

总的来说，白沙诗论的天人合一的审美观，是伦理上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艺术上理与情的统一。这是江门自然之学与诗学审美观结合的必然产物，也是白沙诗论最具有本质的特点。白沙虽推崇自然的诗歌艺术风格，有个人的欣赏嗜好，却无固执之言，他尊唐而不抑宋，极力推崇杜甫、邵雍，又追慕陶渊明与韦应物，对黄庭坚、陈师

道亦多所肯定。在门户之见甚深的明代诗坛中，这种不事标榜的审美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三、“诗之工，诗之衰”说的依据及其理论意义

在《认真子诗集序》里，白沙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而鲜明的诗论见解：“诗之工，诗之衰也。”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这个说法“把诗歌与其艺术性对立起来”了（见该书中册288页83年版）。这个批评，殊乖白沙本意。研究白沙诗论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白沙没有诗话专著，他的诗论具有即兴性、针对性的特点，散见于序、跋、书、箋和诗歌里，不成系统。我们必须在全面占有原著有关诗论材料的基础上，作一番综合分析的工夫，庶几可把握白沙诗论的全貌；第二，应抓住白沙抒写性情，契合自然这一诗学审美观的核心；第三，应联系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看“诗之工，诗之衰”的现象。

如前所述，抒写性情，契合自然是白沙的诗主旨，他正是以此作为审美的艺术标准去评价古今一切诗作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在以盛唐为宗，以拟古主义为基调的明代诗坛中，白沙不以时俗为转移，尊唐而不抑宋，对“非唐非宋，名曰‘俗作’”，的观点也提出了批评（见《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迹卷后》）。

诗歌自然风格之美，是一种更具深层意蕴的艺术美，为我国历代许多著名诗人和诗论家所推崇和追求。从艺术表现形式看，这种自然美不事雕琢，少有人工痕迹。白沙说：“古文字好者，都不见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说出，自然妙也”（《与张廷实主事·第九》）。在《与客谈诗》中，他又写道：“《风》《雅》余三百，唐音仅几家。梦犹将影说，痒莫隔靴爬。岂是安排得，胡为孟浪夸？超然不到处，应是用心差。”白沙所以极力推崇风雅与盛唐之音（对晚唐诗持有保留态度，可参考《读韦苏州诗》），就是因为它们具有浑然天成的艺术特色。出于对诗歌自然艺术风格的推崇，白沙十分赞赏严羽的诗论主张，在《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迹卷后》，他引述沧浪的话说：“昔之论诗者曰：‘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又曰：‘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夫诗必如是，然后可以言妙。”“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诗歌意境即是一种自然蕴藉、意在言外的艺术意境。《沧浪诗话》指出：“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

洒，不可拖泥带水”，上乘的诗作，都是意境融浑不隔，自然传神，无矫揉雕琢痕迹的。白沙所看重的诗歌艺术性正是这个！

虽然白沙说过，写诗“一似信口说出，自然妙也”，但这决非否定诗人作任何艺术锤炼的努力。“信口说出”之前有一个“似”字，无非用来说明不落言筌的自然之妙。事实上，白沙是相当重视诗歌的艺术锤炼的。他在《批答张廷实诗箋》里说：“概观所论，多只从意上求，语句声调体格尚欠工夫在。若论诗家，一齐要到”。在《与张廷实主事·第二十四》里又说：“若恣意妄为，词气间便一切飞沙走石，无老成典雅，规矩荡然，识者笑之。”

所有这些论述都充分说明，白沙并不忽视诗歌的艺术性，不忽略形式美的锤炼。要言之，他是在主张契合自然的前提下求得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那么，对白沙“诗之工，诗之衰”说又应如何理解呢？从《认真子诗集序》、《夕惕斋诗集后序》、《与张廷实主事·第九》、《与李孔修四则之二》等篇的论述来看，导致“诗之衰”的“工”，实指“拘声律，工对偶”，“用心过苦”，伤于安排，因而显出人工斧斫痕迹，失去自然之美的“工”。所以白沙说，诗文之“体制非一，然本于自然者便好，如柳子厚比韩退之不及，只为太安排也。”（《与张廷实主事·第九》）

要充分认识白沙“诗之工，诗之衰”说的深刻意义，还须联系他所处时代的文学创作背景，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明初、中叶之交，台阁体诗文风靡一时，占居文坛统治地位。这类诗文讲究词气安闲，雍容典雅，其内容或应制颂圣，或逢迎唱酬，多为粉饰升平，媚人耳目的贫乏平庸之作。从永乐至成化间，台阁体诗风延续近百年之久，陈陈相因，愈积愈弊。有识之士对此感到忧虑实为必然。继之而起的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倡言以盛唐为宗，力主学杜，但也是从声调法度着眼，仅仅是从形式上学杜，未能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风雅传统。更有意思的是，李东阳引白沙为同调，他在《麓堂诗话》里说：“陈公父论诗专取声，深得要领。”这与白沙诗论的主旨相去太远了。白沙“诗之工，诗之衰”的慨叹，实在是深感诗道衰落的痛心之语。正是在这篇诗序里，白沙批评说：“有意乎人之费毁，则《子虚》、《长杨》饰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优然，非奇之教

也。”在《夕惕斋诗集后序》里又指出：“诗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锻月炼，以求知于世。”“晋魏以降，古诗变为近体，作者莫盛于唐，然已恨其拘声律，工对偶，穷年卒岁，为江山草木，云烟鱼鸟粉饰文貌，盖亦无补于世焉。”在这里，白沙重申了诗文创作须有补于世、反对徒饰的儒家诗教主张，不能不说具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自近体诗产生以来，诗歌创作自觉讲求声律对偶，本来是一种进步，但也确实出现了“拘声律，工对偶”，使诗歌失去自然“真美”的形式主义的流弊。永明体对诗歌声律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贡献，而其形式主义的倾向亦无庸讳言，尔后，唐初宫廷应制诗、北宋的西昆体，江西诗派以及明初、中叶之交的台阁体等等，都存在着白沙所指陈的形式主义诗风。故而他的批评并非泛泛之论。

文学样式的嬗变兴衰现象是十分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王国维通过对古典诗词、戏曲发展史的研究，认识到一定的文学形式都有它发生、发展、成熟、衰亡的历史。他在《人间词话》里指出：“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循而作他

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而论，则此说固无易也。”鲁迅先生在《致姚克》中也谈到：“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不懂，弄得变成僵尸，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罢，《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从文学发展史上看，白沙的“诗之工，诗之衰”说，堪称古典诗论中的真知灼见，实质上他是用了极其精粹的语言道出了中国文学发展中一条相当重要的内部规律：一种文学样式发展到了顶峰以后就要走下坡路，其显著的特点是在形式上下功夫，企图以此求知于世。这种创作态度实在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白沙多次疾呼，“写诗应不以人之赞毁为意，‘率情为之’，诚意所发，辞不虚假（《杂诗序》），并以自写真性情的清新诗章与‘粉饰文貌’，‘媚人耳目’的诗风相抗衡，实有矫偏救弊之效。

作者单位：江门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刘斯翰

论教育市场及其效率

吴超林 张铁明

教育作为一种需要耗费稀缺性资源，并受着成本、价格等因素制约的劳动力生产活动，它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所决定，同样明显地受着价值规律的支配。当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劳动力市场的开放时，教育系统便受到巨大冲击。教育系统必须在劳动力的供求结构和总量上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物质条件和提高系统的效率。而教育供求关系实现的必要环境——教育市场的完善与否，会直接影响到供求的均衡和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在广东省改革开放背景下，教育市场的发育发展特别令人瞩目。那么，教育市场是怎样的一种现象？在理论上明确它，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本文借助系统科学原理试作探讨。

一、教育市场是教育资源有效配置的实现条件

教育的供求是由劳动力供求所派生的。由于社会经济系统对劳动力的需求复杂多样，每个人及其劳动能力也天然地存在着差异，各个人对教育需求的内容、形式和手段也不尽相同，教育供求总是基于成本与收益比较原则下而作出的。教育需求是人们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如果没有一定的货币支付，那么人们对教育的渴望仅仅表现为一种欲望或需要，而不能产生实际的需求行为。教育供给也是在一定成本、价格条件下的行为，若不考虑成本、价格、收益等因素，那么，教育生产即使能够进行，那也不是在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教育作为人的能力、素质、观念、甚至语言潜力充分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商品经济或市场发展的过程。教育市场通过劳动力价格信号，反映着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教育运行，成为教育供求的实现条件和机制。

人们在追求商品价值的活动中所相继培育和完善的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其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价值追求目标。教育无论是投资需求或是消费需求，都以追求价值为目标，目的在于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社会化角色的需要。促成教育供求实现的必要环境——教育市场，它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①在这里，教育市场的内涵不是一种状态或具体的商品交换场所，而是教育运行过程或生产形态，是“建立在交换

价值基础上的生产。”

教育的结构和功能是由人的身心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经济系统所制约的。教育之所以不断从单一结构发展成包括初等、中等、高等，正规和非正规的、普通的和职业的复杂结构状态，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系统对各种教育的需求。教育的功能使个人通过接受教育改进自身素质，从而在生产过程中顺利地与生产资料结合，使其生产能力的增量带来产品的增量。这里隐含着一个教育功能实现的前提，那就是要与相应质量的资本存量组合。既然教育也是一种需要消耗稀缺性资源的产业，其投入和产出效果必然离不开社会经济系统的总体评价体系。由于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要经由劳动力中介将其联接，因而，从技术进步的非中性事实出发，教育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在供求上必然会存在涨落现象，这就导致供求在结构上的非均衡将是长期的。教育运行必须有灵敏的机制不断地调节运行过程与运行目标的偏差。面对教育需求的主体、内容、形式和手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要由完全计划来反映和实现教育供求是很困难的。多样性的市场供求，要求教育供求进行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市场活动，因为市场运行过程不仅促进了人的社会规定性的多方面的发展，也造就了个人之间共同的社会联系的丰富发展。如果离开市场机制，对于需求者来说，既压抑了他作为计划对象的人的充分发展，又会导致他作为计划主体的人的严重扭曲；对于供给者来说，教育系统因结构单一、效率低下，而趋于封闭无序状态。因此，教育市场机制作为商品经济条件下促成供求在总量和结构上协同的因素，是教育系统自组织和教育资源有效配置的实现条件。

二、统制市场与教育系统的封闭性

教育垄断是指特定主体（国家或教育生产者）对市场或相当于市场层次上的教育运行过程或这一过程的某些方面的排他性控制。这种控制多半以教育系统或子系统的进入障碍为基础，或以特定的教育决策权力的高度集中为前提。

我国教育垄断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出于国内外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教育争夺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垄断的伴生物。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即在全国范围内以国家垄断的形式出现，具体表现在将所有私立和其他形式的学校改为公立或收归国有，在教育投入、教育内容、形式和教育产出等方面严格地按国家的意志进行。无疑地，特定条件下对教育的垄断，在当时政治斗争中保持了教育性质的纯洁性，保证了经济恢复时期所需的人力供给。在社会安定、平等和经济稳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系统的日益完善和复杂，对教育运行实行高度集中控制也存在着局限性。

教育运行是一种投入一产出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要通过教育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来对教育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在广义的市场的意义上看，国家对教育的垄断即由国家集中计划控制教育的市场变量和运行过程，以计划管理替代市场的直接调节作用，此时教育运行过程的市场并未消失，而只是采取了统制市场这一特定的形式而已。所谓统

制市场，就是教育运行中没有直接市场调节成分，完全由国家指令性计划直接管理的过程。它的具体特征是：

第一，教育价格不是由市场上教育生产（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决定，而是由国家决定，教育价格不能精确地反映教育成本以及劳动力市场人力价格的浮动。

第二，^④教育生产要素投入和教育产出分配分别采取计划调拨和计划分配形式，起调节作用的不是供求价格，而是行政指令。

第三，教育系统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反应被政府行政指令的指派所代替，教育需求由教育供给引导，教育系统的专业设置、教育内容、形式以及产出数量都由国家计划规定，教育需求者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地接受教育系统的分配。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被行政分隔。

第四，教育系统内部，教育生产者（教师）与教育需求者（学生）基本上是主从关系。计划的规定性和教师的绝对权威要求教师和学生的是服从，以致整个教学过程难于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教育运行实行统制市场的体制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国家的详尽的指令性计划体现了全社会的需要，能够有效地组织教育生产和分配，因此，为满足经济系统对劳动力需求而设的教育生产部门，就必须也必然成为这种指令性计划的执行者。无疑地，垄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全社会在教育机会方面的平等，也形成了体系完整的教育系统。但是，教育指令性计划的完成与否，均会以或多或少的教育过度或短缺即资源的浪费为代价的。因此，垄断教育采用统制教育市场的体制去调控教育运行的明显弊端就是，它在不断规范运行的同时，却使自身日益封闭起来。尤其是当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并存的情况下，教育系统便处于条块递阶分割的状态，教育系统各个层次上平行的子系统之间相互隔绝，各个教育子系统内部封闭的倾向极为明显，重复投资、重复设校、大而全、小而全的自我封闭体系普遍生成而最终导致的是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失调，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在被统制的市场下，教育价格不能成为教育供求和劳动力供求的指示信号。教育计划指标的确定，完全以国家管理机构的设想为依据，然后再向下层层压指标。而作为产出效益的评判标准或“成功指标”^②便是计划的完成情况。高度集中计划的结果是“系统自发性和多样性被破坏”。^③它“只是一项把大家都塑成同一模式的发明。”^④教育生产出的劳动力无法适应经济活动复杂性的需要。在统制市场下，教育产出进入经济系统的障碍大，教育系统内部组织低效；而且，教育产出的价值是否实现也并不妨碍下期的计划分配。整个教育系统失去了自组织的刺激机制，无法促进教育有效供给的形成。教育系统的封闭性阻断了进入系统的外界信息，形成不了教育系统在形式和层次上的多样复杂性，其结果只能导致垄断下的卖方市场出现。

三、卖方市场与教育系统的开放性

竞争是商品经济中必然存在的现象，也是市场机制有效运转的先决条件。当我们把

教育系统放到商品经济系统中去考察的时候，教育竞争也成了不可回避的事实。教育竞争包括卖者（教育生产单位）教育规模和质量上的竞争，和买者（教育需求者）知识、能力（成绩）上的竞争。

在教育运行被统制的情况下，卖者之间或者买者之间无须竞争也能获得生存的保障。卖者追求国家计划的完成，买者追求教学计划的完成，卖者虽然存在对教育生产要素的竞争，但更准确地应该说是争夺，其运营不按最小成本组合原则进行。而纯计划下形成了卖者相对于买者的绝对垄断地位，以致教育产出（买者）进入经济系统的障碍被强行减少，由此阻止了教育买方市场的形成和作用。教育系统几乎与经济系统处于隔绝状态。

教育系统的开放是其结构有序功能放大的前提条件。在劳动者和经济系统之间可以双向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劳动者知识技能水平的高低既决定其竞争能力的大小，又决定其收入能力的高低。由于教育是生产劳动者这些能力的途径，而其产生教育需求行为，必定以一定的支付能力为前提，并在需求过程中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这就促使需求者会理性地选择需求的内容（专业）和形式（何种类型的学校）。

买方市场的形成，迫使教育系统向外界开放，不断传递外部系统的信息和物质能量，买方市场上的竞争又促进卖方之间的竞争。教育供给者只有根据需求者提出的要求去设置专业和形式等，才能获得其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卖者之间的竞争必然会提高教育系统内部的组织效率。降低教育单位生产成本，实现投入产出最优。买者之间的竞争又会提高教育产品的质量和适应能力。只要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具有不同利益的劳动者在能力上存在差异，并且这种能力差异会导致未来职业和收入能力的差异，那么，在教育买方市场上的竞争就不会停止。如果人为地限制这种竞争关系，客观上只能加剧教育系统走向封闭无序状态。

四、竞争：作为卖方市场的教育系统效率

在竞争机制作用下，买方市场的形成进一步会诱导教育系统当作卖方市场，按价值规律在学校内部和学校之间，以及教育系统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建立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

首先，卖方市场会根据买方市场的需要，促成教育资产使用的责任机制产生。在垄断条件下，由于教育生产单位不是相对独立的经营者，特殊的物质利益被社会利益所掩盖，购置和使用教育资产是无偿的，没有使用和更新资产的责任压力、效率低下、折旧期长，教学设备陈旧落后，不能适应知识传递和技术生产创新的要求。

其次，教育卖方的竞争是优化教育生产者组合的有效机制。在买方市场存在的情况下，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就成为教育生产者之间进行竞争的主要手段。任何教育生产单位要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就必须对生产者（教师）、教育劳动资料（设备）和教育劳动对象（学生）进行优化组合。而教育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无疑又会推动师资水平的提高，形成合理的师资队伍结构。由于竞争是与竞争者的物质利益相联系，竞争必然促成

能力与收入挂钩，并促成教育生产者在系统内外的流动，其结果既可以提高教育质量，又能改变教育劳动收入不合理的现象，使教育真正成为一种欣欣向荣的产业。

再次，卖方市场的竞争机制不断促进教育系统生产创新。教育系统唯有在外界系统信息和能量的作用下，不断地进行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才能在与社会经济系统的适应过程中获得发展的物质条件，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五、教育市场是非完全竞争市场

在理论上，竞争的完全性取决于这样一种逻辑前提：教育边际成本等于价格，价格又等于平均成本。在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时，教育供求便达到充分均衡。教育经济学在分析教育供求时总是假定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教育经营者为使成本最小和投资收益最大而努力，形成了一系列的价格。这些价格既包括反映不同类型教育生产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的供给价格，也包括反映需求者为了得到教育而准备付出牺牲的需求价格。当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等时，完全的竞争促成了供求充分均衡，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

尽管教育系统的投入和产出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在市场上出售的，在一定程度上，教师、学生和设备的价格确实反映了用于正规学校教育的资源的相对稀缺性。然而，由于教育供求还受着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教育供求价格并不是一种容易确定的精确参数，因此，现实的教育市场并非一个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

教育的供给价格不能全面正确地反映教育成本。如果试图完全由竞争的市场来提供教育，势必会导致教育投资的不足。一般认为，教育供给价格就是教育成本，即教育的生产费用，它包括支付教育生产者的报酬（教师工资）和购买教育生产资料的成本两大部分。在这里，由于教育劳动的特殊性，教育劳动对象是人，当个人在法定离校年龄后仍继续接受教育，那么他就必须放弃工作收入，这种收入理应包含进教育成本之中。但事实上，这部分成本却又不可能精确计量，而只能间接地通过与其他就业者的收入差异来衡量。

教育需求价格也是不易确定的变量。一般地将教育需求价格定义为：人们对购买一定质量的教育所愿支付的价格。由于教育质量很难短期内确定比较。因此，对各级各类教育的“所愿支付”又是内涵界定极不严格的。教育需求的连贯性特征，致使不同级别的教育需求价格不一定反映教育的真实成本。教育需求价格更难与教育供给价格相等，如此一来，要么教育需求价格低于教育供给价格，制约教育有效供给；要么教育需求价格高于供给价格，出现教育有效需求不足，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说明教育供求达不到充分均衡状态。如果由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调节教育供求，势必会导致教育供给膨胀与需求不足的局面并存。

六、教育市场是有赖政策干预的有计划市场

既然教育市场不是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那么，要使教育供求均衡就必须有教育计划干预，否则，任由扭曲的教育价格调节教育市场上的竞争，会导致“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

ket Failure)”。所谓有计划干预的教育市场，就是为克服市场缺陷，在教育运行过程中嵌入适当的计划机制的教育市场。其作用是规定市场运行方向，纠正市场运行偏差，补充市场调节之不足，完善市场运行的条件，使市场机制能在自组织过程中趋向教育系统的运行目标。

1. 教育计划促进教育系统结构功能的有序化。教育是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系统，有专门教育和一般教育之分。专门教育以就业为目标，其主要效用为市场效用，它的成本和价格比较容易确定，可以由竞争市场机制调节供求。但是，一般教育有着政治、文化、发展科学、规范道德等多样化的功能，其主要效用为非市场效用和外部经济效用，它的成本和价格是不易确定的，因此不可能完全由市场竞争实现供求。一般教育的供求应该有教育计划的干预才能实现。

2. 教育计划和教育市场共同作用能促成资源有效配置。教育供求受价格调节。可是，教育价格相当复杂，对教育供给者来说，供给价格以成本多寡决定；而对教育需求者来说，需求价格除了直接成本外还包括机会成本，如果完全由价格自由调节供求的话，由于需求价格总是低于供给价格，教育供求就难于达到均衡。教育需求行为决策总是在比较成本—收益得失中作出的。各种教育的收益率并不相同，同一种教育对于不同的需求者也有差异。教育收益率若不反映经济发展条件，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都会不利。因此，不仅需要教育计划协调供求均衡，而且必须经由教育计划根据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诸领域的投资利率与教育系统收益率计量比较，才能促进稀缺性资源的最优配置。

3. 教育计划促进教育机会均等。这一功能可以从两方面理解：第一，由于每个人在能力上天然地存在差别，而且求学者对自己究竟需求何种教育也往往缺乏清楚的认识。因而，有效需求行为的产生，需要教育计划的干预。第二，由于教育可以提高未来获得收入的能力，而教育需求的现期能力取决于家庭收入状况，“因此，教育越多地出卖给最高的出价者而不是在各阶层中进行平均分配，那么良好教育的分配，就越加象有利于富人的财产继承权”。⑤如果仅根据购买力分配教育，必定扼杀有潜能而又低收入者受教育的权利，教育便成为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的工具。在消除教育不平等竞争这方面，教育计划所能作的努力就是直接为低收入者子女提供经济资助，如提供助学金、公费、奖学金、贷款以及教育担保等。这样既不削弱竞争，又可克服不均等。

4. 教育内容的改革有赖于教育计划的干预。教育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完全的教育市场竞争的结果，教育的政治、文化等功能势必削弱而趋向单一的经济功能。不能完全由价格促成的一般教育供求不足，又会导致教育系统趋向单一结构的专门教育。求学者由于对教育缺乏正确评价的能力，也会无法适应于所有教育系统的教育年限和基本标准。教育内容在这种实用的职业目的诱发下也将趋于简单化，因而教育的社会化功能会被短期的经济化倾向所削弱。

(下转第89页)

依靠科技提高经济效益

——肇庆市机械工业的调查

施芝华 谢名家

科学技术是当代生产力中的第一要素，对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无疑起着巨大的作用。肇庆市机械工业主管部门和广大企业深谙这一道理，因而坚持以科技为先导，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主线，向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要效益，不断推进规模生产和规模效益。今年1至6月实现产值2.36亿元，比上年增长32.33%，实现利润1286万元，比上年增长30.6%。其主要经验是：

一、调整开发并举，促进结构优化

调整结构和开发新产品，是问题的两方面。只有理顺行业布局和产品结构，才能为新产品开发提供物质和智力支持，也只有开发出更多的适销对路的新产品，才能更好地促进结构性的调整和优化。肇庆机械局根据这一思路，加强了对行业结构的规划和调整。经过努力，现已建成一批在全国同行业中领先的企业，如广东仪表厂成为机电部重点企业和成套重点企业，是我国一个重要的气动仪表基地。广东华达机器厂成为全国农牧业成套加工机械制造基地。配件厂、机床厂、真空泵厂、气动元件厂、液压泵厂等企业都进入全国同行业的前列。

在调整行业布局的基础上，肇庆市机械工业下大力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并取得显著的成效。

一是适应性调整。即通过对产品的性能、质量、水平以及外观的革新、改造，发展派生和系列产品，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要。如广东液压泵厂从原来只是为造船配套生产高性能叶片泵，扩大到钢铁、重型机械、矿山机械、塑料机械等行业，使用户从40多个发展到400多个，产值从100多万元发展到2467万元，利润从10多

元发展到155万元。

二是开发性调整。即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以及机械工业产品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开发市场潜在需求大、竞争力强的优质拳头产品。如鼎湖农机厂开发搪玻璃反应罐（Ⅱ类压力容器），把生产压力容器和搪玻璃两大工序融合在一起，使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

三是外向性调整。即利用我省的人文地理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如怀集汽配厂，由原只生产“解放牌”、“北吉”等的进排气门，转到以生产康明斯气门（出口美国）和E.C.气门（出口英国）为主，产品外销，产值从200多万元发展到900多万元，利润从几万元发展到几十万元，成为出口扩权企业。

四是技术性调整。即优先发展高科技、高水平、高附加值的产品，消化、吸收、创新、替代进口产品和机电仪表一体化产品。广东仪表厂从日本引进的EK系列基地式气动仪表，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通过几年的努力，国产化率已达82%，通过机电部的“国产化验收”。其中的两个规格已由机电部纳入今年的创部优计划。原来生产单一产品的肇庆机床厂，近年来消化、吸收日本的瓦楞纸板机组，并创新发展形成了系列。已被批准为国家级替代进口产品。企业也由此而扭亏为盈。

五是效益性调整。即努力开发那些投入少、见效快、效益好的新产品。如云浮县机械厂，原生产的大理石石材机械，市场已接近饱和。他们根据获得的新信息，迅速利用原有的设备，转产花岗石石材机械，一举成功。

同时实行淘汰性调整。即对技术落后，无市场需求，效益差的产品实行停产、淘汰。如肇庆

变压器厂淘汰了耗能较大的老产品，转而生产S7系列节能变压器，已被省批准为“变压器改型定点厂”，今年的订货超过100万元。

二、加强技术改造，促进规模效益

肇庆市机械工业原来基础比较薄弱，进一步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如何通过推进技术进步，走内涵挖潜改造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就成为问题的根本所在。市机械主管部门总结了“六五”在技改上错失良机、贻误机械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大力推进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有效地促进了经济效益的发展。

一是增强追求科技的意识，提高企业从事技改的积极性。一方面在每年一次的厂长会议上，反复阐明技改与企业盛衰的关系，使广大企业领导认识到，不搞技改，不向高新技术发展，企业就没有出路。另一方面推广技改搞得比较好的企业的经验，让其它企业学有榜样。如推广广东液压泵厂的经验，就有力地带动了全行业的技术改造。该厂位于粤西山区，条件并不好。但该厂较早地抓了技术改造，因而在技术上占有优势，从而赢得市场的主动权，成为盈利大户。由于认识到技改的重要性，企业进行技改的积极性普遍提高。“七五”全行业共投入技改资金1.08亿元，比“六五”增加3.5倍。实行技改的企业数增加1.5倍，技改项目数增加1.8倍。

二是择优引进，提高技术水平。有选择、有重点地引进和消化、吸收、创新先进的产品和工艺技术，是促进整体技术水平迅速提高的有效途径。肇庆市机械企业在技改中，坚持引进的先进性，因而能够较快地提高技术水平。广东仪表厂和气功元件总厂择优引进了先进的产品，并通过消化、吸收和创新，实现了国产化，促进了企业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怀集汽配厂瞄准国际上最先进的工艺技术，引进美国先进的设备，新建两条年产350万支气门生产线的技改项目，由于工艺先进，检测手段完善，英国商人考察后，立即签订了五年的进口合同，1989年达到100万美元，成为全国同行业出口量最大的企业。

三是扩大名优产品的批量，形成集约效益。名、优、新产品是先进工艺和技术的结晶，也是企业获得迅速发展的主要依托。能不能以此为导向，扩大其批量，形成规模，就成为企业在技改后能否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关键。肇庆市机械企

业十分重视以名、优、新产品为基础，加强技术攻关，在技术成熟之后，迅速发展批量，因而能形成效益优势。广东华达机器厂以部优产品为龙头，及时进行技术改造，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形成良好的规模效益，成为市机械行业第一个国家二级企业。新兴农机一厂“七五”期间加强技术投入，发展成套的饲料机械，使产品覆盖全省饲料厂的40%，由原来只生产农机具的小厂跃升为年创税利超百万元的高效益企业。

三、坚持技术的高起点，以技术领先带动质量领先

技术的高起点是保证质量高起点的先决条件。因为当代质量竞争的背后往往表现为技术和工艺的竞争，没有技术领先就不会有质量领先。这几年，肇庆机械工业企业之所以能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高的效益，就是坚持技改以效益为中心，而效益则是以先进技术和由此而产生的质量为支撑。在实践中，他们探索了一条可行的路子。

一是树立“当代质量观”，充分认识先进技术的牵引作用。“当代质量观”的核心要求是产品过程的“全面质量”，而这一过程的基础是技术。肇庆机械工业主管部门把树立“当代质量观”作为思想任务，重视把当代质量管理意识灌输给企业，引导他们用先进的技术保证产品的高质量，从而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发展壮大自己。肇庆气动元件厂坚持以先进技术为前导，从而保证了品种、质量和产值、利润在全国同行业的领先地位。广东仪表厂通过质量、品种的不断创新，取得了技术和质量优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目前，该厂正在研制以成套为龙头，汽、电并举的跨世纪的仪器仪表。

二是坚持引进技术为辅，自我创新为主，以较少的投入赢得较高的质量技术效益。肇庆机械工业在推进技术进步，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问题上，坚持“立足自己、引进关键、博取众长、消化吸收”的原则，争取某一方面的技术突破，因而能发挥较好的技改效益。肇庆配件厂近几年技术改造取得很大成绩，但该厂只引进了一台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粗糙度光洁仪。肇庆机床厂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制造产品，仅花1.8万美元在交易会买回一台圆压平模切机，就解决了关键的技术问题。如新近开发的三层瓦楞纸板生产线，就是依靠自己创新和消化引进技术生产出来的，

单今年安排的五条线就可创产值400多万元，效益也相当可观。

三是把先进性和适用性结合起来，加速产品国产化和替代进口进程。技术的先进性是保证产品质量领先的核心，而技术的适用性则是保证产品质量稳定的基础。肇庆机械工业主管部门注重把先进性和适用性结合起来，做到发展优势，避免劣势，在全行业中树立一种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观念。因此，在引进和开发先进技术的同时，他们注意顾及企业现有的技术水平、工艺装备水平和员工素质的状况，使高新技术能在企业扎根，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七五”期间肇庆机械工业开发的全部新技术基本上转化为实用产品，从而为替代进口和提高国产化程度奠定了技术基础。如广东仪表厂、肇庆轴承厂在这方面均取得较好的成绩。

肇庆机械工业依靠科技进步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但它也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

——发展后劲不足，影响规模经济的进一步扩展。肇庆机械工业虽然在“七五”的技术改造中取得很大成绩，但从总体上看，投入不多，改造面不广。全市53家机械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只有31家，低于全省机械工业改造的平均数。即使已经进行技术改造的厂家，由于投入的制约，规模也受到严重的限制，而有的项目，要真正发挥效益，需到“八五”期间。机床厂、仪表厂均因资金不足而无法扩大生产能力和上新的项目。整个机械工业正面临着发展后劲不足的困难。因此，各级政府必须充分认识机械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实行政策倾斜，增加投入，加强其技术改造，使机械工业能以先进的装备和技术支持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

——流动资金不够，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一是“三角债”已成为沉重的索链，把企业捆得死死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的包袱将越来越重。二是流动资金太少，企业捉襟见肘。现行的企业流动资金定额是在产品经济时代核定的，已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企业为了增加流动资金，不得不贷款，而这部分贷款利息较高，期限又短，稍为逾期，就要被罚息，企业难以承受。

——分配机制不健全，企业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一是工效挂钩存在鞭打快牛现象。现行的工资与效益挂钩的分配机制，不利于奖优罚劣。存在四种情况：企业工资总额高，利润也高，企业还能得到好处；工资总额与利润之比不相上下，企业有积极性；工资总额高，利润低，企业最有积极性；而工资总额低，所创利润高的企业，最没有积极性。现在要重点解决的是工资总额相对较低，而所创利润较高企业的合理分配问题。二是企业承包后超额利润部分的分配不合理。现对超额利润部分也实行工效挂钩，即利润每增长1%，工资增0.3~0.7%。我们认为，超额部分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实行不同的分配指标，鼓励效益好的企业为国家多创高额利润，而且大头应留给企业。

——企业兼并的政策不配套，不利于行业结构的调整。实行优胜劣汰，组建企业集团，就必须实行兼并，但现在政策不配套，带来许多问题。建议研究出若干政策措施，以推动这一工作的开展。眼下，由于政策的缘故，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以致阻碍企业的结构调整。如有些中、小企业留利不多，而上交能源、交通调节基金等就占去25%，所剩无几。对企业留利，现实行分项审计。我们认为，应允许企业在各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权。再就是税负重。“三乱”没很好解决，以及“文山会海”和检查评比等多如牛毛，使企业穷于应付。所有这些都不利于企业的调整和改革，需要认真予以解决。

——《企业法》不配套，影响了企业组织结构功能的发挥。现在，《企业法》的实施细则还未出台，因此，赋予企业的自主权也无从落实。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上级机关的行政附属物。干部乃至工人的调动，企业没有自决权。什么都要求上下对口，如评先，首先就要看是不是机构上下对口，在这种左右掣肘的情况下，企业就很难聚精会神去提高经济、技术和效益水平。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外部条件的改善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作者单位：省机械工业厅

编者按：位于梅州山区的梅县涤纶厂，仅用三年的时间，就跨进了广东省亿元企业的行列，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此，我们选发一组有关该厂的调研文章。今期先发表两篇，下一期再发表两篇。当你读了这一组有关该厂的文章后，也许会知道一二，并且可能会得到一些启发。

抓住历史机遇 振兴梅州纺织工业

陈 杰

梅州市梅县涤纶厂三年多来的实践与探索，为梅州纺织工业的发展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梅州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八五”规划，提出以卷烟工业作一点，涤纶丝和铜丝作两线的“一点两线”为重点工业的布局，不仅是对我厂三年多来成绩的肯定，也为我市纺织工业的前景勾划出鲜明的轮廓，指明了奋进的目标。

梅州纺织工业具有良好的基础，早在16世纪中、后期，兴宁县就兴起了纺织工业，20世纪30、40年代，纺织事业十分兴旺，成为粤东“纺织之乡”。目前，我市七县一区，大都有纺织工业，有的具有一定实力，形成纺机制造、纺纱、织造、印染处理到成衣加工的纺织工业体系。但是与发达地区比较，我市纺织工业存在较大差距，设备技术落后，生产规模小，产品低档，质量差，缺乏竞争能力，难以形成自己的优势。针对这些不足和弱点，我们发展纺织工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坚持运用先进技术，优化产品结构，组织配套体系，形成集约经营。总的设想和规划是在现有生产基础上，以化纤为主，增加涤纶丝品种规格，发展织布、染整、服装深加工，形成纺丝、织布、印染、服装配套生产体系的涤纶集团，组成紧密型集团公司。以纺织工业为龙头推动各县纺织工业发展，促进市与县、县与县的合作，组成松散型营销合作，或形成纺织工业联合体，带动和促进全市纺织工业的新发展，按照这个规划，梅县涤纶厂正在进行第二期技改，与港商合作成立“丽丝纺织有限公司”，开发年产2500吨FDY仿真丝。接着开展超细纤维、异形丝和复合纤维的研制、开发，增加化纤丝的品种和产量，以满足和适应市场和梅州市涤纶企业发展的需要，然后计划引进400台先进喷水织布机和3000万米的染整设备。现在FDY仿真丝的引进，已完成了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与港商签订合同和章程、设备引进合同的谈判及签约、资金落实和厂房“三通一平”工作，1991年6月开始厂房建

筑，年底进入设备安装，将于1992年第二季度投产。这个项目成功后，可获产值7000万元，税利2500万元。我们通过“八五”期间的努力，力争使涤纶集团初具规模，年工业总产值达到5—6亿元，税利近亿元。

我们认为：梅州市纺织工业发展的设想规划是完全适应形势发展需求的。目前，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丰富，国际国内市场需要不断提高，对化纤花色品种和质量档次要求越来越高，将促进我国化纤工业更大发展，表明化纤工业产品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市场。国家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强调发展化纤，广东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纺织工业发展化纤，控制棉纺，加强服装设计和生产，逐步形成纺织、印染、辅料、服装生产相互配套的生产体系，提高最终成衣率和创汇水平。”国家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大气候为梅州纺织工业的振兴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国际国内市场给我们以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阻力，把梅州纺织工业的发展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重扬粤东“纺织之乡”的威名，形成新的优势，为我市工业经济发展和实现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作出积极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是梅州市纺织工业公司经理、梅州市梅县涤纶厂厂长、中外合作梅州市丽丝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谈梅县涤纶厂的人才策略

张梓林

“什么时候人变成人才，而人才又得到发挥，我们的企业管理就算搞活了，企业就有希望了”。这是梅县涤纶厂领导们对人与企业关系的理解，反映了梅县涤纶厂鲜明的人才观。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和人才观念，该厂从各方面选好才、用好才，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智慧和积极性，从而使梅涤厂取得巨大的成功。

一、增强企业凝聚力是育才、用才的基础。

梅涤厂在筹建期间，就采取了“培训 \leftrightarrow 设备安装，培训 \leftrightarrow 操作实践”的有效措施，对技术干部、管理人员和岗位工人进行专业思想、业务技术、生产工艺等方面的全面、系统的严格训练，为企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政治工作人才、管理人才和经营人才。这些人才，在梅涤企业里施展才华，费心尽力，塑造了梅涤人的自我形象，培育和创造了梅涤企业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反过来又成为企业发现人才、吸引人才、稳住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动力。几年来，企业吸引了一批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目前，全厂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职工占职工总数的64%。大、中专学历和有技术职称的职工人数达110人，占职工总人数的17.5%，其中多数是化纤、纺织、机械设备、电器工程、自动控制、电子计算机、统计、会计等专业人才。全厂岗位技术工人技术考核合格率高，其中涤纶车间岗位技术工人190人，经过理论和实际操作考核合格率达100%。全厂取得专业技术职务聘用资格的占职工总人数的10%强。职工的技术知识、文化档次不断提高，企业逐步形成人才密集的现代化纤科技企业。

二、提高人的素质是人才管理的根本。

企业管理的首要问题是人才管理，人才管理的重点是提高人的素质。几年来，梅涤厂的党组织、厂领导始终把提高职工素质，培育一支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四有”职工队伍，当作人才管理的根本任务来抓：

1. 树立团结、拼搏的梅涤精神，塑造有理想、有志气的梅涤人。建厂初期，各方面都有困难，厂里有些人缺乏信心，思想顾虑多。厂领导根据厂里青年工人多的特点，注意发挥党、政、工、青、妇的力量，积极做好青年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对广大职工进行思想前途教育，使职工认识理想前途与本职工作、个人利益与企业命运的关系，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觉塑造“团结、拼搏、艰苦创业”的梅涤精神和“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荣辱观，把自身利益与企业经济效益捆在一起，从而迸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创造出坚固的物质基础，为纺织工业发展，为梅州山区经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 培养职工的主人翁精神，发挥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怎样才能使职工体会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梅涤厂领导认为首先要树立职工在企业的主人翁地位，培养职工的主人翁精神。因此，他们提倡“民主建厂、治厂”。具体做法是：（1）职工参政议政，参与企业决策。厂里把年度计划、生产任务、经营方针、承包方案、发展规划、企业财务、经营效益、收益分配、工资调整、住房分配以及厂规厂约、厂容厂貌等问题及时向全厂职工报告，发动职工认真讨论，广泛听取、吸收职工意见，保证企业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2）梅涤厂制订了干部、行政人员参加劳动制度，实行厂领导每天深入车间，中层干部坚持参加机房、操作室值班。干群同在生产第一线，干部在参加劳动的同时，能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密切了干群关系，干部为工人服务，在

群众中树立起公仆形象。（3）建立民主征询制度。梅涤厂领导采取各种形式，召开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职工、干部座谈会，真诚地听取职工的建议和批评。这样，既沟通和融洽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感情，又确立和尊重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4）培养职工参与意识，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厂里设立了“合理化建议箱”，办起了“合理化建议”专栏，广泛征集职工对企业建设、企业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培养职工参与意识，形成职工“心系企业，心为企业”的良好风气。（5）发挥榜样作用，开展评比、表彰活动。表彰先进，树立新风，使职工正确认识自己在企业中的作用。厂里通过职工自我总结评比活动，表彰和奖励先进，树立先进典型，以榜样的作用启迪职工进行自我教育，在人才管理、人才建设和人才教育等方面起到了先导和催化作用。

梅涤厂的实践表明：只有培养职工的主人翁精神，使职工明确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克服我是厂长的“打工仔”的雇佣思想，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才能积极参与企业管理，以良好的精神状态，饱满的劳动热情为企业兴旺积极奉献。

3. 加强业务技能训练，提高职工科学文化素质。现代化企业管理必须具备现代化思想、知识和技能。为了适应现代化纤纺织工业的发展，梅涤厂领导在提高职工现代化思想的同时，着力提高职工的业务技能和水平。首先，明确规定招收新工人一定要有高中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新工人必须经过严格的业务技术培训和操作技能考核才能上岗。其次，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的专业岗位培训：化纤纺织专业知识的业务培训；产品质量培训；岗位技术培训；组织专业知识考核，专业技能比赛；举办学术讲座。再次，肯花本钱让技术人员进行业务技术和知识更新，三年来，先后选派200多名技工，12名管理干部到上海、广州等地的现代化企业进行对口专业培训、学习；选送优秀青工到高等院校深造，委托嘉应大学代培专业人才，1991年计划付资在嘉应大学开设化纤专业班，培养化纤纺织专业人才。

4. 创造宽松、公平的竞争环境，做到人尽其才。在梅涤厂，干部、工程师、大学生和一般工人，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凭真本事去实践、竞争，去显才华，比贡献。厂领导认为：创造宽

松、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保证人才发挥作用。1988年2月，一条生产线因故障而停机停产。如果请德国专家需花时半个月，这将造成很大损失。厂里及时组织了由工程技术人员、电机操作工等人员参加的检修小组进行攻关。厂长陈杰说：“梅涤人要了洋设备，就一定能熟悉它、认识它、掌握它、驯服它，出了故障就要排除，不管是工程师，还是电工，有本事的，拿出方案来，群策群力，细心分析研究，大胆干！成功了，功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我全担了！”这样，领导当靠山，排除顾虑，放手大胆攻关，结果只花了几个小时，故障被排除，主机恢复了正常运转，生产也恢复了正常。

5. 不拘一格，大胆启用有各种技术专长的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近年来，先后提拔了6名进厂只有3、4年的年轻大、中专生担任中层干部，占全厂中层干部总数的23%；提拔了一批政治思想好、文化素质较高的年轻人担任班组长；让许多工程技术人员、经营管理干部在生产、经营各项活动中冲锋陷阵，施展才华。企业成为人才发挥、人才成长的广阔天地。

三、关心职工生活是梅涤人才管理之道。

“福利在好”是企业家办企业的格言，梅涤领导把它当成是人才管理之道。“福利”的好坏直接维系着职工的心。建厂初期，有一个技术人员擅自离厂跑到珠江三角洲去另就高位。这个事件在梅涤厂里引起较大的波动。梅涤领导就此而沉思，以此为鉴，加深了“福利”与人才管理的认识，为此他们除了对职工进行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外，努力在“福利在好”上细做文章，逐年增加职工的收入，从1988年人均收入2493元增至1990年的2720元；不断改善住房条件，保证技术人员、生产管理骨干安居乐业。此外还积极妥善安排好职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办好公共食堂，免费供应“节日餐”和夜班职工“营养餐”；办好公费医疗，搞好职工劳保、保健工作；改善文化、娱乐、体育设施，加强精神文明阵地建设；广种花木，设置园艺，搞好厂区美化和绿化工作，建设园林式工厂；重视厂房、工作室、办公厅、机房的美化装饰，使职工进厂如进园林，增加身心舒适感。

（下转第130页）

依靠科技，一举腾飞

——梅州面粉厂的经营之道

张 职

梅州面粉厂在改革开放中，由长期的微利厂变成利润大户，在三年承包期间，超额完成利润563万元。先后获“省级先进企业”称号和1991年全国商办工业优秀设备管理单位，并多次被评为省粮食系统和梅州市“先进企业”、“文明单位”。他们成功的奥秘在于：

一、提高人的素质，实行科学治厂

人的素质高低关系着企业的兴衰。面粉厂的领导认为：兴业之本，唯在人才，更在于善用人才。只有提高人的素质，才能优化企业整体素质，增强企业自身发展能力。因此，他们采取各项措施抓好干部职工的培训和教育，提高职工的科学文化素质：

1. 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该厂建立了以厂党支部为领导，厂行政领导密切配合，车间（股室）、班组为主体的三级思想政治工作网络。车间、股室、班组负责人为部门的“政工员”，厂里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分解为18项具体指标，使软任务变成硬指标，层层落实到车间、股室、班组和个人，成为检查、评比、考核的条件。有效的政工网络把思想政治工作融汇贯穿于生产、生活、经营、管理各个方面，从而形成政工工作上的自我教育、互教互学、共同提高的良好的政治氛围。

2. 积极开展政治思想教育，提高职工思想道德水平。几年来，该厂在干部职工中开展一系列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开展党的基本路线、党纪、法制、形势、国情和革命传统、拒腐防变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社会主义、“四有”职工等内容的教育。这些思想政治教育，做到联系实际，增强针对性以及注意方法的灵活性和形式的多样性。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全厂干部职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树立起爱国爱企业的主人翁精神。

3. 抓好教育培训，提高职工科学文化素质。几年来，面粉厂结合企业实际开展一系列职工教育培训工作。1985年以来，他们先后举办了各个专业岗位的技术业务培训班，参加培训的计有383人。此外，先后选送7人到大学、中专深造，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从而提高了职工的劳动技能、工艺技术、现代化管理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科技治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强化经营管理的科学化，建立科学管理新体制

为了有效地占领市场，掌握竞争的主动权，梅州面粉厂建立以市场为中心，以科学技术为主导，强化企业生产经营的科学化为目标管理体制，制定了抓管理、上水平、抓经营、增财源的战略措施，不断增强企业自身素质，促进企业发展。

1. 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企业重大决策和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科学的管理。企业的管理包括对人、财、物、产、供、销、设备、技术、质量、资金、环境、安全、生产、分配、生活、精神等方面 的管理，面粉厂的实践证明：企业管理必须有科学的规范和制约，必须建立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因此，他们在完善逐级承包、责任到人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充分发动职工根据生产经营和企业建设的需要，围绕集中、统一、高效率、高标准的企业管理目标，制定了技术标准35项187条，工作标准52项328条，管理标准41项315条，从而使厂内各级、各项管理有章可循，实现生产经营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促进了企业协调发展。经有关部门验收，达到了省级先进企业标准。

2. 建立全员、全面、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制。在竞争激烈而又变化莫测的市场上，产品质量的好坏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过去，梅州市面粉厂生产的面粉因质量问题而缺乏竞争能力，连本地市场也难于立足。面对产品销路不畅的严峻局面，厂领导提出“以产品的高质量求生存、求发展、增信誉、赢用户”的战略目标。几年来，他们扎实实在产品质量达标、超标上做文章，建立全员、全面、全过程质量管理体系，把生产经营、企业管理融为一体，坚持做到“四严”、“三不”。“四严”即是选料从严、技术操作从严、产品检验从严、产品出厂从严。“三不”即：不合格的小麦不落磨、不合格的产品不出厂、不达等级标准的产品降级处理。他们建立了从原料购进、储存、投产、加工成品及销售服务全过程的质量保险体系，建立了责任到人、层层把关、件件验收的全员、全面、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制。经过几年的努力，1990年特制一级精面粉获广东省商办工业产品“优胜奖”，1991年4月被评为省粮食系统行业优质产品奖，得到了市场和用户的信誉和喜爱。由此拓宽了省内外市场，出现了产品供不应求的喜人局面。

3. 工商结合、科学管理、广开财源。粮食企业大部分经营的是计划商品。为稳定人民生活，国家实行购销倒挂的粮食政策，因此，粮食经营单位多半成为政策性亏损企业。在国家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条件下，粮食企业必须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市面粉厂在严格执行国家粮食加工计划，完成计划内加工生产任务的同时，合理利用和发挥企业内部潜力，强化企业管理，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广开财源，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前几年，在资金短缺，市场疲软，粮食市场价格多变等困难困扰下，市面粉厂独辟工商结合、科学经营管理之路，适时建立了粮食市场的信息网络，做好信息的反馈、储存、整理、分析，发挥信息科学的积极作用，使领导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及时准确地把握住机遇，进而作出科学的决策。适时调整议价经营策略，改变过去只注重充实议价粮食库存的做法。实行确保市场供应，适量库存，及时加工，议价销售，加速粮食的

品流通运转，加速资金滚动周转，增强应变能力，变死为活。同时实行小麦、成品、面粉、饲料、包装等多种经营。在营销活动中紧扣购销环节，增加销量，拓展市场，实现了“市场疲软我不软”，取得了较好效益。据统计，1989年该厂经营议价小麦面粉6500吨，代加工面粉4167吨，经营饲料3000吨，全年共创利润115万元，1990年实现利润128万元。

三、技改挖潜，开发新产品，增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

市场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企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梅州市面粉厂坚持在企业内部开展技改挖潜，开发科技新产品，增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

1. 抓技术改造，创经济效益。60年代以来面粉厂十几年一贯制生产标准面粉，技术设备落后，经济效益低微。改革开放以来，解放了思想，增强了科技意识，明确了走科技兴厂之路。他们认为：技改挖潜是企业发展的启动器，只有坚持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企业才能步步向前和发展。几年来，该厂先后进行了四次技术改造，走内涵扩大生产之路。先后完成十多项工艺流程、机械设备等技改项目，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生存空间，增强了企业自我发展、自我改造的能力，促进了企业经济的发展。

2. 抓新产品开发，创市场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应强化科技意识，把科技变成生产力，抓好新产品的开发，创造市场竞争的优势。近几年来，梅州市面粉厂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开发新产品。做到手中拿着一个，眼睛盯着另一个，心里想着第三个；改造一代、研究一代、预测一代，认真做好产品的更新换代。几年来经历了标准面粉——精面粉——二精面粉——全一、二精面粉的产品技改和更新换代过程。同时，积极开发科技新产品。1988年该厂吸收成都科技大学的科研成果，研制成功膨松（自发）面粉，经省市食品卫生部门监督和验收，批准试产试销。这种国内首创新产品面市后，以其既保持面粉天然色香，又显示出方便实用，省时省料等特点而引起广泛的关注，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一品红”膨松面粉于1990年荣获广东省商办工业“新产品奖”，1991年又获广东省优秀新产品奖。从而使市场销量急增，产品供不应求。为此，该厂正进行扩大“一品红”膨松面粉生产规模，并着手研究系列新产品，力求在质量、品种、效益年里开发出更多新产品，创造更大的市场优势。

本专栏责任编辑：林有能

峰回水迥的卓异跋涉

——读《中国山水诗史》

魏中林

如果说，以自然山水为主要审美对象的诗歌创作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中逶迤浩漫的流程的话，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中国山水诗史》（李文初等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则确乎是这峰回水迥之中具有开拓精神的卓异跋涉。

自刘勰“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一语出后，历代诗话等文献中散金碎玉式的评点抉发，都说明山水诗被作为重要创作现象的认同与肯定。在近十数年来，从陆续揭载于报刊的有关文字，到诸如《山水诗歌鉴赏辞典》之类工具书的编纂出版，更标示了山水诗研究范围的拓展与开掘，以及对其价值、功能的多重发现与利用。但总体看去，迄这部《诗史》为止，包括海外和港台学者在内的学术界，对山水诗的观照尚徘徊于个体、局部和某一断面的层次，则是不容回避的现状。首先是许多未曾涉足的驿程与断隙尚待疏通和补苴。比如，山水诗产生之际的研究一直是个热点，但这之前山水因素在诗中的情况怎样？向来缺乏专门系统的梳理；又如：元明清三代山水诗状况如何？既不见综合的把握，许多富有成就的作家作品，更是付之阙如。这些，在《诗史》中都被初次展示出来。就山水诗研究总体而论，这部首次以全景视野的纵览与扎实深入的踏勘相结合，从而描述了山水诗全部流程的力作，当标志了散点式旧有研究格局的突破，进而使之跃上了一个新的综合层面。

然而，“史”的形式绝不仅意味着平面上所有点的线性连接。如果只是依照时序排列出作家作

品再加以品评的话，即使无所遗漏，也不比鉴赏辞典具有更多的意义。生动流走的历史过程早已离我们远去而沉埋并凝固于重累的载籍之中。史家的任务一方面要尽可能再现过程的原初形态；另一方面要对这过程作出合理的阐释。前者体现着历史的客观性要求，后者体现着历史的逻辑性要求。虽然纯客观的复现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而阐释也总有某种程度的错位。但客观性与逻辑性的统一，却几乎是史家共同追求的目标。由此看去，这部《诗史》的卓特之处并不止于联缀了一些前人未曾涉足或涉足较少的片断。尤其是逻辑性地建构了其历史发展形态的理论框架。

尽管山水诗被发现的历史已如此悠久，但“山水诗”这一概念，迄无严格的界定。山水诗当然要描写自然山水，但山水成份却如同水银泻地般地浸渗于各种题材的诗作当中，造成评论的混乱和评论者们的困惑。《诗史·导论》毫不含糊地规定了判别山水诗的两条“基本标准”，一是以自然山水为“主要审美对象”；二是山水描写的“份量”与功能。以自然山水为“主要审美对象”使山水诗同其他题材的诗作判然而别；山水描写的“份量在全诗中只占少数”和只具有“艺术上的陪衬、烘托、渲染”等功能，则说明自然山水还没有成为“主要审美对象”。也就是说，题材上的优势与不担任艺术表现功能的角色是自然山水成为“主要审美对象”的确证。应该说，前者把握了山水诗的本质，后者是实现这一本质的量的规定。这就揭示了山水诗完整的内涵和外延。从著者提出两

一条标准时剥笋式的否定叙述方式，到其后三重复杂情况的清理解析都表明，这一建设性的理论概括，确实是对大量感性对象的存在分析、比较、综合与合理扬弃旧说时论之后的结果。因而，这一概念把握既有效地导引着跋山涉水中的明确方向，也奠定了全书同步构建山水诗发展框架的理论基石。著者据之划定了山水诗的“孕育”期（《诗经》到西晋）、“形成”期（东晋），“勃兴”期（南北朝、隋），“昌盛”期（唐、五代）与“绵延”期（宋、元、明、清）。这样，中国古代山水诗，便以明确的时序递进，严密的层次轮廓清晰地呈现出来。举凡风格的把握，流派的梳理，作家的论述，作品的举析，来龙去脉、地位贡献等等，都在史的框架中得以显示。由此一来，已然凝定的自然状态的山水诗，又在更高的逻辑意义上恢复了它生动的原初形态。也许《诗史》所构建的这一史的框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客观性与逻辑性的统一，并非没有需要进一步推敲和商榷之处，但它作为山水诗第一个完整、自足的史论系统，对山水诗研究新格局的开创意义，则是无庸置疑的。

《诗史》是列入了饶芃子教授主编的“传统文学与当代意识丛书”的，而著者也力图将山水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去审视。可以说，重视山水诗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乃是本书当代意识的突出体现。

自然山水作为审美对象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并不只在诗歌一体。至少山水游记散文、山水画，甚至无形的音乐都是同山水诗相平行的以自然山水为主要审美对象的门类。它们共同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山水文化。再延展开去，文学艺术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又不过是人类同自然关系的反映之一。人类在依附自然、改造自然的长期发展中对自然产生的种种体验、认识、观念，更广泛地渗透于诸如哲学、美学、宗教等其他精神领域。所以，不只是山水文学艺术门类之间的平行影响，而且是人类各种形式的精神存在和社会存在有机地构成了互相联系的文化整体。正是对这种整体文化存在的共同体认，各种文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呈现了迅猛发展的趋势，并广泛波及到文学艺术研究领域。近几年来，我国的文学研究在文化学观念、模式、方法论的启示下，文学的文化研究已蹒跚起步。即如对山水诗的研究也是如此，其最显要的标志在于，人们普遍地不

再把山水诗看成孤立的诗歌现象，表现出试图将其自觉纳入山水文化格局中体认的不同努力。但文学的文化研究还只是探索中的课题，并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供取用。《诗史·导论》指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山水诗自他产生之时起就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不仅与中国文学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与哲学、美学，乃至其他艺术门类（尤其是绘画）的发展有着种种缘分”；“研究山水诗及其发展史，对于了解我国文化史中其他学科的发展，无论从深或广的视角上看，都是有重要意义的。”这表明了著者击楫于当代学术研究前潮的自觉。

当代文化意识的确立固然重要，但如何运作于对象的开掘，却是远为艰难的跋涉。几年来，人们确实经见了一些用新词术语以自表异的花拳绣腿。索其自标的“体系”、“更新”之实，则时有举鼎绝膑的尴尬。相比之下迥然不同的是，《诗史》迈出的探索脚步，既坚定明确，又审慎扎实。它没有象把握山水诗纵向流程那样概括出一个完整的层次框架，而是将自觉的文化眼光投注于具体对象的纵横开掘中，并且能探骊得珠。例如，由于把山水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这便决定了著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起步去追踪其源头的视点和视角。在这种关系中，人逐渐培养了对自然的审美能力，并投注于诗歌。于是便出现了歌诗中的山水成份。随着人审美能力的加强，歌诗中自然山水的份量逐渐加重，功能起了变化，艺术把握方式也日益丰富。著者一方面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从《诗经》到西晋这一历史跨度内自然山水还没有成为诗歌的主要审美对象；另一方面，又紧扣人们对自然山水审美能力的加强，建设性地描述了它渐次推进的孕育轨迹。尤为独到的是，著者对向来多被给予消极评价，且不大为人措意的“招隐诗”、“游仙诗”、“游宴诗”并不象一般作法那样简单地同山水诗划开界限了之。而是着眼于它们同山水诗的联系，具体而详实地发掘出它们对山水诗孕育间的影响和促动。发现了它们作为山水诗孕育载体的独特地位。又如，山水诗的形成及其原因是个被许多人咀嚼过的问题。《诗史》将其“形成期”断为东晋，自然参酌了时贤睿智的启示。但那“条件”或原因的展开，当归之于著者的文化眼光了。这是一张从纷纭杂沓的历史断面中呈现出来的纵横交织的文化网络：历史变动将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士大夫文人驱赶到江南优越的

地理中作为生存空间，这些北材南植的士大夫文人发现秀美的山水不只适于生存。于是排遣苦闷、寄托情志的需要便构成了人与山水的第一重亲和；社会动荡的结果同时造成不同思想文化滋生的空间，玄学突破儒学的一统格局乘隙而起，导致适应士大夫文人政治进退需要的隐逸之风盛行，构成与山水的第二重亲和；继承老庄泛神思想的玄学自然观驱散了原始和神学的自然恐惧心理，使人们更多感受到山水美的一面，构成与自然山水的第三重亲和；玄学自然观又把人们从哲学的领悟引向美的体味，引致对山水重新认识的观念更新，这同时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把山水视作“自然”（“道”）的具象化，因而反过来从形象的山水中寻求抽象的“自然”，构成与山水的第四重亲和；二是把山水视作“适性”的理想对象，这已是美的体味，构成与山水的第五重亲和；三是把自然山水视作理想人格个性之美的寄托，在自然中寻求人格人性之美，并用自然山水描述对人的赞美，构成与山水的第六重亲和。于此同时，质朴无文、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放逐了诗歌不可缺少的抒情性和形象性而走向极致。创作的危机使它寻求新的出路。既要避免玄言诗的枯燥，又要能够“体玄”的双重规定，便被充分认识了作为体玄适性理想对象的自然山水成为诗歌寻求新机的当然选择。于是虽杂糅着纪游与玄理，但却以自然山水为主要审美对象的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便脱颖而出。在这张网络中，优越的江南山水与高度文化素养的士大夫文人构成主体与对象的两极；时代思想的主潮——玄学，成为绾结人与自然多重亲和的主要中介；这一绾结是在不同层次上产生并发生作用的，里面又交织着社会动荡的横向驱动与老庄哲学的纵向流衍。多重

亲和的结果使人对山水的审美能力和表现方式全面成熟起来，必然寻求相应的载体，而诗歌的危机处境恰好为它腾出了舒展的空间。联系“孕育期”来看，《诗史》似乎展示了这样一幅生动的文化图式：人与自然契合最初孕育出来的对自然山水的审美种子经过长期的历史漫游，虽不断发育着，只有进入东晋这一巨大的文化子宫内，各种养份的奔昏交凑，才给它提供了茁长成形的充分条件，于是它的分娩在此便势所难免了。当然这其中一些因素已被前人不同程度地提出过，但《诗史》所作的新的文化整合却无疑代表了这一问题研究的最新成就。

流观全书，不时可以感觉到著者文化眼光强弱不同的闪射。不过比起从哲学、美学思想高度对山水诗的杰出把握来，《诗史》似乎较少将其同山水游记散文、山水画等门类作必要的映发。不过，《诗史》本身的著作梓行其实也就是对山水文化研究和调和人与自然现实关系的一个贡献。而且，它还为同山水诗直接和间接联系着的其他文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观照的独特视角。

几十年来不断梓行的各种文学史，基本上是综合性的通史、断代史和文体分类史。还没有见到依题材作史的实践。著者选择以史的形式去梳理作为诗歌题材之一的山水诗，这是一项有开拓意义的尝试。我们有理由希冀，这部《诗史》对那些应当系统总结的各种文学题材的研究，将会给予有力的启示，并触类旁通地开阔文学史研究的更多思路。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上接第124页）

事实说明：梅涤厂已初具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它吸引了人才，稳住了人才。梅涤人在梅涤企业的广阔天地里努力工作，积极奉献。最近，该厂要上新的项目，技术人员靠自己进行资料研究和项目论证。在与外商的洽谈中，表现

出良好的科技水平和谈判艺术，受到外商的赞扬。

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一切工作都是靠人去做的，人越有活力，企业就越发展、越兴旺。梅涤兴旺靠人才，梅涤的希望在人才！

《学术研究》1991年1—6期总目录

(括弧内前一数字是期数，后一数字是页数)

总类

-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笔谈..... 梁 刹 张江明 梁 木 李恒瑞 张玉昆
曹子德 刘福祥 刘应山 谢国雄 (4·6)
深入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广东省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座谈会综述..... (5·6)

经济学

- 论我国现阶段的私营经济..... 晓 亮 (1·49)
股票的虚拟特征及投资者行为分析..... 陈云贤 (1·56)
广东“八五”时期及2000年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李蒲弥 (1·61)
特区产业结构剖析..... 王光振 左 正 刘鸿钧 (1·66)
经济特区创办10周年理论研讨会综述..... 文建明 (1·72)
论证券投资计划..... 何小峰 (2·38)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现实选择..... 刘品安 (2·45)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六大制约因素..... 王 敏 (2·50)
广东所有制结构模式与产业产权政策设计..... 郑炎潮 刘文通 (2·53)
略论发展集团化骨干企业对市级经济成长的意义..... 崔 河 (2·58)
时间眼界及其连续性：计划与市场的动态结合方式..... 刘志彪 (3·21)
新加坡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特点..... 曹云华 (3·26)
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出口增长与收益调整
——台湾与广东的比较研究 王 琚 (3·29)
股票所反映的股权关系及法律调整..... 潘嘉玮 (3·33)
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论纲..... 马德安 (4·19)
商品质量变化与隐性价格运动..... 李治国 (4·25)
论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 虞 桦 张丽拉 (4·29)
银行的宏观调控作用与局限..... 郑先炳 (4·34)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体论..... 高伟梧 (5·10)
广义再生产论..... 冯光明 (5·16)
论90年代深圳特区对外经济发展策略..... 林 江 (5·26)
在软中变革的世界经济
——兼谈格局、软竞争和人的因素..... 贾大武 (5·32)
国有化和集体化互转的途径与方法..... 严闻广 (6·6)
论我国现阶段劳动就业的特征和对策..... 李 斌 张 明 (6·11)
沿海地区经济运行机制外向转换的若干构想..... 洪耀宗 李剑锋 (6·16)
广东经济开放的探索与启示..... 沈贵进 (6·21)
高技术经济理论述评..... 阙机龙 (6·25)

哲学

- 试论制度变迁..... 贺培育 (2·6)

时代与哲学	钟阳胜 (2·12)
我国社会稳定、改革、发展三者结合的制度	孔庆榕 (2·15)
从程朱学派的“异端之学”看理学与释道的关系	严书翔 (2·20)
对现代新儒学几个问题的论争	
——“现代新儒学与当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观点简介	庄严 (2·24)
《资本论》的科学性与生命力	刘景泉 (3·6)
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与肖新生同志商榷	易佑平 (3·14)
推理的分类及其标准质疑	王经伦 (3·104)
“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	
——中西方文化精神模式的比较	樊浩 (4·40)
哲学应用问题研究评析	李道文 (4·46)
理解主体客体理论和新唯物主义关系的方法论前提	高齐云 (5·37)
胡塞尔论主体际性	
——兼评当代哲学的交往困境	涂成林 (5·44)
试论古希腊哲学关于范畴体系的建构原则	崔延强 (5·48)
全国首届广义进化与自组织理论研讨会综述	范冬萍 (5·59)
论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发展的学说	刘志光 (6·49)
关于辩证逻辑发展的思考	黄媛 关老健 (6·70)
陈白沙的自得心学	王伟民 (6·75)
访苏格兰哲学见闻	张华夏 (6·78)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

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几个问题	肖前 (1·33)
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	
——兼论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途径	蔡茂生 (1·39)
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对抗与稳定发展	梁渭雄 (1·43)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全国第六次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冯达才 (1·47)
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陈冲 (6·18)

精神文明学

全面理解商品经济和道德进步的关系	苏君正 (1·73)
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管理的方法论原则	刘少波 刘竹 (1·80)
浅论控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系统的导向功能	黄广保 (1·84)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化刍议	马东佑 (1·88)
浅议我国企业文化的建设	侯亮凯 (1·92)
经济特区思想道德建设的目标模式与基本途径	吴群策 严建强 (2·26)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建立一门学科	刘兆权 (2·33)
围绕经济工作中心，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陈献佩 (2·36)
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的基本特征	吴灿新 (4·50)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职业道德的变化	梁世江 马英华 (4·55)
“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座谈会”纪要	(4·58)
民族精神的科学界定及其意义	卢少华 (5·53)

论文化本质	李权时 (6·54)
精神文明学本体层次及其主要特征	范英 (6·61)

历史学

研究中国近代史应树立新坐标	姜乘正 (1·15)
怎样选择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口	张连起 (1·18)
论中国近代社会的畸形发展	李时岳 (1·20)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	胡伟希 (1·27)
广东先秦社会初探	
——兼论38座随葬青铜器墓葬的年代与墓主人问题	[香港]区家发 (1·95)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兼论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	张磊 (2·61)
有关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	赵立人 (2·69)
清代前期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	罗一星 (2·75)
对中国工运史的两个问题考证	卢权 (2·80)
民本主义论纲	陈胜彝 (3·45)
中国近代军阀与中国近代化进程	郭剑林 (3·52)
清代东南地区货币地租质论	陈支平 (3·58)
“两个过程”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刍议	宋德华 (4·61)
略论中国近代农业资本主义的不发展	朱坚真 (4·65)
论明嘉靖中期倭寇的性质	张声振 (4·69)
历史评价与历史的价值判断	
——论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中的双向透视法	彭年 (4·74)
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	
——评张荫麟的一个史学观点	李洪岩 (5·61)
“返本开新”与“中体西用”	
——港台新儒家对洋务派的承接和超越	周炽成 (5·67)
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早期传播	禤倩红 (5·73)
辛亥革命应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孔凡岭 (6·30)
试析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产的原因	余子明 (6·35)
容闳与孙中山	陈申如 (6·41)
论太平天国革命与中国近代化	牟安世 (6·43)
晚清社会的游民问题	王跃生 (6·82)
秦三十六郡考	严宾 (6·87)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一个很有时代意义的研究课题

——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首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林若 (1·6)
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学术研究的几点意见	郑群 (1·8)
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民族的融合力，文化的融合力	任继愈 (1·10)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张江明 (1·12)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首次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 关履权 李锦全 孔庆椿 李权时 李明华 阮纪正 (3·64)	
民族凝聚力刍议	林佐良 (5·81)

中华民族凝聚力论纲 肖君和 (5·85)

文学·语言学

秦牧创作的民族文化意识特征	黄伟宗 (1·105)
秦牧与香港文学	许翼心 (1·109)
古代诗歌的情感结构	张天来 (1·115)
宋代声妓繁华与词的发展	陶第迁 (1·121)
《荀子简释》校勘真相管窥	张 党 (1·127)
岭南近代文化史问题研讨会综述	宋德华 (1·135)
汉语各方言的关系和特点	李新魁 (2·87)
在语法研究中运用一点数学	沈开木 (2·94)
论中国古典风格学的形成及特色	吴承学 (2·98)
论宫体诗的“出位之思”	李希跃 (2·104)
读《赋话六种》札记	何新文 (2·109)
论《文心雕龙》的逻辑体系	劳承万 (3·74)
元好问诗论新探	刘明今 (3·81)
悲壮的史诗：论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	杨剑龙 (3·86)
文学史与思想史	
——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哲学	陶东风 (4·78)
言语行为理论的解构和批评	
——德里达评奥斯汀	陆 扬 (4·84)
试论西方哲学对中国近代文学思潮的影响	谢飘云 (4·89)
论陈残云笔下的乡村意识	张 绰 (4·96)
陆一帆《关于文艺本质问题的思考提纲》讨论专辑	
..... 陆一帆 何楚熊 邓志远 柯汉琳 申家仁 (5·90)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理论的论争和发展	蔡景康 (5·100)
“浪仙”钩沉	杨晓东 (5·106)
论世界华文文学之形成	
——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海外本土文学传统	[新加坡]王润华 (5·111)
调整着视角的华文文学研究	
——“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陶原珂 (5·116)
中国的感生神话	蒙 梓 (6·90)
陆一帆《关于文艺本质问题的思考提纲》讨论(续)	刘伟林 陈培湛 王才勇 (6·98)
“竹林七贤”称名始于东晋谢安说	周凤章 (6·102)
陈白沙诗论探索	彭建康 (6·108)

教育学·人才学

对广东人才工作的回顾和思考	李作铭 (3·36)
九十年代珠江三角洲的基础教育	吴光普 (3·39)
论教育市场及其效率	吴超林 张铁明 (6·112)

国情省情市(县)情研究

建设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汤炳权 (4·102)
----------------	-------------

发展经济靠科技，发展科技靠人才

- 广东省顺德县的调查 康 钟 (4·105)
县级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 黄振平 (4·110)
切实发挥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作用
——东莞市“科技兴市”问题的思考 姚锦柏 (5·119)
取之于侨 用之于民
——潮州市金石镇利用华侨捐资为民造福情况调查 杨 越 李鸿生 (5·122)
依靠科技提高经济效益
——肇庆市机械工业的调查 施芝华 谢名家 (6·118)
抓住历史机遇，振兴梅州纺织工业 陈 杰 (6·121)

企业研究

发展专业化生产是地方企业的广阔道路

- 中山市轴承总厂的启示 叶 明 (1·137)
促进技术进步，焕发企业活力
——怀集县汽车配件厂的实践与思考 黄振荣 (1·139)
启动市场与企业对策
——广东真空设备厂的实践与思考 王建明 (2·113)
乡镇企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关键
——广东省澄海县发展乡镇企业的思考 邹培基 (3·108)
对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 周耀文 (3·111)
管好用活资金，使企业经济持续增长
——广东顺德北滘南方电器厂的实践与思考 苏 林 (3·114)
紧紧抓住专业化生产的技术改造
——广东省韶关市模县厂的成功之道 刘金辉 (4·112)
外向型企业发展道路的实践与思考
——记广州市市头实业有限公司、广东省市头甘化厂 罗文金 (5·125)
公关活动与企业的发展
——广州市白云山制药总厂的启示 余华湛 (5·127)
谈梅县涤纶厂的人才策略 张梓林 (6·123)
依靠科技，一举腾飞
——梅州面粉厂的经营之道 张 职 (6·125)

学者专访

- 李新魁教授谈治学和广州国学研究社 本刊记者 陶原珂 (4·114)

书 评

把美学研究的横竿不断升高

- 评彭立勋《审美经验论》 周长才 (1·141)
读《法国所藏甲骨录》 陈炜湛 (2·116)
《当代中国商品经济理论流派》评介 孙泽军 (2·120)
林贤治《人间鲁迅》漫评 张 华 (3·93)
现代专科(翻译)词典的释义系统
——谈王宗炎主编的《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 陶原珂 (3·99)

《社会主义辩证法新探》的进展	李恒瑞 (3·116)
《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探索	陈圣河 (3·119)
喜读《教育发展战略导论》	冯增俊 (4·117)
探索中国特色的企业集团的发展道路	
——读《中国特色的企业集团》	孙效良 (4·119)
贵在开新，贵在探索	
——评章权才的《两汉经学史》	吕由 (5·78)
峰回水迥的卓异跋涉	
——读《中国山水诗史》	魏中林 (6·128)

书海酌蠡

“戊地”小考	姚之若 (1·104)
《史记》关于范蠡的一条材料	黔容 (1·126)
柳永诗所咏中峰寺在浦城县	官桂铨 (1·134)
“均露均霜”应作何解	王双怀 (3·107)
释“肥而不腻”	谭步云 (3·113)
“很如羊”旧解质疑	丰家骅 (4·39)
曹植《赠丁仪》诗作年辨析	熊清元 (4·95)
《尚书》“有众率怠弗协”解	殷伟仁 (5·99)
韩愈《送权秀才序》为权南仲作	金陵子 (5·99)
《癸辛杂识》与《元史》之“叶李”小考	刘家钰 (6·97)

(黄荣显整理)

请订阅1992年《现代哲学》杂志

《现代哲学》是由广东哲学学会等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哲学理论刊物，于1985年创刊。

《现代哲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探讨国内外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观点，深化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的哲学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应用问题的研究；重视从哲学上总结、反映企业现代化、企业改革、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成果；重视青年哲学工作者的来稿，积极扶持、促进他们的成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见解的讨论。

《现代哲学》为季刊。从1991年起，编辑部设在广州市黄华路4号（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内）。国内发行每期定价1.00元，全年四期共4.00元。港澳地区和国外发行每期定价港币10元。国内发行：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发行科（邮政编码：510053）。国外发行：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邮政编码：100011）。现已开始办理1992年的征订手续。同时继续接受1991年的补订订户。

新安鎮

工、農、商業突飛猛進



濱山工業區



共樂音響電子廠生產線

喜摘豐收果



鷄場



百果爭艷

超級商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鎮因地制宜、揚長避短，大力發展外向型村鎮企業。現在，全鎮興建了40多個大小工業區，570多家“三來一補”企業、25家“三資”企業，產品有電子、電腦、光盤玩具、組合音響、精密模具、服裝、聚脂家具等幾十個項目，遠銷世界各地。1990年有15家企業被九龍海關授予“信得過企業”和“三好企業”稱號。1990年全鎮工業總產值1.7億元。

新安鎮不斷調整農業生產布局和產業結構，建立了水產、蔬菜、畜牧、水果四大商品出口基地，形成了農林牧副漁蠣六業興旺發達的格局。1990年農業總產值達6000萬元。

在改革開放中，新安鎮形成了一個開放型、多渠道、少環節的商品流通體系，現在，全鎮有955家國營、集體的商業和飲食服務業，有2500多家個體工商業；有人民、工商、中國、農業、建設等五家銀行和信用社的金融機構和服務網點。賓館、酒樓、西餐廳、髮廊、酒吧星羅棋布，興旺發達。

深圳經濟特區衛星新城——新安鎮

文教衛生蓬勃發展



西鄉中學語音室



勞動小學教學樓



西鄉幼兒園



新安影劇院

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文化、教育、衛生、福利事業的蓬勃發展。幾年來，新安鎮投入大量資金，興建有中小學20間，幼兒園12間，完善了從幼兒到小學、中學的教育體系；醫院設備齊全，衛生醫療站遍布各村和工業區，形成點面結合的衛生保健網絡；興建敬老院，老人“老有所養”；文化體育設施逐年增多完善，內容健康豐富，為人們調節精神生活，陶冶情操，強身健體提供良好的場所。

西鄉敬老院

設備先進、功能齊全的醫院

